



大连文史资料

第六辑



# 大连文史资料

第六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大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88年12月

# 大连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大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大连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1988年12月底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1092X787      1/32      字数：100,000

印数：1-2,000册      工本费：1.40元

大连市文化局出字（内）No：0005381

# 目 录

东北爱国诗人王一叶 .....	4
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徐敬之 .....	15
我所知道的潘华国 .....	23
回忆爱国企业家大连顺兴铁工厂主周文贵 .....	30
安惠栈与许亿年 .....	33
邵尚俭与“天兴福” .....	39
康有为来大连记 .....	50
李秉衡籍贯考 .....	52
大连解放初期共产党人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情况的概述 .....	55
大连地区建国前的台湾人及其组织状况 .....	60
西甸子农民的反占田斗争 .....	66
复 县 督 学 记 .....	72
解放前大连民族工商业见闻 .....	76
旅顺盐业开发简史 .....	88
大 连 钱 庄 业 述 略 .....	91

解放前日寇在大连.....	106
贩卖走私鸦片内幕.....	106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工具.....	110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	110
《打响辛亥革命在东北的第一枪》 .....	135

# 东北爱国诗人王一叶

## ——回忆我的父亲

王黎

父亲王一叶，东北三十年代文化、新闻界人士多熟悉他的名字，他是当时东北文坛上一位颇有影响的青年作家与诗人，1944年（四十岁）在北平宪兵狱中被日本侵略者杀害。

根据父亲遗留的部分手迹、生前好友的一些记述以及我的见闻，愿如实讲其生平加以追述。

### 一、王一叶的家世与青少年时期的活动

王一叶，原名汝棠，字荫南。1905年11月22日生于海城县北甘泉乡双台村的一个小康家庭。一叶是他的笔名。清末民初的东北，历经中日甲午之战、日俄之战，军阀兵匪横行无忌。他幼年时家境已经逐渐中落。祖父王殿甲，是个庄稼人，念过私塾，略知诗文，思想倾向维新。推翻帝制后，他在乡里带头剪发，倡办女学，并提供房舍，热心公益事业，深受乡里敬重。被举为村长多年，好为乡民排忧解难，济苦扶贫，以致任内散尽家产。祖母安氏，出身乡村中医家庭，精通诗文，思想上旧道德伦理观念较深，且笃信佛教，常以孔孟之道、诗书济世等教育父亲。父亲的治学、为人处世幼年受母的旧礼教影响较深。但思想上也受到祖父崇尚革新的启发。由于祖母循循善诱，兼天资聪慧，父亲四岁时已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等书，学前已能熟记《唐诗三百首》、《论语》、《诗经》和弹词《三国演义》等书了。

父亲自幼博学，甚至吃饭时也手不释卷，每在夜间借月光攻读蝇头小楷的

线装书，以至眼睛深度近视。自九岁入小学起，每天很早到校，对老师极其恭敬，从未受到责罚与批评。从小性格仁柔憨厚。他的小学授业老师知他学前已度过了不少书，便引经据典考问他，均能对答如流。他幼年的聪明好学，至今乡里犹有人津津乐道。

父亲十四岁进入离家廿余里的滕鳌镇高小寄宿，开始熟读大量古典文学名著，并能作出较有见地的品评。如《西厢记》、《牡丹亭》、《琵琶记》等词曲，皆可流利背诵。从此开始写日记、作诗文，几十年坚持不懈。

1921年，他十七岁考入海城县立中学。由于好学与写作出众，渐成为学生中的活跃分子，被选为级长和图书馆干事。凡古典文史、五四新文学及社会科学他都广泛阅读，奠定了他以后思想演变和诗文创作的基礎。在争取学生自治，反对封建教育制度的罢课斗争中，他成为骨干，参与起草罢课宣言，揭露教育当局黑暗，因而一度被开除学籍，并受到地方士绅指控和法院传讯。当时担任县中学学监的卢光绩先生，也因支持同情学生的革新要求而被解聘去职。父亲学生时代的自传小说和后来的日记中，多次继续与卢先生的交往。从此他以卢先生为良师益友。

父亲在海城作诗的故事，当时流传县城。那时他对李白、杜甫、陆游的诗有较深的理解。课余最喜好逛书店，把结余的零用钱全都用来买书。在“巨有堂”书铺当店员的青年诗人赵德澎与父亲结识，并成莫逆之交。赵年长父亲两岁，解放后曾执教于哈尔滨市中学及师范学院，是对古典文学颇有造诣的学者。另外还结识了陈介修、于仿玉、张汉侯、王浣青等诗词爱好者，组成了《临漠六少年诗社》，公然与标榜随园咏物怀古诗的地方名儒陈林格、韩辑五等相抗衡，并终为一些老先生所叹服，名噪乡里。他在校曾偶占一首七绝：“言寻广陌出郊城，满眼春愁一旦醒。万里碧空清似水，浮云三两似浮萍。”他的国文老师王松亭发现后，对父亲的诗评价极高，认为后两句是未经前人道

过的佳句。父亲学诗自谓先学陆放翁，后学李、杜，又转向李义山；虽说讲究格调，但并不专摹一家，而且注意创新。

## 二、王一叶的文学创作与社会政治活动

1924年，父亲20岁，从海城中学毕业，因家道中落，无力升学，报考省教育厅的中学教员，名列前茅。自此两年多先后在海城、他山、岳州、熊岳、岫岩及大连中华青年会等处高小、初中任教或应聘讲学。1927年，23岁到沈阳，先后任过《新亚日报》、《民众日报》的记者、编辑，同时在张学良创办的同泽中学兼任教员。并考入张学良主办的萃升书院研读国学，在历次考试中成绩优异，被当时书院桐城古文大师吴北江（阎生）、于省吾（思泊）视为得意门生，吴北江当时称赞父亲所撰《征俄将士碑》，足抗韩昌黎之《平淮西碑》，诗亦独处一格。父亲当时撰有《上张学良将军书》一文，被编入书院范文，至今犹为学者所记诵。从此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文学创作和抗日爱国活动中去。“九一八”前夕，他已成为东北文学、新闻界有影响的青年诗人和作家。他兼长新旧多种文体的创作。当时曾团结一批青年文艺工作者组织了“东北新文学研究会”，写作发表了大量的新诗、散文和小说、时论文章，对新文学发展起到较好的作用。

父亲自入沈阳报界工作，一直怀着炽烈的爱国热情，积极参加一些爱国抗日的社会政治活动。在国民党尚未公开时，他曾与杜重远、高崇民、兰锡光、刘韶九等人一起活动，讨论政治，对当时革命形势有较明确的识见。他认为：“革命青年当以身填陷阱为重生之桥，如悠悠度岁，非吾所愿也。”他对军阀官僚的腐败统治疾恶如仇，他曾激愤地说：“此等不工不贾，即不肯为神圣之劳工，又不甘心吃高粱米，只有令其祸国殃民了。”这反映了他对国民党的失望与忧虑，而对无产阶级革命充满同情。他在艰难谋生之余，以新闻记者身份与东北爱国民主人士卢光绩友好交往，并经卢结识了阎宝航，积极参加青年会



和国民外交协会开展的民众反日爱国活动。1930年因发表《岫岩杂纪》揭露地方官绅腐败劣迹，几度遭到法院审讯，经其仗义申辩，受到舆论支持始幸免于难。他当年应岫岩县邀请做暑期讲学是卖衣服做路费去的。冬天外出开会、采访夜归常常无钱坐车，夜里写稿常常忍着饥饿。在如此贫困的环境里，仍坚持繁重的新闻、教学、写作与社会活动。

尽管他个人衣食匮乏，但还是竭尽所能帮助更急难的朋友和同志。1948年我来大连工作，当时大连盲哑学校校长李庆丰同志对我说，“九一八”前他在沈阳参加国际共产组织从事地下活动时，曾一度吃住在我父亲的报社中，并受到我父亲的掩护幸免于难，并说“你父亲虽未参加我党组织，但却是一位难得的好朋友，像一叶这样的人实不可多得。”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我父亲正住在同泽中学，目睹日本侵略军种种暴行，他以万分愤慨的心情，立即口诛笔伐。他这期间写的自传小说《残棋》和其他大量诗文，至今读之犹令人感动。1932年他流亡北平，在《赴平留别诗》序文中写道：“一息尚存，当坚大节，行者劳而居这苦，各勉程婴杵臼之谋。散有聚而离有合，犹是赤县神州之内。吟成七字，似寒风易水之篇。别属三秋，异朝雨渭城之唱。置君怀袖，馨香何止于三年。报我琼瑶，行脚已过乎千里云儿。”表现了他的无限愤慨和对抗日救国前途的坚定信念。到北平后，他一直追随卢广绩先生参加“东北抗日救国会”的活动。同时和矫庸（字靖东，海城县人，与矫结交于萃升书院，矫自进关后参加党的地下工作）、赵雨之等在北平创办《光明夜报》、《光明文艺周刊》，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工作，并发表了大量诗文，揭露日寇侵略罪行，抨击当局的妥协不抵抗政策，颂扬爱国军民浴血奋战，共申敌愆。同时兼为东北几处流亡中学教书，深受东北青年学生的爱戴。

1933年去察哈尔，任《民国日报》社长。旋参加冯玉祥将军抗日同盟军，

事败复返北平。是年初作《沈变纪事诗》卅余首，为天津大公报潘伯鹰（泉公）阅悉，并推荐给该报《文学副刊》主编清华大学吴宓教授发表。继之又作《祭酉咏怀诗》五十首（五古），全文发表于吴主编的《文学副刊》一百一十三期上，以后又选入《吴宓诗集》中的《空轩诗话》中（中华书局出版）。是诗以满腔悲愤，气贯长虹的激情，控诉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残暴罪行，痛斥当局的妥协偏安和汉奸国贼的卖国行径，热烈颂扬了爱国军民浴血奋战的英雄业绩。编者按语誉其为“吾国诗界的光明樁柱。”时父亲年方 29 岁。至此吴宓先生遂与父亲结为知交。抗战胜利后，吴先生执教于武汉大学，经多方寻悉，知父亲殉难噩耗后，1947 年 2 月 10 日，吴于其主编的《武汉日报》第九期文学副刊上发表了《悼诗人王荫南烈士》，详尽评介了父亲的生平和诗文造诣。文中语多沉痛，起笔指出：“先生以诗人而兼烈士，世人读先生之诗，自可知其性行，审其气节，而信宓之所哀非为私。篇中有誉宓过当之处，宓当读之，已感激涕零。然闷之十年，在今更不敢居标榜之饥嫌，迺予刊布。俾读者可得到王荫南先生之真面目，真精神。较诸刻板之墓志，哀痛饰词之祭文，或有胜焉。”结束语中曰：“世之负气节而珍爱文学者，读兹所录王荫南君之遗诗数篇，可以知君之才与志，而亦知宓之悲矣。”一次表达他对父亲的沉痛哀悼与深切怀念。

父亲流亡北平时，主要靠教书卖文养家糊口，生活异常窘困。后来为时任长芦盐运史的荆有岩先生所聘。据说荆公在旅途乘车中阅读父亲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咏怀诗》，赞赏他的才华，乃从潘伯鹰处询知，遂礼聘父亲前往佐幕，深为器重。此后有近三年（1933 年至 1935 年）时间，他随荆公历任冀、苏、赣、鄂、豫等省印花烟酒税局秘书等职，生活尚属安定，并借此得以畅游祖国江南。此时写了大量描述河山壮丽以及淳风美俗的诗文，有《匡芦诗草》等著作，并以这段生活为背景，写了一部揭露在反动统治下，反映东北流亡知识分子爱国思想的长篇小说《浔阳江上》。可惜十年动乱中被焚毁。

1936 年初，父亲 32 岁，由荆有岩和卢广绩介绍至西安任张学良将军总部

秘书。咨议筹策，多有谗言。“双十二”前，护送友人返平就医（与友人王浣青登山赋诗，王失足骨折），正赶上“西安事变”未及返回，乃留北平教育部办的东北青年升学补习班任教，兼为报刊撰文维持生活。

“西安事变”后，卢广绩先生返北平与我父亲见面，讨论张学良将军安危得失。父亲在《丁丑日记》三月十五日写道：“当日呼吸危急之间，张有一言，蒋即丧生。若此不德，徒致怨于凌辱，亦可谓不知其返矣！故此事，或为历史所曾有；而后段释放之速，且自陪返京，则非张先生，任易何人，皆做不到。故他日民国史上，张先生终为大有功之人。以免其国内之分崩及生民之涂炭也。当日若决绝为之，则东北军故不易成功，然海内充分拔矣！”足见其政治识见之深远，与当时党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不谋而合。由三月十八日记中：“有学生吕正都（即吕东）等来访，相与谈论时局，学生所言盖亦左的色彩者。适老鲁至，侧耳静听。余深惧学生等信口胡言，为老鲁所侦，反为不便，盖卢为中央特务之一。”（按：鲁辅周，为父亲萃升书院同学，公开职业不明）寥寥数语，亦可见父亲当时的鲜明是非倾向。1987年吕东读到这片日记，得知父亲牺牲，深表怀念。他回忆1932随父亲流亡北平读书的一些往事说，“王老师有很强的抗日民族意识。”当其得知《一叶爱国诗集》将编成出版时，特亲笔为之题写了《纪念王一叶老师》，并引用毛主席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两句诗的题词寄来。父亲遗著诗文，在1987年第3期《大连大学师范学院学报》于植元的长篇论文《读一叶爱国诗选》一文中多所引用，评价较详，本文不赘。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父亲未及出走，先在东北人办的私立第一中学教书，不久学校经费断绝，一度失业，生活益窘。处此时时艰危之际，他更忧心如焚，无时不为平津沦陷后的战局演变而悲愤萦怀，希望我军努力早日收复东北。对此《丁丑日记》有大量记载。如“大街景况萧

条，一如‘九一八’事变之沈阳。不为壮年重罹斯祸。行至街上，见保安队及伙子，忙撤沙袋。这是我们预备打人家的，人家没打进来，我们自己先忙着给人家撤了。这是何等的耻辱、悲境。我看到这，回思沈阳，不尽流泪。”（七月廿九日）。“天津竟日炮火，市政府、南开大学等尽赴一炬，哀哉。街上市井萧条，痛心酸鼻，涕泪夺眶而出，嗟乎，熟知亡国之惨如是乎！”（七月卅日）。“晚报至，载中国军队已退至长辛店。南苑一带伤兵，呻吟匍匐，三日三夜未饮滴水。红十字会欲往救济，而张潘等不开城门，（指汉奸张燕卿、潘毓贵等）潘又令警察在城外遣散保安队。有美人某，目睹惨状以汽车烧毁数人。嗟乎，曾谓汉奸，尚不如外国人乎。如此国家，如此世界，成何道理，赵登禹已为国捐躯，至无人吊祭，不知政府是何心理，阅至此，愤然流涕。”（七月卅一日）“目前时局，正与宋金相同。百姓军士，皆不欲和，大官皆欲和。东北沦亡六载，中央日日求和，奴言婢膝，唯恐不恭，现已绝黎明之望矣，此次平津任期占领，不出一兵，则全国将士之心灰矣。”（八月一日）。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消极退让异常激愤失望，七月十日、十四日两次记下他的挚友矫庸同志传告“毛泽东已率师北上”，并曾记忆“联袂北上”，并曾议“联袂出城起义，犹免生困囚城也。”显然党的抗日行动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有了新的希望。

清华大学南迁，吴宓教授于1937年11月临行前，父亲写给吴一首七律：“沦落仍能气吐虹，欲从破虏建奇功。粗豪意气陈同甫，慷慨悲歌陆放翁。绿艾朱樱佳节里，白山黑水梦魂中。西郊江西今何在，料得殷忧与我同。”寄吴宓《西山纪游诗》中有句：“男儿生世间，不得挽长弓。奋袂赴疆场，振我华族风。安得长日下，残篇殉鱼虫。”这些沉雄壮烈的诗句，激愤忧国之情跃然纸上。些前寄吴诗有句：“只应化作蓑弘血，碧染辽沙照沈京。”此一警句，竟成为他后来殉难的谶语与自挽。1938年以后父亲始以伪报馆编辑职务掩护，继续坚持策应抗日工作，做其力所能及的贡献。

父亲晚期的代表作，要推1940年两次返里时所写的《前后还乡诗》，共

七十余首七言绝句。这也成为他殉难前最后一部保留下的著作，原稿不仅未曾发表，亦鲜为人知，堪称是他在沦陷区中真实的思想写照。

父亲 1940 年初春和冬末两次还乡。前次因祖父被伪满拘役劳动受凌辱忧愤致疾回去探望，后次是为祖父料理丧葬。

父亲居北平时，从来未间断抗日爱国活动，他曾与坚持抗日的马占山将军有所过从，并合拍过照片。我曾见父亲让母亲将张学良将军的一个绸制密件给黄振武（东北义勇军）叔叔缝在棉被中，无意中听他们相约赶走日寇重聚家园的欢快谈话，幼小的心灵中，也充满“打回老家去”的向往。后见其日记中有：“黄振武为日人发觉，逮捕刑讯，至死不吐一词，亦是硬汉。余太息久之。并拟前往慰问。”（《丁丑日记》、三月十九日）北平沦陷后，有来自大后方或延安方面的长辈与父亲交往，他都尽力给予掩护和帮助。唯当时他均秘而不宣，且我年轻幼稚，故知之甚少或不复记忆。

父亲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勤奋治学，写作常到夜深。他在生活上则异常简朴，不吸烟喝酒，不讲求吃穿。所得薄俸和稿费，除供家计日用外，几乎都有之于买书和资助东北流亡的学生和亲友。他在南方数年，亦两袖清风，家徒四壁，只是从九江带回来几件朋友送给的书籍和瓷器。直到被捕前，家中的写字桌和椅凳还是借自朋友或从市上廉价买来的旧货。写作读书时，不管孩子怎样玩闹，另人怎样说话，他都能高度集中精神，如呆如痴，旁若无人，但遇知己朋友同志纵谈学术诗文，或议论时事，则又滔滔不绝，意气风发，前后判若两人。他的忘我治学精神和酷爱诗文，实所罕见。

### 三、王一叶的殉难始末及遗著

1944 年 1 月下旬，农腊岁暮的一个深夜。时值日伪在华北发动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对爱国抗日分子旅行疯狂镇压和大搜捕。是时由于我参加地下党

领导的爱国抗日活动，并受到父亲的积极支持和掩护，不慎被日寇特务侦知，父子遂同遭日本宪兵队逮捕（当时家住北平鼓楼前辛寺胡同 29 号）。同时被捕的还有同案难友潘礼仲（鼓楼医院院长，曾任冯玉祥将军抗日同盟军军医处长）和我的同学、朋友等三四人。凌晨被拘押入煤渣胡同日本宪兵 1420 部队牢房，敌人对我父子多次施以严刑拷打未能逼出口供后，转而对我父亲施加压力，逼令其供出支持我参加中央地下领导的抗日活动的情况。一次隔室审讯中，我听到父亲对日寇义正词严的痛斥和申辩：“你们日本人讲爱国，中国青年同样也知爱国。你们借反共之名，行侵略之实。抗日爱国是你们日本的侵略所逼的，对共产党，你们奈何不得。孩子是否参加其活动，我不知道，即便参加，我也管不了。中国青年为了爱国，就只好不走向重庆，就走向延安……”敌人暴跳如雷，发出兽性的狂吼，在一阵叫骂暴打声中将父亲押走。此后他接连不断地遭受敌人残酷折磨。在宪兵队拘押两月余后，三月初的一天，日寇以向牢房放毒瓦斯消灭虱子为名，将数十名难友扒光衣服，赤身裸体驱赶至一处空房时，我见到父亲已憔悴不堪，瑟缩而行。我乘机赶行贴近他的身后问他，他反给我以鼓励和安慰：“他们很快就要完蛋了，不久我们就可以出去，我还能挺得住……”话未说完，竟被鬼子发现，遂迎头挥舞鞭棍把我与父亲打开。当我再抬头窥视父亲时，头一次见到他滴落激愤的泪水，我也不觉一阵心酸痛如刀割。不料从此竟成永诀，再也无法见到他那慈祥的容颜了。

当年三月末，我和同案十几名难友被转押往华北日本军部进行“军法审判”，以“违犯军律，私通八路”罪名分别判刑，同案的领导人王一非（仲亨）同志遂于是时遇害牺牲，后被追认为烈士。（王系吕正操将军同学，延安抗大出身）我们被判刑的难友即转押入伪“北京第一监狱外寄人犯收容所”。后来在狱中遇见曾与父亲同住宪兵队牢房的辅仁大学叶德禄教授，他告诉我，父亲不久被转押几处宪兵特务机关，一度敌人曾企图软化诱供，但遭到父亲严词拒绝，敌人黔驴技穷，转而施加多种酷刑，身体已被摧残。到 1944 年 10 月间的一天，经过九个月多的囚禁折磨之后，从东珠市口宪兵队中被押上卡车送

走，自此即告失踪，消息杳然。后来根据各种迹象判断，斯时即遭秘密杀害，壮烈牺牲了。一位与他同住一牢房，目击其被押走的东北人难友王泽民律师，获释后带出父亲狱中口占的《甲申狱中占赠》四首绝命诗，更清楚地看出他早已预料自己的殉难是不可避免的。后经王交给父亲另一友人吴子嘉先生（铁路职员），由吴转抄传送给我们。原诗如下：

**（一） 霜晨短景易消磨，地狱逢君且高歌。  
莫作楚囚相对泣；天兵指日荡妖魔。**

**（二） 生平桴海居夷志，忍性支心愧未能。  
今日牢中逾九月；幡然忽似定中僧。**

**（三） 京华冠盖闹如云，消息沉沉久未闻。  
见说故人都无恙；悠然一笑向苍旻。**

**（四） 十年干戈困腐儒，家山反哺愧慈乌。  
欲将身后托知己；能作公孙杵臼无。**

父亲的绝命诗中，留下他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的无比憎恨与蔑视，留下他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表达了对抗战必胜的信心，也寄寓了他对志同道合者的希望。

我深深铭记着读小学时他来信时的告诫：“吾生平所爱惟国家与文学……”教育我读书做人的道理。上中学后是他把我引见给革命老伯矫庸同志，使我通过矫老获得革命的启蒙教育，并接受党的领导。直至被捕前，因与矫老中断一段联系，我走了一些弯路后，方重获与地下党一们同学取得联系，父亲始终都给予我们支持与掩护，我是从他手中首次秘密读到刘少奇同志所著

《论共产党修养》一书的，矫老在北平坚持党的地下工作时期一直与父亲保持友好交往。众多的爱国友好在我父子被捕后，均为之焦虑，都试图设法营救，但因涉及“共产党案”，敌人封锁严密，株连搜捕甚广，均难以措置。

父亲一生颠沛流离，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潜心治学写作，曾创作了大量的爱国诗词及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而在旧社会却无条件出版一本象样的书，他的手稿及发表于报刊的作品也仅有少部分得以幸存，其它大都失散于变乱迁徙之中了。据我所知曾经有几位父亲生前友好、热心学者，曾长期致力搜集他的诗文，欲编辑出版。主要有前清华大学吴宓教授、哈尔滨师范学院赵德澍两位前辈和从前在“鲁迅故居”工作过的矫庸老伯，可惜几位前辈均已先后逝世，未能实现他们的愿望。

从残存父亲自编《卅年简略年谱》中记录，他自 21 岁开始发表诗文，成集的手稿总计约为 20 余集，但留存的只有其中极少部分散存篇章。其一些散文、杂文、小说、诗歌和日记也只有少量残存下来。在有关前辈和学者的支持下，我自 1984 年离休后，开始从其残存的遗著中，编成一部八万余字的《一叶爱国诗选》。在父亲生前友好吕东同志和卢广绩、荆有岩等前辈的关怀下，鞍山市政协在鞍山政协文史资料中为我父亲编发了三万字的《诗选》，海城市将出版《一叶爱国诗选》，并在其地方志中编述我父亲的事迹。父亲牺牲迄今，悠悠岁月已达四十余年，终使其遗著免于湮没，复现于世，忠魂碧血，重得归返故国家乡，也可告慰于九泉了。

### 附注说明：

文中引用除多彩自一叶先生遗著手迹外，沿参阅下列文章资料：吴宓教授《悼诗人王荫南烈士》（1947 年《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于植元教授《读一叶爱国诗选》（《大连师范学院学报》1987 年第 3 期）。卢广绩、荆有岩为《一叶爱国诗选》所著序文，及辽宁、沈阳、泾阳等地文史资料。

（本文作者为九三学社大连市委离休干部）



## 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徐敬之

唐树富、黄本仁整理

徐敬之，原大连油脂工业总厂副厂长，历任省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市民建委员会委员、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并当选为省、市人民代表，省三届政协常委、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是我市工商界中资历较深、声望较高的一位正直、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

徐敬之（又名徐源久），1894 年生于山东省威海市个山乡南虎口村。因家贫，童年只读了三、四年书便辍学务农。1912 年来到大连习商，在日商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投资开设的三大利油坊学徒，后当职员。徐敬之每天和大豆打交道，实践使他凭眼观、手感和口嚼便可查出大豆的品种、质量、水分和含油率。成了大连的大豆行家里手。因此三井洋行在大连交易所粮谷市场进行大豆买卖时，特委托徐敬之充当经纪人。

学成经营大豆和榨油业的本领后，他脱离了三大利油坊，求助亲友作保从银行贷款 1.2 万元（日元，下同），投资加入义兴福油坊，任副经理。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有了积蓄，遂于 1926 年退出义兴福油坊，另在寺儿沟（今二七广场附近）创设东和长油坊，资金 20 万元，其中徐敬之 9 万元，筹集外股 11 万元。因他仍兼任三井洋行的大豆买办工作，故东和长创业初期，他担任副经理，直到 1932 年初自任经理。由于徐敬之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榨油业技术，不数年东和长获利甚丰，他还清了过去的贷款。二十年代初期，北满哈尔滨某粮栈失火，抢救出来的大批“火烧豆”大幅度降价出售，但大连油坊业无人敢采购，而徐敬之则看准时机，将“火烧豆”取样反复试验后大量收购，制成之产品与普通大豆制成产品别无二致，仍按普通大豆制成之市场价格出售，

赚了大钱。

1935 年秋收期，北满地区阴雨连绵，雨后冰冻骤至，只是大连油坊业采购大豆十分紧张，生产大幅度下降。早在 1925 年，东北大豆产区北满遭受特大水灾，水豆出油率甚低，豆饼无法凝固，大多油坊作了蚀本生意，独徐敬之经过细心研究，采取掺用好大豆的办法加工水豆获得成功，并生产盈利。这次冻豆多数油坊主接受上次教训不敢问津，而徐敬之胸有成竹，开动脑筋，对冻豆样品进行了试验，结果表明冻豆出油率低，但制饼含油量大，适用于做饲料，内销、外销都可以。且冻豆价贱，利润较高。因此，他一面立即安装多台干燥机，一方面安排人去北满以低价购进冻豆，日夜加班生产。仅此一举，当年获利 70 余万元，创油坊业生产利润之最高峰。经过“火烧豆”、“水豆”、“冻豆”这几件事，徐敬之在油坊业中威信日益增高。

东和长油坊事业越做越大，但大连整个油坊业却已逐步走下坡路。日本帝国主义除对生产资料进行垄断外，还在征收税率方面雪上加霜。据知情人估计，各种税率合计约占华商油坊业所获纯利的 46%左右。因而使一些营业萧条之小户被迫歇业。徐敬之经营的东和长油坊，在逐年发展中已成为大户，引起日本殖民当局的注意，因之各种税捐和无理摊派也就特别加重。徐敬之长期在三井洋行担任买办，对日本侵略者贪婪狠毒的狰狞面目，看得也特别清楚，因此他的民族意识逐步增强，于是他下决心不再在侵略者统治范围内搞企业，以示抵制。

1936 年徐敬之秘密赴考察实业，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徐敬之毅然辞去三井洋行的买办工作，并在他所经营之各企业中，秘密地逐步抽走大量资金汇往内地，作为异地兴办民族工业之准备。

徐敬之在大连经营的企业除东和长油坊外，富昌盛油坊、福聚垣油坊、更生运动鞋厂、兴业窑厂、永和长铁行、隆裕绸缎庄等都有他的股金，在北满哈尔滨市还开办了一家永泰铁工厂。总计徐敬之投资以上各企业最高达 250 万元，他的财富在当时是屈指可数的。

徐敬之在大连抽出资金后，于老家山东威海市开设德和长粮店，在威海农村购买土地 840 余亩，山岚 1000 余亩，并雇有长工 3 人，耕种土地 60 亩，其余均租于农民耕种。在威海市区购房 160 余间，在大连市管辖的普兰店自置二层楼房 4 百余间。在大连市沙河口区购地 70 余亩，栽植苹果树 1400 余棵，是一个规模不小的果树园。又在北京、天津、烟台等地购置房产，并于上海市设置庄客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连日本殖民当局进一步对华商实行残酷统治，颁布了“汇递管理法”和“七二五限令”，使华商油坊业和其他企业无法抽资迁厂，完全失去了自主权，由于徐敬之抢先一步，大部分资金已经转往内地。至此只剩下奄奄一息的东和厂油坊落入日寇的控制之下。

1942 年，大连殖民当局除允许日商三菱、三泰等 6 家油坊继续生产外，强制大连华商仅存的 27 家油坊实行合并，全部为日本关东军军需服务。徐敬之经营的东河厂油坊被并入协和制油株式会社，徐敬之任副社长。协和制油株式会社社长邵慎亭是亲日派，根本无视华商利益，引起徐敬之极大义愤，企业合营后不久，徐敬之秘密离开大连，在天津市开设东和生代理店。消息走漏后，日本殖民当局给他扣上私自抽走资金、有意为抗“帝国国策”，违犯《汇递管理法》的罪名，将其在连的财产冻结了。敌伪方面还扬言要缉拿他。

1943 年徐敬之到烟台创办了东和窑瓷厂，自任经理。徐敬之有强烈的民族观念和爱国心，憎恨日本强盗的侵略，多次以财力物力来支援抗日武装。早在 1939 年他回威海故乡时，听到威海国民党山东省第七行政区保安旅抗日，便慷慨解囊捐助 5 万元，并动员朋友捐助这个部队 4 万元。但又一次他到这个部队慰问时，了解到这个部队假借抗日之名，整日花天酒地，侵扰百姓，他气愤极了，从此断绝了对这个部队的资助。

当时大连日本殖民当局把居民分为两类，发给不同的居民证件。一种是

“州民证”（市为可靠的“良民”），一种是“寄留民证”。徐敬之凭他的财力，本来可以领到“州民证”，而他为了培养儿女们的民族感情和意识，宁愿去领受歧视的“寄留民证”，这对他儿女们的思想影响很大。他为了教育子女树立爱国气节，不让他们接受奴化教育，把他们送往祖国内地读书，常嘱咐他们要养成节俭习惯，培植自立能力，不要依赖父母，要有创业精神。他的子女后来抗战期间走上了革命道路。

徐敬之一生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致富后，在衣食方面仍保持朴素的作风。从外表看他根本不像一个百万富翁，但对捐助社会公益事业，毫不吝啬。他从小失学，因而对广大贫苦儿童无书可读之苦，深表同情。他向威海市家乡捐款修建了南虎口村高级小学、温泉汤西佛山小学、枫林小学和威海市金线顶中学等多处。为鼓励贫苦子弟入学，他还设置了奖学金，使他们免费入学，这种义举，已载入《威海市市志》。

徐敬之还积极赞助社会慈善事业，先后参加了“红十字会”和“道德会”等慈善团体，并担当了一定的领导职务。红十字会市全国性的慈善组织，三十年代中期山西省境内大旱成灾，树皮草根都被灾民吃光。徐敬之带便大连红十字会送去大批粮食救济灾民，当他返回大连时，又把灾民所吃之树皮草根带回家重要家人共尝，以此教育家属。

“南京大屠杀”，大连红十字会也派人前往南京为死难者立碑，以示哀悼。1938年日寇在威海登陆，大肆烧杀淫掠，使广大居民家破人亡，徐敬之携带捐款和物品前往威海城乡进行救济。他亲眼目睹日寇对中国人民灭绝人性的暴行，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更加激发他支援抗日救亡的热情。

徐敬之看到道德会能开办识字夜校，解决居民教育问题；设立戒烟所，使烟民脱离苦海；开办缝纫厂，解决部分贫民就业和生活困难等善举，他积极予以资助。特别是为解决社会弃婴问题，出于人道主义立场，他集资创办大连育婴堂，自兼堂长，解决婴儿的教养、上学、培训就业等一系列问题。

徐敬之虽富，但自奉甚俭，不嗜烟酒，其他也无不良嗜好，他全部心血除

经营企业外，就是尽心竭力兴办公益和慈善事业。据知情人估计，徐景之已用了相当多的经济收益捐助给了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

“八一五”解放后，徐敬之从烟台回到大连，于离别多年的家人团聚。当时由于他对党和政府对私人工商业的政策一时还摸不清楚，怕工人清算斗争，因而采取了观望等待的态度。解放初期的大连，因遭受国民党海路封锁，大豆来源断绝，油坊业一时无法开工，1946年徐敬之在沙河口区经营自治的果树园。后因无力经营，便把它出卖了。

1947年以后，大连市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克服了各种困难，形势逐渐稳定和好转，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党和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采取扶持的政策。徐敬之又看到社会上各个方面的新鲜事物，思想上触动很大，对共产党有了较好的认识，逐步消除了疑虑。

1950年8月，大连市政府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号召原油坊业早日恢复生产为经济建设做出贡献。徐敬之首先积极响应。经协商决定由政府出资修理机器设备，修缮厂房和投入流动资金作为公股投资，把大东三个分厂和协和四个分厂知原有设备清产估价作为私股，实行公私合营，于同年12月初达成协议，从此大连私人油坊业走向了新生。

实行公私合营后，原大东油坊改名联东油脂厂。徐敬之经营之东和厂油坊所属的原协和油坊改名为联合油脂厂，资本总额为208299元（新人民币，下同）其中公股126315元，占6.6%，私股81983元，占39.4%，徐敬之任副厂长，这是大连市私营工商业较早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之一。公私合营后，生产很快得到恢复与发展，职工人数也大量增加。1954年1月，联东和联合两厂经协商合并，仍用联合油脂厂名，徐敬之任副厂长。

徐敬之在公司合营企业中，在公方代表帮助下，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为企业生产管理，积极发挥自己的专长，经过“三反”、“五反”运动，特别是通

过对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使他逐渐加深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认识和理解，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增强了为企业改善管理，发挥自己专业特长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他亲自审计改造了干蒸机图纸，试验出了新的榨油方法，使得每百斤大豆出油率由原来的 9 斤左右提高到 14 斤左右，打破了我国油脂业有史以来的纪录，而且这一新的技术和工艺很快推广到全国各地。

1955 年徐敬之又在工人群众的帮助下，试制成功用自动铁圈替代过去使用的油草榨油，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减轻了劳动强度，成本比 1951 年降低了 38%左右，为企业增收 600 多万元（人民币，下同）。

1956 年我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处于高潮时，私方人员提出将原私营油脂厂全部实行合营，并直接并入地方国营油脂厂，于同年一月批准。已合营的私营油脂厂全部并入了地方国营旅大油脂总厂。过去未参加合营的各厂和为估价作股的闲置设备及资产业全部作为私股并入。两次合营核资，私方总股金为 82.9 万元。在这次合并过程中，徐敬之起了骨干带头作用。

徐敬之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鼓舞下，依然把他代管的原十几家联合的企业所在帐外的生产资料和物资，如榨油机 9 百台，锅炉 30 台和其它设备，均按铁价计算交给工厂；把他每年收房租 4 万元的 400 间厂房，以及银行存款 4 万余元全部投入新的合营企业，以支援扩大再生产。并把自己的私股额减低到 67337 元，每年仅拿定息 3366 元，与此同时，大连公私合营棉织厂资金周转有困难，他又拿出 5 万元投入该厂作为私股，解决了该厂生产上的困难。

1954 年以后，徐敬之先后被选为市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政协四届委员、常务委员、市四届人民委员会委员、省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市民主建国会委员等职务。1956 年徐敬之作为全国政协列席代表参加大会，并受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感到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大的光荣。使他看到党的和平改造、赎买政策的伟大，也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前途。从而更加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增强了自我改造的自觉性。学习毛

主席著作时，在毛主席“只要谁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 ---”这句话的旁边很认真地写上了“注意记住，坚持做到”八个字。

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徐敬之虽年老体衰，肺病复发，为了不耽误厂务，他仍带病坚持工作。1962年徐敬之已近70高龄，厂方为照顾他的晚年休养，经再三动员，他才回家。但仍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他爱国热情更为高涨。抗美援朝时，他主动将历年积蓄拿出大部捐献购买飞机大炮。党政府发行爱国建设公债时，他又动员妻子把金银事物卖给了银行以购买公债。1953年大连市工商联向工商界集资创办新华初级中学，徐敬之女慨捐5千元，并按月捐款贴补学校开支。后来政府陆续发行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各种经济建设公债，以及各种救灾捐助，徐敬之都是积极响应，踊跃购买和捐献。他认购的公债和各种捐款之多，居当时工商界之首。1960年发生自然灾害期间，徐敬之慨捐缝纫机10台分送各区工商联，建立起工商界家属生产互助组，帮助生活困难户度过三年的暂时生活难关。1963年徐敬之又响应周总理号召，亲笔撰写出《大连殖民地经济惨象》、《满洲重要特产取引所》等重要稿件，并为编写大连油坊史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徐敬之被隔离审查，关押一年之久。家庭被查抄数次，家属受到株连并被赶出家门，房屋被强占。徐敬之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到严重摧残，并被扣上“大特务、大汉奸、大地主、大资本家”等罪名，年老多病的徐敬之因不堪折磨，终于在1971年11月6日含冤离开了人间，终年78岁。

虽受不到正确待遇，但徐敬之临终前，仍告诫家属要相信党，如果领取在“文革”中被冻结的银行存款时，出少部分留给妻子作为生活费用外，其余要

全部献给社会公益事业，并特别指明子女不要享受遗产，要保持自立的优良家风，后来他的家属遵照徐敬之遗嘱，将银行存款，除留部分作为家属生活费用外，将余下的人民币 2 万元全部捐给了大连市民主建国会和市工商联，作为社会福利费用。

“四人帮”垮台后，徐敬之沉冤得以昭雪恢复了名誉，1978 年 3 月大连油脂总厂为徐敬之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并肯定了他是一位“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业者，是一位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反帝爱国的民主人士”。

（大连市工商联文史办供稿）



## 我所知道的潘华国

伍蔚文

1987年10月由美国归来的原国民党第十五兵团中将副司令潘华国，是我过去的上级，也是亲戚。10月6日我去北京，12日陪同他及其夫人等来到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大连市政协、民革大连市委及大连黄埔同学会热情接待并宴请了他们。他们在连停留期间游览了旅顺、滨海路、傅家庄、老虎滩等名胜，参观了大连造船厂和机车车辆厂等单位。对祖国河山面貌的巨变、建设的宏伟迅速、人民生活提高和社会秩序的安定，表示衷心高兴和异常惊叹，最后总结为一句话：“百闻不如一见！”

大连政协为了联络感情，促进祖国统一，在政协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应邀参加座谈会的除部分委员外，还有在大连的一部分黄埔同学。潘先生简单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归国观感。故人欢聚，不禁使我想起了他的一些往事。

潘国华是湖南省南县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当过一个时期下级军官，后考入陆军大学，第十期毕业；最后又考入国防研究院，第一期毕业。

抗战前，潘华国任驻德武官。他去德前夕，与我表姐结婚。在柏林生了潘柏林（其长女。解放后在南开大学毕业，现已去美国）。抗战期间他当过郑洞国的军参谋长，交谊颇深，抗战后期，国民党因兵源缺乏，耍了一个花招，要征集十万青年志愿军。口号喊得非常响亮，叫：“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青年军所有的军官都比普通军队的高一级，且高级军官大都是当时比较有声望的将领，如青年军二〇一师师长是曾经当过中将军长的戴之奇，副师长是黄埔私其学生邹轸善少将。二〇二师师长是罗泽闾中将，副师长就是潘华国少将。二〇三师师长是当过七十一军军长的黄埔一期学生钟彬中将。二〇

七师师长就是所谓坚守衡阳 48 天的中将军长方先觉。一般团长多是少将，营长也是上校。可见国民党对青年军的重视和偏爱。

二〇二是司令部驻在四川重庆綦江。下辖六〇四、六〇五、六〇六三个团，都驻扎在江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向全国各地派出很多接收大员。中国的领土香港，也曾被日军侵占，现在已经胜利，虽然已由英国从日本人手里接过去了，但是英国和中国在名义上到底还是同盟国家，是站在反侵略战线上的。“物归原主，理所当然。”经中国政府再三向英政府要求，它不得不答应移交给中国。于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开始物色接收人员。当时军事委员会人事处处长是陈春霖，听说此人很能安排人事。自要派人去接收香港的消息一传出，各方面来军委会活动的人接踵而至，都想从中捞点油水，但都被陈拒绝了。他说：“这是跟外国人打交道，不是在国内，决不能草率从事。”他坚持一条是，派去的人既要懂军事，又能懂外交，最好还会英语。他怕跟英国人交涉，一旦“泼了汤”，在委员长面前他担当不起。挑来挑去就挑到了潘华国。因为潘华国既是黄埔和陆大毕业的现任青年军少将副市长，即懂得军事，又当过驻德武官，而且英语很好，用不着翻译。当时我也在重庆，潘华国被军委会传见来到了重庆，潘华国被军委会传见来到了重庆，就住在菜园坝军委会招待所里。那时钱大钧已被委派为接收上海的大员，他的一大帮人马也都住在军委会招待所，正准备出发。另外又新发表了一个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也是新官上任，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相形之下，潘华国这个去香港接收的，显得很冷清。开始进驻招待所时，军委会告诉他不要着急，现在正和英国研究，英方尚未同意我们去接收，大约住了一两个星期，去上海的接收人员已坐飞机走了，去十一战区的也先后出发了。潘国华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可是又没有什么办法，只好静听军委会的指示。又过了几天，我表姐也从綦江赶来闻讯，也住在招待所。

到最后军委会才和英国达成协议，只让我国派一位代表带两名随员，去和英国办一办手续，实质只是顾全中国的面子而已。因为英国早已将日本帝国主

义在香港的财产、物资、武器等一切接收完毕。难道他吃进口里的东西还肯吐出来？更重要的是英帝国主义侵占我香港的租界期限未到，所以就不让中国插手。因此，潘华国只带了他自己的少尉随从副官李孝良、卫士许嘉松。到香港后，只是在形式上和英国驻香港总督谈了几次话，香港的报纸登了几条“中国政府派潘华国将军接收香港”的消息外，其余什么也没沾手。若与国内上海、南京的接收大员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潘华国“接收”完毕，很快回来了。香港依然由英国人统治

潘华国于 1945 年底，由香港返回重庆后，马上调升为青年军二〇一师师长。二〇一师司令部驻扎在璧山县，下属三个团，两团驻在虎峰，一团驻在铜梁县城。延至 1946 年 6 月，基于“双十协定”国共双方都要裁减军队。于是 1946 年夏，全国青年军复员以后，国民党将二〇一师和二〇三师合并，取消了二〇一师的番号，保留了二〇三师的番号。潘华国改任二〇三师师长，原驻在泸县的二〇三师所有部队人员都调到重庆大坪。新的二〇三师司令部也由璧山迁到大坪原青年军总部。

原在驻在重庆大坪青年军总部的司令是曾经参加过缅甸战役的指挥罗卓英。全国青年军复员以后，青年军总部也随即撤销。国民党政府也已迁至南京。在重庆只留下朱绍良为重庆警备司令，算是最高指挥者，所以青年军二〇三师就属他指挥。

青年军二〇一师与二〇三师合并改组后，名义上取消了二〇一师，但实际上又把二〇三师扩充为两个旅。第一旅旅长为原少将参谋长王富农；第二旅旅长为赵树德。1947 年 5 月第一旅奉命调赴安徽宿迁附近，在徐州西南与解放军作战，被人民解放军打得一败涂地，最后也没归还建制，剩下少数残兵败将也不知由何部收编去了。二〇三师至此实际上只有一个旅了。到同年 11 月，又突然奉令全部开赴陕西汉中。看来又是陕西的胡宗南有所不利而来向四川调兵

的。等二〇三师刚抵达汉中，潘华国师长又奉令调国防部任职，其师长一职由胡宗南的亲信陈鞠旅接充。这明显地看出来胡宗南对潘华国的不信任。

潘华国师长调走，按胡宗南的用人原则，副师长张业戈本来也应该换掉的，但是胡宗南究竟还是一个不愚笨且有权术的人。他深知临阵换将，这是兵家之大忌，所以他只换了潘华国这个主将，还留着张业戈这个副将来维系人心，以利指挥。殊不知这也是白费心计。张是四川军阀里出来的，见识短浅，利欲熏心，一心想向上爬。他在听到潘师长要调走，继任师长还不知是谁时，就喜上眉梢，到处活动，俨然以师长自居，独断专行。可是他哪能料到胡宗南的手段？不久，新师长陈鞠旅来了，他的美妙梦想“肥皂泡”似的破灭了。不长时间他也被调走了。从这一事实中也可见到当时国民党军队里人事上你争我夺的一斑了。

我对内战，本来早就有所厌弃了，加上国民党本身只是私人用事，各立门户的做法，我认为他们只会争权夺利，排除异己，将来自己也得被他们排挤掉。即使侥幸存在，也只是做了同室操戈的帮凶，完全违背了自己当时弃学从戎抗日救国的初衷，何苦为之？因此趁新师长尚未到任，就师长尚未移交之际，拍了一个电报给潘华国，说我因母病危，请求辞职归家照料。潘华国当然体会我意，当即复电司令部批准了我的请求。我乃办理移交，由陕西返回湖南老家。后来在陕西的二〇三师的一些同事来信说，他们部队参加了进攻延安的战斗，在洛川、宜州、新丰一带，到处向解放军进攻，结果节节败退，到处逃窜，最后全军覆灭。后来我写信给在南京国防部的潘华国说：“你虽被胡宗南临阵撤换，于心泱泱，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回信给我说：“我和胡都是黄埔同学，都是委员长的学生，内部还这样勾心斗角，不能一致‘对敌’，各树朋党，国事何勘设想！随后败灭，此天之报应也。你在汉中设法离职，足见眼光锐远。我亦深体你心，概予批准。否则，恐亦是昆山失火，玉石俱焚矣！”其实我不愿在国民党军队里再干下去，但当时因为找工作极其困难，生活不易，虽欲离而不能离也。在此藕断丝连的情况下，为着生活混事而已。但

到了他们升官发财而要我去反共卖命时，我自然要慎重考虑，当机立断了。作为我来说，还不是一个稀里糊涂，对历史、社会一无所知的人，因此我才毅然下定决心离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再也不为他们卖命打内战，准备返回家乡，自谋职业。但事与愿违，在旧社会大学生尚且就是失业，我一个从军队中下来的人，又有何办法？就只有呆在家里，很长时间也未找到工作。1948年冬，潘华国又做了第十五兵团中将副司令，我也未去信与之联系。因为我已决心离开国民党军队，不再做“前度刘郎”了。

一直呆到1949年5月，我更看到国民党一败涂地，那时邱清泉已被击毙，黄伯韬、黄维兵团也被歼灭，蒋介石被迫下野，而北京傅作义又起义。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刘斐等和谈代表也弃暗投明。湖南之程潜和原是宋希濂部下七十一军军长，时已担任第一兵团司令的陈明仁也在长沙起义了。我想宋希濂与张治中有二十多年的交情，不久前还在新疆当过他的西北行辕参谋长，与陈明仁不仅是黄埔一期同学，而且很长时期在一起共事，他们都起义了，难道宋希濂就不能起义？这时宋希濂的部队正好在湖北、湖南一带，于是我就到了宋希濂之十四兵团，与他的堂弟，我军校同期同学宋展翔商量，欲策动宋希濂起义，投向人民。宋展翔当时是兵团司令部警卫团副团长。惜事无成，被宋希濂坚决拒绝，所以后来在宋希濂向西南逃跑时，我在重庆独自离开部队投奔了解放军。

本来到1949年，形势很清楚，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但南京国民党反动派还妄图以和谈来做苟延残喘的缓兵之计，潘华国此时也以国防部人员随代表团北上。后来和谈破裂，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等再未返回南京，而潘华国等数人因要返回南京“复命”，对国民党在和谈协议书上签字，无法再返北平。从这一事情来说，应该是潘华国一生中失去的最可喜的一次良机！南京失守后，他又逃至重庆。在国民党的一次高级会议上，他受蒋介石面

命担任革命实践学院副院长，院长是蒋介石。原因是蒋介石看到程潜、陈明仁等都“叛变投敌”了，有的军队又不堪一击，土崩瓦解，他认为这主要是缺乏精神支柱，所以必须召集所有高级将领进行思想教育，仿照过去办庐山训练团、重庆中央训练团形式。当然这也是徒劳的。于是潘华国在重庆快解放前，乘飞机去了台湾。

1980年我通过潘在美国的妻子——我的表姐与他通了信。我在信中写了一首诗给他。诗曰：“昔日将军固足雄，和谈奉使叹无成，休将白发常漂泊，应是生前入玉门。”他只身羁留孤岛，妻儿均在美国，还有的尚在大陆，清夜自思内心反省颇有思归之意。1981年他将自己写的三十余首诗词，由他内兄转给我。其中不少反映了他的真实思想。如在一首《干戈玉帛》中说：“从来同室戒操戈，祸起萧墙事更多，何日严冬能解冻，好叫两岸见晴和。”另一首《故国萦思》中说：“天涯过客归思动，故国河山系梦长。”表现了他思归之意。到最后竟直说出了“栖身虽是长安好，但愿移家到石城。”他想到回大陆以后住到他过去在南京的一幢私宅里去。这足以说明即使在台湾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对祖国的统一也是衷心赞同的。古语说：“狐死首丘，叶落归根。”哪有不想回到自己祖宗坟墓所在的故乡，而愿长期羁留在孤岛的？

1983年他在台湾退役后定居美国，经常与我通信，我就如实地向他介绍了大陆多年来的发展进步，建设的宏伟，人民生活改善的具体情况，有照片、有数字、有名有姓。久而久之，他的思想渐渐有所改变，但恐惧之心还未全部消除。1986年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他的同学郭汝瑰去信给他，想以黄埔同学会名义，出资邀请他回来看一看。1981年我曾去信给郑洞国，告诉他潘华国有欲归国定居之意。郑公当即复信，嘱我转致潘华国欢迎他归来。但由于当时环境，他恐台湾当局诬指其接受中共资助做统战宣传工作，故辞去郭汝瑰黄埔同学会之邀请，于1987年自费悄悄回国参观。9月抵达上海，参观游览了苏州、杭州、无锡等地，都未敢接触任何政府领导及朋友。及至南京见到了原十五兵团师长贾应华（现系南京市参事），将他归国情况，告诉了南京市有关领

导，才公开了他的身份。一开始贾即以身家性命向他担保，绝无任何危险和问题。通过多日来与各方的交往，所见所闻，以前的疑惧心里才逐渐消除。所以到达北京时，就无所顾虑了。全国政协、民革中央、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先后宴请了他，出席参加并宴请他的有陈子华、屈武、侯镜如、郑洞国、贾亦斌、彭清源、李赣骝等领导。10月13日又来到了大连。

（本文作者为市黄埔同学会成员、市政协文史委员）

## 回忆爱国企业家大连顺兴铁工厂主周文贵

蒋辑五

口述

林基永笔录

周文贵，字义亭。旅顺元宝房人。少有志，热心爱国。家贫，童年辍学，以赶马车为业，维持正常生活。

1905 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立逼清王朝签订《旅大租地条约》，遂迅速建设大连港口及市区，以做满州前端出入口和工商门户。大连工商业，即随之跃进发展，大有一日千里之趋势。周文贵乃与 1907 年春移居大连，仍操旧业，赶车谋生，瞩目工业，以待时机。一年后，见大连铁匠炉生意兴盛，前途无量，乃放弃马车业务，创建顺兴炉，专营马车蹄铁装备及制造马车和修配马车零件。生意逐日繁荣，未及一年炉中职工增至 20 人之多。当时正值大连市制油业（油坊）蒸蒸日上，但压豆皆用石碾，动力纯以牛马木桩榨油，专靠人力，多快好省，碍难做到。周文贵潜心设计研究制成螺式铁质油桩榨油机，既节省了人力，出油也多。成品送经晋丰、政记、成顺和玉昌积等油坊轮流使用，卓著成效。于是大连 50 余家油坊均争先来厂订制，营业因之日加繁盛。大有供不应求之势。遂扩建厂房，增置设备，职工亦随之增加至 300 人。周文贵又招聘其兄旅顺船坞工厂专家周善亭及蒋辑五、陈永德等入场工作，专门研究诸项技术。

1908 年日人联合中国资本家在大连寺儿沟建设三泰油坊，所有设备均为机械，以蒸汽机为动力碾豆，冷气机榨油制饼，多快好省，事半功倍。产品质量高于大连所有油坊。该油坊日人极端严守秘密，不准中国人参观仿效，以图永久领先于大连同行业。1911 年，三泰油坊与顺兴签订合同，检修全场机器。顺兴派蒋辑五带工人进入三泰油坊工作，经过徐久及多种方法始获得其冷气机图样。顺兴立即制造冷气机，以革新大连市各油坊之规模。是年，周文贵赴日本



东京考察，归时购得蒸汽机一台，以便试制。由此顺兴开始制造油坊机器设备，销售于东北三省各大商埠。这时全场职工增至 1300 余人，营业极盛，并出资培养百余名油坊司机。

1912 年，周文贵集资 20 万元，任蒋辑五位经理，创建哈尔滨振兴股份有限公司铁工厂，除制造油坊机器外，建造江船辑修检机器。发展迅速，盛极一时。1916 年，哈尔滨发起救国储金活动，在同乐戏院召开的市民大会上，周文贵当场用钢刀将自己左手无名指上节砍掉，血书“储金救国，勿忘国耻”八字。发言激昂，令人感动。且当场献金 3 万多元，以为首倡，于是群众当场争先恐后献金，一般妇女亦多献出金钱、耳环、手榴子等，以示爱国赤诚，此次义举，令父老称道不已。

1918 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国际航运交通堵塞，油饼滞销，钢铁原料亦大感缺乏。周文贵曾自己设计在大连顺兴铁工厂附近建高炉，制钢炼铁，以充实工厂自给自足之需要。遭到日本满铁的嫉妒与限制，前后只运连两车铁矿石，以后坚决不给车辆，以至南北二厂营业萧条，而哈厂 1920 年更遭不幸，一场大火将全厂化为灰烬，重新建厂，费尽了心机。在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勃兴，机器制造日新月异，顺兴南北二厂以私人有限资金，加之人才缺乏，欲与帝国主义抗衡，实难办到，不得已将哈厂收歇，专营大连一厂，以图恢复。经历年余，未见起色，颇为失望。是有曲魁武介绍帝俄私商兴满公司出卖其复州外煤矿矿权，周文贵乃以纹银 10 万两买下，并即将顺兴营业性制改变。以开采煤矿为主，工厂改为副业。任曲魁武为复州湾矿经理，购置新式采煤设备，大量开采，日产煤 1000 余吨，并购置大小汽船五艘，专门运煤，以供应旅、大二市，并销售于天津及山东沿海各口岸。1922 年与日本八幡制铁所签订合同，每年以本矿运煤船龙兴号运往该厂 3 万吨，每吨价格 12 元，货款对交，由此矿山事业日益兴盛。1924 年，抚顺金沟煤矿主佟秀东，因该矿山

地下水势极旺，无力整治，意欲出卖矿权，周文贵又备款收买。任徐凯忱为经理，又聘矿业专家张贤才为矿师，配备机器，采取新式采煤方法，排水填沙，广开土路坑道，大见功效，每日产煤 200 余吨。引起抚顺煤矿公司日本人的注意，欲行霸占，遂大施压力。满铁拒绝运煤，日积月累，屯煤益多，资金流通发生障碍，不得已暂行停办，而所积存之煤堆，又自然起火烧毁，统计损失达 100 多万元。虽然遭受很大损失，但周文贵对矿山事业毫不灰心。1926 年又收买复州陶土矿权一处，经营开采，颇有起色，而日本垄断资本家又大伸魔爪，唆使正金银行以贷款关系欲强行没收，南满铁路守备队又以武力威胁，周文贵以矿权与国家主权有关，拼命保全，誓不屈服。两次亲赴东京最高法院起诉，历经半年之久始得胜诉。同时又与瓦房店煤矿投资合作，购置机器，大力经营。

1927 年，周文贵自大连乘船赴复州湾矿山，路过金州城北三十里堡西海，遭遇狂风，舢板沉没，不幸遇难，享年五十有二。文贵歿后只遗孙儿寡母，一切事物主持无人，所有债券者又日夜摧索，乃由其胞兄周善亭出面，将复州湾煤矿及所有权献于奉天省政府，张学良司令赐予现款 250 万元，始将所有债务偿清。矿山工厂同时宣告歇业，人财俱失，令人痛心。

周文贵原为贫民出身，少年失学，及长，常感自己文化浅陋，工作时遇困难。因此同情贫苦子弟，对才智出众，无力升学者，常以金钱资助，使之升学，以期深造，如经他资助升学者有瞿夫仁、苗剑秋、于连瑛、王秉锋等，或在日本或去美国留学毕业生有十余人。1918-1920 年间，旅大地区连遭自然灾害，农业歉收，一般地方贫苦大众生活困难，饥寒交迫，周文贵深切同情，前后捐助现金。由北满购进玉米、高粱 28 大车，分三级逐户按人口赈济旅顺方家、水师营、王家店等处，居民受益者甚多。已故当时遽闻周文贵罹难噩耗，群众不胜哀悼。当地父老因痛失一位富有开拓精神的爱国企业家和热爱家乡热心公益事业的带头人，尤感惋惜，至今道及，犹怀念不已。

## 安惠栈与许亿年

于鹏九

安惠栈是大连解放前工商界本地帮五大家（政记轮船公司、天兴福、福顺厚、泰来油坊、安惠栈）之一，主要经营日商三菱商事株式会社，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的面粉、砂糖。财东许亿年走私密运、偷漏关税，为富不仁，路人皆知。我曾在安惠栈供职六年，对安惠栈比较熟悉，现记述如下。

### 媚外起家

许亿年，自万亭。大连小平岛人。因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五，故称许老五。1904年长兄许惠年同三个弟弟在大连四十五号街（日本街名信浓町，既现在的永和街）开设了安惠栈杂货店，专为帝俄军队供应日用食品、杂货。这期间许惠年学会了俄语（跟俄国人学的），同帝俄军队联系的更为密切，因此安惠栈上货较多，营业也就逐渐发展起来。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大连地方商业开始活跃，许亿年又学会了日语，他左右逢源，意则屡中，为安惠栈生意的兴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三兄许忠年、四兄许恩年不满许亿年的专横跋扈，上的许惠年的同意，拟将许亿年排出安惠栈，但结果却被许亿年排除出去。因此许亿年得以独断专行。此时，许惠年又在西岗区成立了安惠西栈，将许恩年安排进去。日本统治旅大以后，每年向日本内地输入大量豆饼，用作农肥。当时关东都督府激励鼓励华商成立油坊，但仍供不应求，所以开设油坊者，无不获利三倍。此时安惠栈又于西岗财神街增设了安惠栈油坊，由许中年负责。自

从成立油坊以后，安惠栈营业一天天扩大，获利一年年增多。安惠栈本店扩充为安惠栈钱庄、特产代理店、杂货批发代理店等，沙河口又增设安惠栈支店，长春头道港，安达站等都成立安惠栈特产代理店。盖房 160 余间，于马栏屯买地 240 亩。

## 充当买办，投机失败

安惠栈于 1923 年以房产做抵押，并以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张本政为保证人，同三菱商事株式会社签订了一份经销面粉、砂糖的合同，主要内容是：三菱的面粉、砂糖在大连由安惠栈负责推销，并承担一定义务；三菱允许安惠栈在三菱设账房，按面粉、砂糖成交额给予安惠栈一定的利润；安惠栈可直接向三菱订货，其交款期限为两个月（一般一个月）。签订合同以后，安惠栈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大量订购面粉和砂糖，每次订购的面粉都在二三十万袋左右，砂糖约三五万包，分别向沈阳、开源、四平等地推销。安惠栈还以房产做担保，向三井订购面粉，每次成交也不下二十万袋。此外，安惠栈还包销昌光硝子株式会社（现大连玻璃厂）的玻璃和三菱的杯牌火油。至 1925 年发展一帆风顺。1927 年由于受国际市场的影响，面粉大落价，每袋价格由 1926 年的 2.70 元陆续落到 2.05 元，使安惠栈已购未销之期货面粉大吃其亏。加之安惠栈长春、安达两代理店摊上荒户，追不回的债款达 10 万元。飞弹町（现新生街）的新建账房占款很多，结果共亏欠三菱、三井两大会社金票 80 万元。由于现金制肘，周转不灵，因此安惠栈遭到严重失败。

## 同病相怜，合力对外

面粉大落价的浪潮，使安惠栈、钧泰号、永记栈、徐利兴、益泰祥、益顺公、春盛东、永盛福等 10 余商号遭到重大损失他们共欠三菱、三井金票 200

余万元，其中兼欠三井、三菱面粉款最多的只有安惠栈一家。为共渡难关，大连杂货店联合会召开了有关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推选会长迟子祥和许亿年、徐宪斋为代表向三井大连支店提出申请，要求缓期付款、缓期收货和和面仓库费。三井最初不肯接受，后来鉴于联名申请者俱是大连第一流杂货批发商，如果不接受，对于今后推销面粉实有妨碍，加之代表态度坚决，迫使三井不得不接受要求。此前，许亿年曾提出以安惠栈不动产做担保来缓交欠款，得到三井的赞同，但三井尤恐安惠栈的担保在法律上不能保证三井的全部债权，因此他采取了差押（即假扣押）手续，以防其他债权人的第二登记。

1929年面粉价格稳步回升，安惠栈利用三菱的大连支持，将买进的三菱面粉向南满铁路沿线倾销，一入一出获利不少。同时又利用两个月期款（多系现款）来周转，陆续偿还三井的欠款。这样一来，安惠栈的经济命脉得以融通，债权方面也松了一口气。此后，其他经营面粉的商号也陆续将前定未收之面粉收进卖出，欠款也如数还清，虽然仓库费双方有所争执，但最后采取互让办法，得以圆满解决，一场大风波从此平息。

### 秘密走私，偷漏国税

1931年，安惠栈利用王华亭于大连海关日本人某某（忘其姓名）的关系开始走私。当时大连海关税务司为日本人福本顺之助，税务司虽然是日本人，但海关税收仍然是中国政府的关税。记得有一次安惠栈在周水子车站装运火油、砂糖向内地走私，按规定应先办海关证明，交税后发给税单，检查后有检查剪子印，这样才能放行。而海关职员某某（日本人）先给安惠栈办好了假税单，同时利用真剪子印，万事俱备，专待起运。不料被一早晨乘火车上班路过周水

子车站的海关职员发现，安惠栈及时托人说情，最后花钱了事。安惠栈鉴于从火车走私有诸多不便，便改由黑嘴子和老虎滩装船走私。1933年走私砂糖约3万余包，偷税4万余元。此年连同贩卖砂糖和面粉共获纯利20万元。1934年砂糖走私为海关缉私的主要对象，海口岗卡星罗棋布，难以漏网，因此安惠栈改走人造丝。从此年起，安惠栈财运亨通，每年盈利都是十余万元，1942年获利达100余万元

## 大买土地，大办农园

从1934年起，安惠栈在营城子陆续收买土地480亩，盖房30余间，打电井60眼，计划专门生产蔬菜。成立了农园，命名为万亿农园。农园内还设了8个生产工厂：

- |           |          |
|-----------|----------|
| 1. 咸菜工厂   | 2. 酱油工厂  |
| 3. 粉干工厂   | 4. 木材工厂  |
| 5. 铁工厂    | 6. 钉子工厂  |
| 7. 黄酒酿造工厂 | 8. 化学瓦工厂 |

安惠栈还在梁家沟买山地240亩（包括农园），值果树4000棵，养猪700头，养鸡4000只。

许亿年在分家后又将许惠年、许忠年、许恩年在马栏屯分得的土地作价收买过来，加上自己的共240亩，作为万亿农园第二农园。安惠栈的两个农园、一个果树园共有职工700人。

安惠栈为走私便利和运菜及时，于农园外设货运汽车站一处，有货车11辆，工人40名。

安惠栈有三个浴池，其一是万泉堂（天津街）、其二是惠泉堂（沙河口）、其三是兴滨泉（哈尔滨道外），有工人160名。

安惠栈东店职工100人，加以上共1000余人。

万亿农园的咸菜工厂主要是渍菜，大量生产，大连储存，转过年来利市三倍。万亿农园利用粉干工厂的粉糟和酿造工厂的酱糟作为养猪的饲料，把猪肥料下到地里，一举数得。木材工厂主要是为万亿农园扩大建筑而设，同时也对外，如窀存加工和贩卖齐头并进。安惠栈只顾自己得利，不管农民受害，曾租用附近农民土地若干亩种西瓜，结果第二年农民再种别的作物就不长了。

### 唯利是图，特务觊觎

许亿年贪财无厌，大小不拘。如万泉堂浴池给理发师和服务员的消费（校帐），本是有关工人应得的，而徐亿年则巧立名目，规定柜上一个份，财神股一个份，许亿年一个份，许亿年老婆一个份，许亿年嫁出去的姑娘一个份，电滚算一份，茶炉算一份。如工人是十个，而劈小账的份数却成了十七个了。那七份实际都归许亿年所得，可见许亿年唯利是图，赚钱不择手段。

许亿年二次发家轰动全市，一次，成为特务敲诈的对象。有一次宪兵队的大岛借故把万泉堂经理毛鸿宾打了，临走时，告诉毛鸿宾让财东许亿年到宪兵队去。许亿年哪里敢去，只得托人送礼完事。又有一次为房租涨价问题，警察属将许亿年拘押了一宿，第二天由张本政、邵慎亭保了出去。又一次为面粉暴利将经理钟子宽押了一宿，托人说情罚款了事。以上说明，打毛鸿宾就是打许亿年，押钟子宽就是押许亿年。不但日寇特务对许亿年敲诈勒索，而且 1945 年大连解放后，国民党特务也给许亿年加上一个汉奸罪名，勒索他苏联红军币 5 万元。

### 三条人命，五百元钱

1930年前后，许中年看上了“大连警察属”特高刑事王作霖的妹妹，对其垂涎三尺。他通过当铺先生（忘其姓名）的介绍，常到王家串门。无奈许忠年虽落花有意，而王的妹妹却流水无情，使许忠年始终不能如愿以偿，许忠年由爱变恨，转而唆使许亿年纳其为妾。并托当铺先生正式做媒，纳采之后，许亿年很快就金屋藏娇。王作霖认为特高刑事的妹妹给富人作妾，有失他的脸面和名誉，断然反对。时已生米做成熟饭，王悔恨在心，乃用手枪打死了他的妹妹和当铺先生，又欲杀许氏兄弟未遂而自杀。大连《泰东日报》主笔傅立鱼拟将此事写成一篇小说（实际上要敲诈许亿年的竹杠），许亿年听说后很害怕，托邵慎亭向傅立鱼说情，并派人给傅送去500元现金，这才将这件丑事掩盖过去。

### 靠山一倒，马上垮台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旅大在8月22日光复。11月8日大连市人民政府成立，工人农民翻身了。1946年安惠栈所属的万泉堂工人组织起来，为追回许亿年剥削他们的血汗钱选出代表，向许亿年算账，许亿年不敢出头，委派代理人代为处理。从此，安惠栈垮台了。许亿年害怕工人找他斗争，匆匆忙忙逃避到北京去了。据牟柏林（双巨福钱庄副经理）从北京回来说，许亿年生活很困难，每天吃小米、玉米，每次只买二三斤，因此，牟柏林还曾赠送他一袋面粉。许亿年用沉闷的语调问牟柏林，“我还能回大连吗？”后来许亿年在北京病死了。



## 邵尚俭与“天兴福”

唐树富、黄本仁整理

### 一、青少年时代之邵尚俭

邵尚俭，字慎亭。大连市金州区人。生于 1881 年。父邵云福于金州镇开设“双聚兴”杂货店，专卖复州城新顺洪厂制作的玻璃烟袋嘴等。邵尚俭兄弟五人，长兄尚义，二兄尚臣，三兄尚贵（字子良），四兄尚勤（字乾一）。邵尚俭 10 岁上学，1894 因忠日战争失学，开始在其父店中做买卖。1904 年邵云福病故后，店务由邵尚贵、邵尚勤主持。邵尚俭管理内部钱财。1906 年邵氏兄弟为扩大营业，在大连开店，代销日商东亚烟草公司产品及其他酒类食品，营业甚佳。日商为酬谢邵氏兄弟，曾邀请邵尚俭去日本参观访问，这对邵氏一生政治倾向很有影响。

1907 年北满各地急需南方商品，邵尚俭、邵尚勤变分别去上海等地采购贩运至长春销售，再由长春购进低价大豆、粮食运回卖出，获利甚厚。日本殖民当局为掠夺东北大豆资源，以优惠条件鼓励华商在大连发展大豆加工业，邵氏兄弟趁机集中资金开设了“天兴福”油坊，其实长春到大连的运输甚为困难。邵氏兄弟善于交际，获得车皮最多。从长春运回了大批大豆，除供应本厂所需，还大量贩卖。其产销业务非常兴旺，因而“天兴福”油坊，几年间便成为大连市工商业中的大户，烧商俭也因此在大连工商界中享有名气。

### 二、“天兴福”之发展

“天兴福”油坊的日益发展，使资金更为殷实，便不断扩充经营范围。其时山东各地制粉业相当发达，邵尚俭便去烟台、青岛、黄县等实地考察。回连后即于 1910 年在金州城内开设宁海制粉厂，并向大连顺兴铁厂订购新式榨油机，增设“天兴福”第二油坊，在大连市内还开设了以“天兴福”命名的钱庄、银号。

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后，积极经营北满和中东铁路，扩建海参崴港。并于 1908 年起降低中东铁路运费，致使长春各地的大豆、豆饼等大量北上经哈尔滨转海参崴出口。邵氏兄弟看准这一有利时机，于 1913 年率先到哈尔滨设厂，并在黑龙江省肇东县购置 4000 余亩荒地，广招农户垦种，所产大豆、小麦就地加工出口。又通过上海恒丰公司买办王呈斋介绍，向美国订购拿大克厂、维士克厂制造的面粉机器，在哈尔滨、长春、开源等地先后建立了现代化得制粉厂，其中哈尔滨市的“天兴福”第二面粉厂的规模最大。当时大厂每日产“天官牌”面粉 10000 包（每包 20 公斤），中厂可生产 4000 包，小厂亦可产 3000 包左右，每包面粉可获净利大洋 5 角至一元。绍家获得暴利后，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沿线广置房产，于重要城市设立粮栈和产品分销处。天兴福企业南起大连，北至哈尔滨，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在当时大连市华商企业中可谓首创。

从 1920 年至“九一八”事变前，邵家兴办的工商企业，以“天兴福”命名者共 20 余个，遍布东北三省。

这一时期是邵家的全盛时期。邵家爆发后，1924 年起先后在大连市内和郊外新建房屋 100 余间，在金州老家也大兴土木，建筑华利阔绰之住宅 5 处，计有 300 余间，又置果树园 2 处，兴建邵氏家庙一处。

“天兴福”企业一览表

企业类别	企业名称	企业地点
制粉	天兴福第一制粉厂	长春头道沟
	天兴福第二制粉厂	哈尔滨市
	天兴福第三制粉厂	开源
	天兴福第四制粉厂	哈尔滨市
	天兴福第二制粉厂分厂	哈尔滨市
油坊	天兴福安达油坊	安达站
	天兴福第一油坊	大连
	天兴福第二油坊	大连
精米所 制革厂 银号 钱庄 粮栈  分销处	天兴福精米所	大连
	天兴福皮革厂	大连
	天兴福银号	大连
	天兴福钱庄	金州
	天兴福奉天粮栈	沈阳
	天兴福满家沟粮栈	吉林
	天兴福张家湾粮栈	吉林
	天兴福吉林分销处	吉林

	天兴福奉天分销处	沈阳
医院	天兴福医院	大连
代理店	天兴代理店	大连
杂货	天兴福杂货店	大连
大账房	天兴福大账房	哈尔滨

这一时期是邵家的全盛时期。邵家暴发后，1924年起先后在大连市内和郊外新建房屋 100 余间，在金州老家也大兴土木，建筑华丽阔绰之住宅 5 处，计有 300 余间，又置果树园 2 处，兴建邵氏家庙 1 处。

邵家成为大连有名富户后，其家族中的财产分配纠纷也就日益暴露。邵尚勤主管长春以北的“天兴福”企业，邵尚俭主管长春以南的“天兴福”企业。兄弟俩因性格、处世方略不同，时有矛盾发生。1926年后，邵尚俭的长兄、二兄、三兄先后去世。三房眷属都主张分家，但尚勤、尚俭考虑到邵家的大局没有同意。三房眷属虽然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尤其是尚俭的三个侄儿邵承先、邵承业、邵承立都在其手下工作，更不敢有违他的意旨。但不料三兄邵尚贵的嗣子邵承善（又名邵式谷），从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后，自恃是邵家第一有学问的人，对邵尚勤、邵尚俭并不尊重。成天在交易所搞投机倒把。1925年前后，他在不到二年的时间就赔蚀了 40 万元（日本正金银行的牛庄钞票），并使尚勤、尚俭为他做生意而抵押担保的 4 家钱庄、银号倒闭。金州“天兴福”钱庄也将被挤兑，邵尚俭急从大连“天兴福”银号提取大量小洋钱应急，这才避免了挤兑险潮。尚勤、尚俭经此风波，决定提前分家。逃到长春避债的邵承善，竟先下手拟出了分家方案。他勾结日本宪兵队，把邵尚俭到长春的分家代表关押起来，威逼邵尚俭承认他的分家方案。邵尚俭请大连日本宪兵队长加藤保护到了长春，加藤面晤长春日本宪兵队长请他保证邵尚俭的安全，并协助做好分家工作。但拖了很长时间，仍没有得到解决。1930年邵家五房及其有关亲友，经过多次协商，提出了各方可以接受的方案，聘请金州同乡、当时经济界的有名人物韩云阶（后任伪满洲国经济大臣）作为邵家分家的仲裁人，公证人多达

60 余名，争吵多年的邵家分家一事才得以解决。

邵氏兄弟五人，分为五支，称为“邵五福堂”，分家作为五个支堂：

- |    |      |         |
|----|------|---------|
| 一支 | 邵福本堂 | 代表邵尚义儿孙 |
| 二支 | 邵福元堂 | 代表邵尚臣儿孙 |
| 三支 | 邵福庆堂 | 代表邵尚贵儿孙 |
| 三支 | 邵福锡堂 | 代表邵尚勤   |
| 三支 | 邵福慎堂 | 代表邵尚俭   |

“天兴福”分家后，仍由邵尚勤、邵尚俭分管（其他三房分得田地、房产和部分现款），但从此形成两个系统，互不统属。邵尚勤分得哈尔滨第四制粉厂和大量现款，邵尚俭分得的企业门类较多，粉厂之规模亦较大。所以“天兴福”的企业，自三十年代起基本上是以邵尚俭为代表。邵尚俭自任总经理，常驻大连，其办事处设有业务部、人事部、南满推销部、北满推销部等。哈尔滨“天兴福”第二制粉厂是邵尚俭在长春以北各企业的核心，该厂规模较大，下设营业、财务、技术、动力等科。1937 年年产面粉 313.7 万余袋，占当时东北三省面粉总产量的 15% 左右。长春以北各企业除重大事件需向邵尚俭汇报外，企业一般业务都由粉厂经理刘佩芝代为处理。

邵尚俭在哈尔滨第二制粉厂的利润分配情况是：邵本人（总经理）按东西股中最优待遇，年俸及红利共 11 万元左右。其三个侄儿邵承先、邵承立、邵承善在场内任嘱托，按东西股待遇，每年每人可分得 3.5 万左右。在职员和技师方面设有钱股若干人，将其分得的红利小洋钱 16 万元作股，其中最高者三年可分得 4.1 万元左右，最低者已能分得 8000 元左右；钱股之外还有花红股若干人，也将分得的花红小洋钱 4 万元作股，其中最高者三年可分得 3200 元左右，加三年工资 900 元，共 4100 元左右，最低分 1400 元，加三年工资 900 元，共 2300 元左右。

依照上列对比，总经理一人东西股收入相当于低级吃钱股 40 余人的总收入，也相当于低薪工人 400 多人的收入总和。而低级吃钱股一人的收入又相当于低薪下级职员和工人 10 人的总收入，这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上厚下薄盘剥工人血汗的特点。

邵氏兄弟对地方公益事业也有所支助，如 1919 年、1924 年，金州遭受自然灾害，农作物歉收，邵氏兄弟主动由四平、长春、哈尔滨、甜草岗等地采购苞米、小米、高粱等共 97 节火车皮，运至金州城，不收粮款，仅收运费，赈济难民。金州镇等各伪会务所，为此曾送给邵家匾额六方。1944 年大连地区歉收，邵氏兄弟又捐助苞米二火车皮赈济难民。对地方慈善事业，邵氏兄弟亦较关心，邵尚俭曾担任大连最大的慈善机构——宏济善堂协理多年，还举办了一些贫民的福利事业。

邵尚俭于 1939 年在其家乡创办了金州商业学校，他兼任校长，使不少青年获得就学机会，并发给贫寒子弟助学金。邵尚俭还捐赠给大连市协和实业学校助学金 1000 元。

### 三、邵尚俭争夺大连商会领导权

日本统治大连时期，本地居民以金州人为主，其余大部分来自山东、河北、陕西等省，其后工商业不断发展，又从江浙闽粤各省区前来不少商民。总的来说是山东人居多数，本地人和东北地区次之，河北及关内人又次之。大连工商界因此逐渐形成了四大帮派：山东帮，本地帮（又名此地帮），关内帮（河北冀东乐亭为主）及南方各省区之混合帮。

山东帮之间又分为刘仙洲（刘肇义之亲侄）的钱庄派，安慈民（字承生）的油坊派、迟子祥的杂货业派、黄信芝的山东同乡会派。但黄和其他各帮各派都能相处融洽，故又称甘草派（甘草系中药名，在中药各方剂中都能用上，以次来比喻黄信之为人）。

本地帮又分为街里派（指今中山区），以大连市商会张本政、邵尚俭为主；西岗派（指金西岗区），以西岗商会庞睦堂、周子杨为主；西大连派（指今沙河口），以西大连商会许亿年为主。街里派为本地帮派之中心。又因为当事任大连市商会会长的张本政，没有过多的时间过问商会的事务，实权实际操在副会长邵尚俭手中，因此邵成为本地帮各派的中心任务。

在这四大帮派中，又由八名资历殷实的大资本家操纵着大连市华人工商界。当时俗称他们为新八大家，以区别于沙俄统治时期的老八大家。这新八大家是刘仙洲（储蓄公司）、郭精义（福顺厚油坊）、张本政（政记轮船公司）、邵尚俭（天兴福油坊）、庞睦堂（福顺义油坊）、周子杨（泰来油坊）、许亿年（安惠栈）、安慈民（成裕昌油坊）。市内各商会历届领导人由这八大家轮流坐庄。

邵尚俭是八大家中的“后起之秀”，在大连市商会中，本是一名常任董事。他在各帮派斗争中，极力施展手段，排挤他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权利。如西大连商会会长许亿年在经营面粉失利时，邵尚俭联合西岗派庞睦堂，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不给帮助。在宏济善堂重修宏济大舞台时，西岗商会副会长周子杨暗中唆使投标不中的当事人控告邵尚俭有行贿行为，起诉到警察署，使邵尚俭遭到拘押，邵以金钱买通警察署，一场官司以邵获胜而告终。可见它们之间的勾心斗角。

1923年街里派大连华商公议会会长郭精义去世。郭的长子郭习朴年仅九岁，郭精义生前将所办之企业均委托邵尚俭代为关照，邵遂以郭精义的继承人自居，在商会选举中大肆活动，犹恐个人之威信和实力不足，与原副会长张本政订立竞选联盟。邵为张拉选票，捧他出任会长，而张则支持邵出任副会长。邵张的竞选对手是山东帮的刘仙洲和安慈民，当时山东帮中刘、安与迟子祥不和，邵便趁机拉拢迟子祥，迟正在创办荣大实业公司缺乏资金，邵明知这个企

业获利不大，却慷慨代为集资相助，从而获得迟子祥的支持，但商会选举结果，却大出邵之意外，山东帮的李子名当选上了会长，这说明了山东帮在大连工商界中是有它深厚的基础的。

1927年李子明因病去世，邵尚俭认为时机来临，乃多方活动。在商会选举中，本地帮终获胜利。张本政接任大连华商公议会会长，邵尚俭当了副会长。张、邵的当选，得到日本殖民当局的支持，因为他俩都是亲日派。张本政身兼48个职务，商会事务无暇顾及，乃委托邵代为处理。

从1927年到日本投降，市华商会大权一直为张、邵所把持。1937年张、邵遵照殖民当局的意旨，擢用曾任伪警察属高等刑事的薛余堂为市华商会书记长，执掌市华商会的具体会务大权。至此，大连市华商会逐渐成为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工具。

#### 四、丧失民族气节，走上政治歧路

邵尚俭为发展东北和大连经济起了一些有益的作用。但随着他事业的发展和社会地位提高，个人名利欲望也不断膨胀，民族气节也逐渐丧失。邵尚俭的亲日思想，早在1910年去日本访问参观时就已形成。尔后通过大汉奸刘雨田的引见介绍，广泛结交日方政、军、警、宪等上层人物。1920年，日本殖民当局宣布统一币制，企图废止华商惯用的银本位钞票（银建制），代之以金本位的日本统一发行的特许钞票（所谓金建制，如朝鲜银行发行之钞票等）。此时引起大连华商的极力反对和罢市抗议。殖民当局为了平息罢市风潮，一方面疯狂地进行镇压，将坚决反对金建制的华商公议会副会长李子明驱逐出境，拘押民族资本家王香亭等人，同时采取放宽对油坊业的管理，凡拥护“金建制”者，可优先批准新设油坊，并取得低息贷款，以次对华商进行利诱，但响应者极少。华商公议会会长郭精义等工商界人士为了自身利益，也反对“金建制”，他们组成请愿团去日本东京请愿。但邵尚俭在此期间，竟盗用大连油坊



业代表的身份去东京活动。伪称大连商民拥护“金建制”，请求日本国政府体念民意，早日实行“金建制”。这就完全暴露了邵的政治面目。

1923年“金建”风潮平息后，殖民当局对邵尚俭的政治表现最为赏识，特以所谓“民间代表”任务，委任为敌伪大连市会议员。由于邵甘心为日本卖力，殖民当局赏给他的官职也逐年增加。到日本投降为止，邵先后担任关东州厅参事。关东州物价委员会委员、满洲银行董事、国民精神总动员东州中央实行委员会委员、关东州课税调查委员会委员、日满实业协会关东州支部复支部长、关东州神宫俸仕会理事、满独（德）伊（意）协会理事、关东州兴亚奉公联盟评议员、海军协会满州本部评议员、大连市民体育协会理事、日满实业协会副会长、大连经济会副会头、泰东日报社监察役、关东州振兴教育会副会长等28个之多。

1940年邵尚俭在庆祝六十岁生日时，日本天皇授予他六位官阶勋章一枚，以奖励他对日本的效忠。邵认为这是他一生中之殊荣，因而恭敬地遥拜东京，向日本天皇谢恩。此后邵尚俭在各种场合对此加以炫耀。

1941年太平洋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大连实行更加残酷的统治，邵尚俭为讨好殖民当局，首先支持把大连油坊业按战时生产体制加以合并。殖民当局把大连市仅剩的27家华商油坊合并为二大户。以邵尚俭的“天兴福”油坊为核心联合本地帮其他16户油坊组成“协和制油株式会社”，邵任社长兼总经理。另一大户是山东帮9家油坊组成的“大东制油株式会社”。

1942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随着它侵略战争的失败，经济形势愈趋恶化，为支援日本侵略战争作垂死挣扎，大连殖民当局极力搜刮全市商民财物，强迫商民捐拿所谓“报国献金”。邵商建以市商会名义向全市商民无耻地宣扬“要无私奉公，集结总力以支援战争”，“要报国（日本）必须有贡献于战争”，“此乃皇民伟大之觉悟”，“要树立与日本帝国共同生死之观念”。

1944年5月7日，日寇为了悼念其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古贺元帅阵亡，借《泰东日报》社召开座谈会。邵尚俭在会场痛哭流涕，悲不欲生。他要求“州人（大连人）一百六十万人大家一心，多增产，多储蓄，要为古贺元帅和一年前殉难战死的山本元帅雪仇决战，特别是捐献飞机，送往前线，希州民有粉身碎骨，为国（日帝）敢斗之精神……”。

1944年10月21日，关东州兴亚奉公联盟本部鉴于战局对日本日趋不利，为安定人心，又召开“追击英美宇宙之必胜信念”大会，邵尚俭在大会上无耻地表示：“身为皇民一份子，应自觉所负之义务，国（日本）之兴亡，匹夫有责，要扶翼皇谟，精忠报国，死而后已……。”

## 五、邵尚俭和“天兴福”之结局

邵尚俭在日本殖民当局扶持下，虽然担任敌伪要职甚多，但他主要精力还是在“天兴福”企业。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大连市商业已处于衰败时期，“天兴福企业”亦不如以往兴盛，随着日寇经济统治的深化，邵尚俭对职工的剥削也越来越厉害，因此引起广大职工的反抗。1924年哈尔滨“天兴福”第二制粉厂突然起火，燃烧达一昼夜之久。消防队借机向该厂索取面粉和现款。二厂自恃邵尚俭势大，未予理会，故救火车直到火块燃尽时，才开赴现场敷衍一下。致使二厂设备、原料、产品损失严重。据当时在场职工回忆，起火原因是失火前工人已知是机电电源漏电，但由于对邵不满，因此无人去管。邵得知后气急败坏地由大连赶到哈市，将两名青年工人以放火嫌疑为名扭送警察署要求严办。警察署转送法院要判刑，邵尚俭又把二名工人要了回来。原因是判刑后厂方还得送钱酬报警察和法官，邵认为这样不合算，故演出了一场“捉放曹”，在哈市成为笑谈。

二厂火灾，使邵尚俭在北满的经济实力遭受沉重打击。他曾请求德亚洋行买办帮忙购买德国新设备，企图重建二分厂。终因德国方面战事紧张而未办

成。直至 1945 年解放前夕，邵在北满的分厂生产完全依靠二分厂承担。但二分厂规模小，产量少，因此获利也就不多。加上日本对东北粮食统购的限制，迫使邵放弃了早年以先存积原料，而后再卖出面粉的营业方针，代之以边买原料，边制产品，边卖面粉的经营方式。由于原料价格逐年增高，所获利润也只能逐年抵消，使生产经常处于被动局面，这就不可避免地日益处于衰落的境地。

日本投降后，邵与张本政欺骗苏联驻军当局，组织了一个所谓“中国人会”。后又改成“大连市治安维持会”。张、邵分任正副会长，企图捞取政治资本，仍可保持他们的地位。但他俩的梦想落空了，大连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天兴福”各企业的职工群众纷纷向邵尚俭清算。大连市地方法院接受人民群众的揭发检举，依法将邵尚俭逮捕。1947 年 4 月，大连地方法院以附敌祸国之汉奸罪，判处邵有期徒刑 15 年，剥夺公民权终身，没收所有“天兴福”企业（包括并入协和制油会社邵尚俭之股金部分）和邵所有之房屋、土地、果树园等全部财产。

大连地方法院对邵尚俭的严正判决，是他应得的历史惩罚。但大连地方法院根据民主政府宽大之精神，念其年老体衰，准将 15 年徒刑暂缓执行，并允其保外就医。1950 年邵尚俭死于北京。

（大连市工商联文史办供稿）

## 康有为来连锁记

宫柳村

康有为先生，晚年客居青岛。风尘小住，思作漫游。在人陪护下，于民国14年（1925年）秋，至山东芝罘（烟台）作客。当时大连华商公议会会长李子明在芝罘养病新痊，会晤康先生多次，相得甚欢，因约来连。行前李会长致电大连华商公议会，特嘱李松山率华董等至码头迎接。抵连后，下榻大和旅馆（现大连宾馆），大连名流以一簪先生容颜为慰，下车伊始，中外记者及各界来访者络绎不绝，并请先生演讲及举办书法展览。大连华商公议会还特设宴招待，以示欢迎。我亦有幸参与盛会。现就当时见闻，笔录如下：

1. 欢迎会：大连华商公议会宴请康有为先生是在监部通（现长江路）泰华楼饭店，全体董事及华侨多人参加作陪。是日康先生，身着便服，长袍马褂，整洁朴素，童颜鹤发，文雅可亲。甫入座，人们争相致敬。席间，宾主联欢，觥筹交错，气氛十分融洽。席散，华商董事全体于康先生一同合影留念。

康先生回青岛后，为华商公议会全体董事各书一条副，副邮寄赠，我也收到一副，可惜，已在解放后遗失。

2. 答记者问：大连满州日日新闻记者访康先生时谈话情况如下：

记者问：中国军阀，割据称雄，连年混战，匪患日滋、危害地方，人民涂炭，先生乃当今中国圣人，必有长治久安之计，东山在望，未悉其意若何？

答：中国军阀，并非在作战，只是如小儿嬉戏，正在练武。但是不久练成，就将对付外国侵略者了！

中国现在正如航行中流，适值狂风海浪，不久自然平安无事，但此种风浪渐必至于海洋，外国船只，当然亦将不可避免地遇到，前途安危，正未可预测。

记者听后，俯首称是，默默而退。

3. 演讲会：演讲题为“电通”。地址在大每馆（每日新闻社址，在金胜利桥北）。是日下午 6 时起，听讲者纷至，室内挤满听众，日本人较中国人尤多。

先生当时演讲，详细内容，已难追忆，但曾言及“人要立志坚贞，持身忠信。凡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犹如电波传达消息，不论远近全能到达，心城则灵，随感而通。……”云云。

4. 书法展：地址在大每馆，先生拿出他平生精粹得意书法联副数百件交付展览，满室琳琅夺目，观者无不赞美。其书法体例，真行篆隶兼备，纯临汉魏碑铭，书法博雅古朴，风格超逸，自成一家。其所用印章，方形篆书阳文：“维新百日，出亡十四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共 27 字。

展览会原预定为一星期，但开展仅二日，室内所悬字幅已被抢购一空，可见喜爱先生书法的人之多。

后来康先生又由大连到沈阳稍作逗留，转道天津回青岛。

## 李秉衡籍贯考

张天贵

李秉衡，字鉴堂。是清光绪时期驰名中外的高级官员，以爱国清廉著称。

《清史稿》列传载：“李秉衡，字鉴堂，奉天海城人”。《奉天通志》载：“李秉衡，字鉴堂，海城县人。”新编《辞海》历史分册载：“李秉衡（1830——1900）清末奉天海城（今属辽宁）人。”

李秉衡时海城人吗？我认为值得考证。

民国 13 年（1924）《海城县志》载：“李秉衡，字鉴堂，海城藉（籍）。居岫岩县青堆子……。”清末到民国时的《岫岩县志》，没提到岫岩在历史上归海城县管辖，岫岩县志办公室的同志查阅了很多历史资料，考证岫岩县历史沿革问题，写成《岫岩县建置沿革考》。这篇文章的清代部分也没提到岫岩归海城县管辖过。据《盛京通志》载：“岫岩城本朝初隶盖平县。乾隆三十七年（1772）置岫岩厅，隶奉天府。”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岫岩设理事通判关防。乾隆四十七年（1782），将凤凰城归属岫岩理事通判兼管。道光十一年（1831），改为岫岩凤凰城海防通判关防。光绪二年（1876），改为岫岩州，归凤凰厅管辖。光绪三十二年（1906）将岫岩州南部庄河、大孤山一带划为庄河直隶厅。青堆子在清朝先归岫岩厅、州管辖，后归庄河厅管辖。民国 10 年《庄河县志》记载：“李秉衡，字鉴堂，祖居城东（指庄河县城）七十里石嘴子也。”石嘴子屯在青堆子东北八华里。上述可见，李秉衡不是海城人，而是庄河人。

那么，《清史稿》等书为什么都说李秉衡是海城人呢？光绪辛丑年（1901）刊印的《李氏宗谱》曾有这样记载：“（李）协（李秉衡曾祖）。号万章，德元公第一子。乾隆三十九年（1774）由山东迁奉天入海城籍住岫岩厅

南石嘴子。”《清史稿》可能就是依据这一记载，认定李秉衡是海城人的。其它史籍相沿而载。按照清朝史册记载，奉天地方建制有府、厅、州、县之别。依次而论，县是归属府、厅、州管辖，厅不归县管辖。说岫岩厅归海城县管辖，是与理不通的。即使李协从山东到石嘴子落户时岫岩厅真归海城县管辖过，可是到李秉衡出生时已经历了五十六年之久。行政区划几经变迁。特别是乾隆四十七年岫岩凤凰城合并建制，海城县根本没管到这一带。李秉衡出生于道光十年（1830年）。当时行政建制变化情况是：“道光六年（1826），吏部议复奉天附属岫岩凤凰城，环山滨海，密迩外藩，烟户众多，讼谍纷繁，应将岫岩理事通判准改岫岩凤凰城海防通判。道光十一年（1831）请领改铸‘奉天岫岩凤凰城海防通判关防’”（引自《岫岩志略》）。据此而论，李秉衡籍贯也不是海城县，而是岫岩凤凰城海防通判关防，相当于厅、州。《李氏宗谱》为什么会写上“海城籍”字样呢？这有一段因有的。李秉衡父亲李辉德求学和考举人时，岫岩厅没有名额，海城县有名额，不得不假报海城县籍。《李氏宗谱》载：“岫无学额，寄著海城县籍。年十九入县学食饩。嘉庆丙子科领乡荐为王牲榜。道光乙未会试后大挑一等，以知县试用江苏。”李秉衡父亲既然假报海城县籍，那么写《李氏宗谱》时，就值得真假相并，写成“海城籍住岫岩厅南石嘴子”。不然，就要犯欺君之罪。《海城县志》（民国13年编）是在《李氏宗谱》、《清史稿》成书之后编写的，当然要照抄李秉衡的籍贯。其实，在海城县境内查不到李秉衡的故居。

李秉衡故居和祖坟。都在庄河县石嘴子。《东北名胜古迹轶闻》一书，对李秉衡故居有这样记载：“查李公生前，宦游廿载，历官三省，政声昭著，歿后毫无积蓄。公起家田间。在石嘴子北里许，有草庐六楹，矮墙不及三尺。迨位极人臣，权倾中外，家中未筑一室，其宅右有公之祖坟，仍如常人，并无修饰。”李秉衡做高官之后，因虑国难时艰，没建官宅，只是在老宅门前竖起两

个大旗杆，标志着家中有做高官的（旗杆和夹杆石已毁，尚遗草房五间）。李秉衡祖坟在后石嘴屯南，东依九顶凤凰山，西向歇马山和高丽城山（墓已毁）。《李氏宗谱》记载：“李秉衡祖父李枝孜，行二，生于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十四日亥时，歿于道光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寅时，享年 80 岁，葬在李协墓前”。李秉衡父亲李辉德，行一，生于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初八日子时，歿于同治九年五月初七日巳时。享年 80 岁。葬在是嘴子新莹，卯山西向，以高丽城子山迤南突起孤峰如案者为照山。李氏老莹在西，新莹在东，相距不过数百米。

有人会问，李秉衡既然是庄河县石嘴子人，为什么抗击八国联军殉国后却葬在河南安阳活水村呢？这里也顺便说一说。李秉衡在甲午中日战争时任山东巡抚，后隐巨野教案贬官。起先，他到保定府满城县隐居。其婿朱宽是河南安阳人，劝他到安阳去住，因而把家眷迁到安阳孤城内唐子巷。李秉衡后来再次被朝廷起用，从巡阅长江水师大臣任上北去勤王抗击八国联军，当时身边贴己人只有长子李政均和他的好友马丕瑶次子马吉樟。李秉衡殉国后，李政均和马吉樟考虑处于战乱之中，又不知去石嘴子故居的途径，所以就护送李秉衡灵柩到安阳。马吉樟的哥哥叫马吉森，懂勘舆，便给选择了一处墓地安葬了，即安阳西南十二里活水村南岗，西山南向。现在安阳市内尚有李秉衡后裔居住。

（本文作者系庄河县旅游局退休干部）



## 大连解放初期共产党人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情况的概述

乔传珏 口述 王胜利、于礼萍 记录 整理

时间迅速，光阴荏苒，转瞬 40 余年过去了，但是，解放初期党对我们党外人士的信任和真诚合作的情景仍然萦绕在我的心间。

### （一）在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过程中与党外人士密切合作

#### 1. 建立政权

旅大民主政权是 1945 年底建立的。据后来韩光同志对我说，早期便有地下党在大连开展工作，1945 年他受东北局的派遣到连与陈云涛同志负责着手建立了大连民主政权。陈云涛任副市长，朱秀春任秘书长。我是 1946 年 2 月才有农村到大连来工作的。当时大连、旅顺、金县等已相继成立了市县政府，为了更好地起到全面协调领导作用，1946 年下半年成立了“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我被聘为这个行政联合办事处的成员，主任由迟子祥兼，副主任是刘幸垣（即刘顺垣）。

我是在我念旅顺公大时的同学张有萱的引导下参加工作的，当时我并不了解他的政治身份，但他多次与我接触，帮助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我和韩光同志谈到了这段事时，韩光同志说，那时张有萱对我进行工作的情况党都是了解的。参加工作后，当信任我培养我，让我担负重要工作，使我亲身经历了一些大的事件。

#### 2. 成立关东署，改革货币，粉碎国民党视察团的阴谋

1947年春，胡宗南军进犯延安时，国民党气焰十分嚣张，除大举进攻东北外，他们还多次向苏军提出接管旅大政权的要求，均被拒绝。后借口旅大有八路军、共产党，在征得苏联驻军同意的情况下，1947年春，国民党以董彦平为首的视察团一行12人到连视察。对此我党采取了成立正式政府，进行货币登记、兑换、加贴印花等一系列相应的对付措施。

关东公署的成立大会是在旅顺文化馆召开的。各界人士代表都出席了大会。我作为代表也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为副主席。主席是迟子祥，副主席还有刘顺元，秘书长是陈瑞光。关东公署设公安局和八大厅：公安局局长周光，民政厅厅长张致远；教育厅厅长孙廷烈；财政厅厅长宋承章（党外），副厅长孙跃庭（党外）；商业厅厅长于鹏九（党外）；农林厅厅长林基永，副厅长周明安（党外）；工业厅厅长陈国立（党外），副厅长张有萱。交通厅长庞大海（党外），副厅长刘松年；卫生厅厅长杨凤鸣（党外），副厅长王布君。在设立副职的过程中是有斗争的，特别是财政厅副职的设立，党同迟子祥是有斗争的，当时我党采取的是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右翼的策略。

货币改革的目的是预防视察团到连后乘机在大连套购物资，搅乱金融，制造通货膨胀。为此，中共旅大地委发出在关东地区实行苏军用票登记盖印的通知，并限期5天完成登记和盖印工作。韩光同志亲自领导并吸收我们一些党外的同志具体参与了这项工作，经过三昼夜突击，完成了这项任务。视察团到来前我们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完成。视察团到连后，我参加了部分接待工作，由于我们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及时和充分，视察团一无所获，在套购物资方面不仅没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且连生活费用都成了大问题，最后灰溜溜地离开了大连。

### 3. 政府、中苏友协和学生们对话，唤起了他们的觉醒

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是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的。但是由于党组织尚未公开，给开展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一些站在反动立场上的坏人不断煽动闹事。听说1945年政府成立不久，上千名学生在斯大林广场上呼喊反民主政权的

口号。对此，党对他们没有镇压，而是采取对话的形式，在市政府礼堂，陈云涛和中苏友好协会会长陈瑞光耐心地向学生代表做宣传解释工作，最后不仅平息了这场骚乱，而且赢得了同学们对民主政权的了解和支持，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通过这个对话，我进一步体会到了共产党人胸怀广大、光明磊落。

## （二）发展生产、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中注意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

日本投降前后，我市各家工厂和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为此党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如对大厂矿实行中苏合营，召开农业劳模大会，办工业农业展览馆等。1948年办工业展览馆时，我是筹委会主任。在筹办过程中，旅大地委书记欧阳钦、第一副书记韩光等亲自前往检查指导工作，使这个展览馆开馆后有了较大的影响，对推动我市工业生产发展起了较好的作用。宋庆龄和北京一些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也曾到馆参观，并给予较好的评价。

1946年我在西岗区一个同学家中聚会部分同学，成立了“辽东技术协会”，大家推选我做会长，张有萱为副会长，范正强为秘书长。1946年召开旅大第二届临时参议会时，我和其他同志做为辽东技术协会团体会员出席了会议。会上我们提出的“建议成立大连工业专科学校”的议案，受到了韩光同志的重视，经过讨论，他让我负责着手创建大连工业专科学校。对此我既高兴又忐忑不安。在韩光和张致远等领导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多处找人约洁同学等共20人作教师，然后又在朱秀春秘书长的陪同下，去中长铁路分局租借了原南满工专的校址，办起了“大连工业专门学校”学校。设机械冶金、化工、采矿三个系。我任校长（无副校长），孙廷烈任教务主任，党组织又派陈维帆同志任教导主任（负责对师生的政治教育）。在此前后，政府还建立了建国学院（院长韩光），文专、电专等校，培养造就了大批的人才。

在发展科技文化方面，不仅是市领导重视信任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十分看重我们，这使我们党外的同志深受鼓舞。记得是 1951 年春夏之际，周恩来、邓颖超同志来到大连休养，我得知这个情况后，便向朱新阳（当时是副市长，市委统战部长）提出见见总理的请求。提出后我又担心总理工作很忙，能接见我吗，但没料到翌日总理就接见了。谈话中总理问长问短，并亲切地对我说，听说你正在筹建自然科学联合会，希望你能借这个联合会的成立向知识界的朋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总理对我们党外人士亲切的关怀和信任，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952 年，梅兰芳剧团来连演出时，市政府专门成立 3 个接待组，由我担任接待组的组长，专门负责对梅剧团的全面接待工作。梅剧团下榻大连宾馆，市委主要领导欧阳钦等接见和招待梅剧团，充分体现了党对文化界人士的高度重视。

我亲身参与了党所领导进行的恢复生产发展教育等工作，体验了党的方针路线的正确性。1949 年纪念党的生日，市委召开活动分子大会时（会场设在群众剧场），党进一步提出发展生产、改善民主、发展文化、培养干部的口号。在这个大会上，我代表党外民主人士讲了话，我认为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 （三）党在抗美援朝和镇反、三反、五反运动中关怀信任党外人士

#### 1. 赴朝慰问

1952 年中共中央组织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时，我和民盟的陈先舟同志参加了东北分团（当时我已是民盟成员），团长是陈先舟，副团长是东北某军的政委，关梦觉是秘书长，我和巩天民任副秘书长。此次赴朝慰问，党给了我一次很好的思想教育的机会，看到美帝国主义对朝鲜国土的狂轰乱炸，对朝鲜人民的残酷杀戮，满目烟尘，满目焦土，人民子弟兵舍生忘死的战斗情景，使我更加坚定了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的决心。

#### 2. 镇压反革命

1950年起，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我市在镇反运动中，实行了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办法，成立了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掌管所有重大案件的审核工作。张志诚（统战部副部长）任主任，我和台盟负责人简仁南同志担任副主任。而且在执行对迟子祥枪决时，我还被指定为“监斩官”，这是党对我的莫大信任。

### 3. 三反五反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经济情报”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一次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党对我们民主人士也表现了充分的信任。如1952年时，我兼任市工业局局长，市委分工朱新阳在工业局蹲点。我们几乎天天见面，可是有几天我没看到他，我以为他办别的事去了。这时韩光把我叫到家里，向我通报了朱新

阳因犯生活作风错误被逮捕押往沈阳的情况。这种事当时是未公开的，共产党内出的问题，党的领导同志能及时向党外人士通报情况，确实说明党对我们党外人士是肝胆相照，十分信任的。

总之，从解放初期以来，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使我深深感到了党的关怀、信任、真诚和肝胆相照，共产党确实确实代表了全民的利益，只有共产党才能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责任。’

（乔传珏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 大连地区建国前的台湾人及其组织状况

郭玮

台湾人流入大连地区始于本世纪初，至今已有近九十年的历史。他们与大连人民同生活、共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 一、 移居大连的台湾人

台湾人民自 1895 年日本侵占台湾时起，就不断以各种方式开展抗日活动。在高压统治下，大批台湾人被迫流亡大陆寻找生路。据调查，移居大连的台湾人，从本世纪初到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时止，共有 700 余人。移居的原因是：

第一，一批受过高等医学教育的青年来连寻找出路

最早一批来大连的人当中，有孟天成（1911 年），简仁南、徐荣、陈章哲、江涂龙（20 年代）等人。他们当时都不到 30 岁。这些人出身贫寒，经个人奋斗，选择了在殖民地被认为较为自由的职业——医生。他们来到大连，希望能够实现个人腾飞的宿愿。在他们之后，又相继来了一批医学院校毕业生，在这里立业成家。因此，在大连的老一代台湾人中，从事医务工作的人占很大的比例，他们也是“创业的一代”。

第二，一批失业失学的青年人，因生活所迫，来连投亲靠友

他们主要是在三、四十年代到来的。有些来连后在台湾人开设的医院里工

作、学习、后来成为医师、护士、助产士、药剂师、技工和职员等；有些经过一段工作，在亲友支助下，升入各类学校，或考取专业资格，这部分人的数目也不小。

第三，大连与台湾通航后，一批台湾商人来连经商

1906年9月“关东都督府”（后改为关东州厅）成立，宣布大连为自由贸易港，从此大连进出口贸易发展十分迅速。大连与台湾直接通航后，有一批商人从台湾到大连经商。他们主要经营、批发台湾的土特产品。规模多为中小型，有的设门点，有的携眷在大连驻在，主要集中在西岗商业区。还有极少数无业游民，他们或进行贩私，或从事一些临时工作。

第四，有少部分在大连高等学校读书的学生和从事工部技术工作

每年都有一批台湾青年来大连，考入旅顺工科大学、大连南满洲工业专门学校和旅顺医专。毕业后有的留在本地，在研究所、造船、铁路、医院工作（其中有些是从日本国内工科大学毕业来连的，也有些人毕业后就离连到外地工作。）

第五，从台湾带来的丫鬟

少数岛内贫苦家庭的女孩子，被作为丫鬟带来大连。她们都是在台湾人家中做佣人，其中有些人解放后返台，有些人与本地人结了婚。

## 二、台湾人的地位及其影响

解放前，在大连的台湾人的地位，有其一定特殊性。例如配给细粮与日本人相同，子女可入日本人学校。这是日本统治者采取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一贯方法。

日本统治时期的大连，老百姓当中流传着“关东州”的居民是分等级的说法，头等是日本人，其次是朝鲜人和台湾人，再次是“关东州”人，然后是“满洲”人，最后是山东人。山东人主要以体力劳动谋生，被称为“寄留民”

（只能报临时户口）。在“关东州厅”的人口统计中，居民“国籍别”分为：内地人（指日本人）、朝鲜人、满支人和外国人四类，这里把台湾人放在满支人当中。总之复杂情况，构成了大连地区台湾人的一定特殊地位。

在大连的台湾人中，从职业上看，从事医务和贸易的占绝大多数，没有充当官吏和警宪的。当时在社会上被尊重和有一定地位的算是医生了。解放前在大连医院（即大连铁路医院）当过医生的台湾人有：孟天成、简仁南、傅元煊、郑国辉、林呈瑞、洪礼锋以及在分院（同寿医院）的赖雅征、高梦雄、谢项等十余人。但在这里的中国医生（包

括台湾籍医生）与日本医生的待遇是不同的，例如：在 1940 年前后，同是“医员补”，中国医生的基本工资每月 90 日圆，日本医生 135 日圆；“医员”的基本工资，中国医生是 150 日圆，日本医生是 225 日圆。此外，日本医生在晋升上比中国医生容易得多，中国医生能升到“医员”的很少。

由于中国人工资收入有限，以及种种歧视限制，许多台湾籍医生在取得一定资历之后，多走上独立开业的道路。自 1917 年孟天成开设博爱医院之后，陆续开业的有陈英的普爱医院、简仁南的仁和医院、杨燧人的民生医院、徐荣的春华医院、傅元煊（医学博士）的大同医院、江徐龙（医学博士）的回生医院、陈章哲的仁济医院、王祖阶的同德医院。卢昆山的慈爱医院（瓦房店）、洪顶霖的洪光医院（旅顺）、卢清池的清池齿科医院、陈远堂的大华牙科医院以及郭进木、郑国辉、吕天饮、高梦雄、刘万、林肇周、蔡宝章、江文勇等人开设的 20 多所私人医院或诊所。他们所创建的事业，给大连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大连的台湾商人主要经销香蕉、菠萝、桔子、茶叶、草帽、席子、米粉等。经销台湾茶叶的就有五六家之多，仅在西岗新开路大街路口一处就开设有“大欲茶行”，“大荣茶行”等三家。此外，也有人在“红灯街”开设新式的“罗斯马利”咖啡厅（内有舞女）。还有的开设代理店，经销大宗粮豆等。由于他们资金少，店铺小，时间短，因此，在大连商业界没有什么地位，影响



也不大。他们只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中，与其他台湾人没有什么往来，在社会上没有扎下根基。因此，解放后都回归台湾去了。

解放前，在大连的台湾人，影响较大的有孟天成和简仁南两位医学博士，至今熟悉大连过去历史的老人都没有忘记他们。

孟天成（1881—1966），毕业于台湾总督府医学校，1911年来大连医院任医师，不久任大连“宏济善堂”医院医务主任。1917年创办博爱医院，经三十年的经营，医院不断扩大，逐步形成一所包括两处分院，400余张床位的大连地区规模最大、门类较为齐全的综合性和私人医院。大连解放后，孟天成将医院交给了政府，并继续担任该院院长。30年代，同研究里热病而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医术上，尤精外科手术，他经常把个人手术成败的经验教训告诉别人，受到同行们的尊重。由于他的高尚医德、精湛的医术，一生治愈了数以万计的病人，受到大连地区广大人民群众赞扬。

简仁南（1897—1969），早年在台湾医专读书时，就参加了进步文化团体——台湾文化协会，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思想。1922年因参加抗议日本侵略者成立“台湾议会”的签名运动，被开除公职而流亡大连。开始任大连医院外科医师。1928年开设仁和医院。1940年以《动脉硬化症的实验研究》为主要论文，获医学博士学位。他除了履行一个医生的职责外，还经常接触社会，同清贫病的劳动人民，为人正直，乐善好施，积极参加各种有益于中国人的社会事业的活动。

1924年6月，简仁南参加了大连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并被选为副会长。该会主要开展普及教育活动。简在兼任该会小学校长期间，克服许多困难，为普及和提高贫民子女的文化知识做出了很大贡献。

大连解放后，简仁南热爱人民的事业，主动将个人所办医院的设备和房产献给政府，本人积极参加大连市的卫生行政领导工作。1946年被聘为大连医学

院的解剖学、外科教授。1948年在解放战争中，参加辽南军区手术队，任小队长，活跃在前方。

在大连的台湾人有的还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1941年，台湾人黄再传（仁和医院X光技师），经该院药房地下工作者老孙头介绍，经常和在大连开药房的林某接触，多方采购医药用品支援山东八路军抗日活动。一次偷运药品，他本人也准备一起去山东解放区时，不幸被黑嘴子水上警察发现而被捕。由于谎称去山东开业，又经多方营救，被关押半年后释放。但因牢中待遇恶劣患上肺结核，出狱后到台湾养病，回连时把蔡行铸（原大连儿童医院副院长，现大连市台联会顾问）带到大连。黄再传于1946年病故在大连。

### 三、“大连市台湾省同乡会”的成立及大批台湾人离连归台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广大台胞拍手称快。当时在本地台湾人中，产生一股思乡怀旧上情，加上许多人面临失业、失学的威胁，于是纷纷要求归台。

为了增进乡谊、帮助克服困难，1945年9月6日，一部分台胞自发筹建“大连市台湾省同乡会”，并确定9月9日正式成立。但由于种种原因直至1946年12月2日，才向当时的大连市政府上报创立同乡会的《呈请书》，12月9日得到正式批准。同乡会的《简章》共有8章、18条。经过会议，民主选出会长孟天成、副会长简仁南；常任董事：傅元煊、陈仲凯；总务股长、董事：叶英生；会计股长、董事：合金登；书记长、董事：江涂龙；董事：黄皆明、徐荣、林显宗、姚清河。1948年6月1日，又补选二名委员：许义松和苏茂寅。

参加台湾同乡会的台胞（包括家属），总计有388人。同乡会每月集体活动一次，并按月向大连市政府上报《工作呈报表》，内容主要是：会员变动情

况和组织活动情况。一是关于救济生活困难户及赞助回乡贫民的情况；二是政治学习的情况。当时主要学习新人生观和新民主主义论以及配合形势进行活动，以提高台胞的政治觉悟。

台湾同乡会成立后，积极帮助生活困难、家乡有事的台胞办理回乡手续。从1946年3月到1947年7月，经同乡会向市政府提出106次申请，约有85%以上在连的台湾人离开了大连。只有少数医务人员因工作需要而未能成行。

由于全国形势的迅速发展，许多留连的台湾同胞陆续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为同乡会形式存在的社团，已显得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完成本会历史任务之后，于1949年3月15日向政府呈请解散，3月18日正式得到批准。

#### 四、大连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成立

1948年初夏，最后一批台胞回乡后，留在大连的台胞仅有20余户百余人，那时台湾同乡会还没有解散，大家约定每月在简仁南家聚会一次，交流情况、增进情谊。后从解放来连工作的台胞宋明（苏子衡）一家，与简仁南取得联系，也参加了这个聚会。1949年3月，虽然台湾同乡会宣告解散，但上述的这个台湾人的聚会没有终止。不久，由于对国民党镇压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不满，离台经香港来连的李辰、陈文、周辉被聘（为大连医学院教授、副教授），也参加到这个聚会之中。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甘莹（苏子衡的爱人）去上海参加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总部的工作，7、8月间她在给苏子衡的信中，传达了台盟总部要求在东北台胞集中的大连组建台盟支部的意见。据此，苏子衡开始在台湾人中，积极进行工作。并于8月8日向中共旅大区党委正式提出筹备成立大连台盟支部的申请，8月28日，区党委批准筹建。经过一段酝酿。初步提出了干部名单。

9月16日，由中共旅大区党委组织部长傅忠海主持，召集参加筹备组工作的同志开会，会上向大家介绍了从延安来连工作的沈扶和黎舒林夫妇（都是台胞）。二人也参预了台盟的筹建工作。经半年多的酝酿，台盟旅大特别支部于1949年12月11日被正式批准成立。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是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成立的。后来把总部迁到了上海。台盟旅大特别支部是台盟在全国成立较早的一个地方组织。

台盟旅大特别支部成立大会于1950年4月2日在大连饭店举行。参加大会的有盟员23人、同乡16人、来宾26人，共65人。经选举产生主任简江南、副主任沈扶和宋明；委员：宋明、李辰、沈扶、简仁南、许义松、黎舒林、陈俊贵，周辉、卢淑贤、黄启章、黄清琴、陈文等十二人。秘书处：许义松、黄启章、黄清琴；组织部：沈扶、李辰、陈俊贵；宣传部：宋明、黎舒林、周辉；妇女部：卢淑贤、黎舒林。

1954年，台盟旅大特别支部改为台盟旅大市支部，1984年改为台盟大连市分部，1986年又改为台盟大连市委委员会。

注：

本文撰写过程中参阅了有关档案资料，并调查走访了黄启章（大连市政协副主席。大连市台盟主委）、蔡行铸《大连市台联会顾问》、卢淑贤（简仁南夫人）等。

（本文作者为大连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研室副教授）

## 西甸子农民的反占田斗争

钟有江

西甸子，位于金州三十里堡镇西四里处。面积约5000亩。清朝时是伍田地（军用牧场），俄国侵占旅大后此处不再作为牧场，于是附近农民便开始在此垦殖稻田。追至1919年这里共有农民115户，稻田3000亩左右。1905年，日本侵占大连后，疯狂地掠夺土地资源，把土地、荒山、荒

地、沼泽池塘等全部划归“官有”，然后再转给日本资本家经营。对西甸子稻田他们也要千方百计地占领。首先，他们扬言，中国人种不好水稻，日本移民才能种好水稻。1920年前后，日本统治者又指使日本人野田伊久马、野田斧吉兄弟二人在水田附近开垦荒地若干亩后，便严禁当地农民继续开垦，企图寻找借口和时机强占这块土地。后来日本资本家和田笃郎也看中了这片稻田，便趁着日本官方经营的“关东都督府农事试验场”要从大连迁往金州之机，买通金州民政署殖产课课长木村等人，在金州东门外征购了376亩民田，献给官方作为试验场用地。以此要求换取西甸子3000亩土地的承领权。日本统治者答应了和田的要求，并以此为借口强占稻田，引起了一场激烈的时达一年半之久的反占田斗争。

#### 一、占田

1920年3月16日，金州民政署把野田伊久马、野田斧吉、和田笃郎找去密商，决定以满州开垦株式会社的名义征用西甸子稻田，并议定：①由野田兄弟二人首先把稻田交出来，由和田笃郎赔偿其垦殖费470元（将来用股票算），野田兄弟二人将来都可作为会社的股东；②赔偿野田垦殖费的事，要严守秘密不得让中国人知道；③不立字据，由角南警务课长、木村殖产课长、守屋庶务课长3人作保。

密谋后，3月20日，金州民政署长小早川贞登带领其部下，偕同和田笃郎来到三十里堡警察派出所，把西甸子农民全部传唤到所宣布征田命令。小早川贞登恶狠狠地注视着大家，以严厉的口气宣布道：现在西甸子的稻田全部收为官方所有，和田笃郎因为建农事试验场地有功，现在把这些稻田都转给他经营，有愿意继续种植的，可直接跟和田笃郎签订租约，租期一年，产粮对半分。不愿种者听便。

金州民政署这种强占土地的做法，激起当时在场农民的极大愤慨。小早川贞登的话音刚落，农民韩吉贵和村长王忠玉便愤而挺身抗争道：“官地下放，应当按荒作价，由开垦多年的农民优先领受，而今竟突然放给别人，岂有此理！”小早川贞登自知理亏，恼羞成怒，拍案吼道：“官用官地，官收官地，你们俩为什么不执行，快快给我滚蛋！”当即把二人赶出会堂。当时野田兄弟二人也在场，按照在金州民政署的密约，他俩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首先与和田签订了租约。接着小早川贞登又强迫其余的农民

跟和田签订了租约。日本统治者就这样把农民们耕作多年和赖以生存的稻田全部给夺去了。

## 二、编辑登报揭露

西甸子农民不甘心辛勤垦殖的土地被白白夺去，便四处求人告状。当时有位家住三十里堡镇西宫家村，名叫宫清荣的小伙子。认识两个日本人，一个叫中江浩平，一个叫梅琦真一。这两个日本人也早就垂涎这块水田，在和田笃郎之前也曾提出承领西甸子土地的申请。今见西甸子土地被和田笃郎一人承领去后，他俩心中十分怨恨官署，决定利用农民的不满进行报复，于是便来找当时在梅琦代书所当事务员的宫清荣，要宫清荣串通西甸子农民告状，表示他俩愿意从中帮忙。宫清荣把这件事传给西甸子农民时，农民也正在研究告状的事，于是失地的农民便推举王忠玉、韩吉贵、黄德安、朱永岱、何永升 5 人为代表，找小学教师朱永槐写了“请愿书”，农民们联名盖章后，通过宫清荣，于当年 5 月 26 日到大连找到那两个日本人。两个日本人一见“请愿书”便喜出望外，认为泄恨的机会到了。局外人不怕乱子大，他俩满口答应替农民递交这份“请愿书”。

三天后，两个日本人把“请愿书”递交给关东厅长官山县伊三郎。并另抄写两份，分别寄给《辽东日报》和《大连新闻》，希望报纸唤起社会的舆论。

两家报纸接到投递来的“请愿书”后，碍于日本人脸面，没有给报道。《泰东日报》编辑长傅立鱼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出于对农民的同情，在一个雨天里来到三十里堡，亲自做了调查。回社后他就把金州民政署与和田笃郎相勾结，欺压农民强占土地的真相在报纸上给予揭露。标题十分醒目：“金州民政署暴行，内容评述了日本人残暴占地，使农民无法生计的事实。这在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

## 三、警方强行镇压

强占民田的暴行被报纸揭露后，金州民政署长小早川十分恼火。他在事实面前不但不认错，反而倒打一耙，说是《泰东日报》侮蔑了他，他要打官司告状。同时他又责令三十里堡警察派出所调查清楚，对敢于出头“请愿”的人强行镇压，企图把农民反占田斗争的火焰扑灭。

当年 7 月的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强占到土地的和田笃郎，得意地带领“开垦会社”的一伙人，来到西甸子察看“他”的田地，正在田里干活的农民韩吉贵一看到和田笃郎便怒从心起，拎起铁铤要砍和田笃郎的腿，吓得和田笃郎转身逃开。三十里堡警察所立即把韩吉贵逮捕，关进

了普兰店监狱。

由于韩吉贵是西甸子农民反占地“请愿”的代表之一，日本警察所便借机把其他几位代表和写“请愿书”的代笔人也都和韩吉贵殴打日本人这件事联系起来处理。村长王忠玉被撤职，朱永槐被开除小学教员籍。其他几位农民代表和宫清荣及其叔父也被传到三十里堡小衙门里大加训斥。平时还对这些人进行监视。

与此同时，和田笃郎和金州民政署长小早川等一伙日本人，还暗中买通当时关东州厅里的人。9月15日，关东州厅长官山县伊三郎无理将西甸子农民的“请愿书”驳了回来。三十里堡警察派出所得知这一消息后，像又捞到了一根稻草似的，立即召集西甸子农民代表，威胁说：关东州厅已把你们的请愿书驳回来啦！你们别再想告状啦！告到哪里也白费，就死了这条心老老实实在替和田笃郎种地吧！农民代表们听了这话后，第二天又再次联名上告请愿。但是，三十里堡警察派出所早有防备，预先在三十里堡火车站布了岗，农民代表刚走进火车站就被拦住，并从农民手里夺去“请愿书”，又在“请愿书”上加盖上“勒令取消”四个字样的印章。

#### 四、农民的游行请愿

被夺去土地的农民满腔怒火，靠镇压是压不下去的，阻拦也是拦不住的。这年秋天从监狱出来的韩吉贵，眼看农民劳动一年的成果被日本人拿走一半，他再次联合斗志坚强的赵连章、朱永岱、朱永槐等人一起来到大连。这次他们抛开前次递“请愿书”的两个日本人，通过宫清荣直接找出不畏权势，肯予仗义执言的《泰东日报》编辑长傅立鱼先生，求他给出个良策，傅立鱼先生同情农民的遭遇，答应想办法。傅立鱼心里核计，《泰东日报》社长金子雪斋（日本人），对金州民政署长小早川指控《泰东日报》侮损其名誉的事正心里有气。他认为可以利用日本人之间的这种矛盾使金子雪斋替农民说句公道话。于是，11月5日，傅立鱼把韩吉贵等5人引到金子雪斋家。经过一番交谈，金子雪斋终于表示愿意出面帮农民的忙。农民代表离开金子雪斋家后，为了进一步制造舆论赢得社会更多的同情，于11月8日组织108名失地农民来到大连举行游行请愿。为了躲过三十里堡警察派出所的堵截，这108人绕过三十里堡火车站，步行20余里，到二十里台站乘车。到大连车站下车后，列队游行。他们一面走，一面

喊，呼吁要求当局归还他们的土地。他们从大连火车站游行到《秦东日报》社，又从《秦东日报》社游行到金子雪斋的家。激起了工人、商人、学生们的极大同情。

第二日，《秦东日报》又将农民们游行请愿作了报道。报道中这样写道：“聚有百余名，扶老携幼，鸠形鹄面，情今可怜。”“哀号之声震天动地，惨不忍闻。”“一时道途围观者数百人，无不为之泪下。”

傅立鱼失生也在《秦东日报》写了题为“为三十里堡农民向山县关东长官乞命”的社论。他写道：“三十里堡之三千余亩，皆该处农民亲自开垦耕作数十年，持为生活之源者，一旦全部由官宪强收以去……农民突然失其食粮之大米，彼可怜之农民将濒于饥饿之悲境，吾人见此惨状，不禁泪下。”这种舆论的力量使日本殖民统治者深感震动。梅椅、中川也积极活动，准备利用政友、民政两大政党之间的矛盾把它提到日本国会，并请时任奉天省长的王永江从旁呼吁声援。加之开始参与占四的野田兄弟慑于舆论的压力，写信给中川，又把当初金州民政署密约的情况全盘端出，更使金州民政署处于被动地位。

## 五、日方初步让步

农民游行后，傅立自督促并陪同金子雪斋驱车来旅顺关东州厅，向山县伊三郎面呈农民的“请愿书”。金子雪斋还把他所了解到的和田笃郎的刁猾无赖，金州民政署的渎职腐败，三十里堡失地农民的悲苦惨状等情，和盘托了出来。山县长官听了后，虽有意袒护日本人，但又找不到辩护的理由，只好答应派人再调查一下。12月初，旅顺法院检事三谷与关东州厅文书课长小川，按照山县的吩咐到三十里堡调查。当调查结果完全属实后，狡猾的山县不直接办理此案，却下批给大连民政署长中野有光进行调解。中野有光接案后，揣摩到山县的应付心理，也来个拖而不办，想把农民的斗志拖垮。农民再次找到傅立自请金子雪斋催办。第二年3月，金子雪斋又一次驱车到旅顺交涉。山县不好再拖，便做出决定：让《秦东日报》社代表农民一方直接与占地的和田笃郎进行谈判解决。

《秦东日报》社代表是该社理事佐藤长治，和田笃郎的代表是开垦会社专务津田彦六。双方的谈判从3月份便开始了，但由于和田笃郎一方一再无理狡辩，直到6月份也没谈出结果。见此情况，农民们着急了。他们晓得若是照这样下去，谈到秋后也谈不好，眼看到秋的食品又要被和田笃郎拿去一半。于是，韩吉贵、赵连章、朱永岱、朱永槐4位代表，找到联络人宫清荣商量，决定直接到关东厅去找山县催办。他们5人于1921年6月20日来到关东厅，虽说没见到山县，可见到了山县的秘书高尾亭。高尾亭



接见他们后，传出山县的话来，答应抓紧督办这件事。

在农民的不断斗争下，在报纸揭露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以及在日本人之间的矛盾斗争下，和田笃郎不得不答应向农民让步。金州民政署长小早川悄悄地把诬告《泰东日报》侮损他的名誉的起诉书撤了回来。三十里堡警察派出所再也不敢阻拦和迫害农民。

1921年9月14日，双方谈判代表达成了协议：①租粮由对半分改成三七分成，农民得七，和田笃郎得三；②永不准增租，永不准改佃；③在纷争中的损失各自负担。协义书在津田彦六家写成，一式三份，签字盖章，交给农民代表存一份，和田笃郎存一份，金子雪斋存一份。于是夺地与反中夺地斗争暂告一段落。

## 六、斗争仍在继续

虽说农民们没有把土地要回来，但迫使减租一事，在当时日本统治下就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与此相反，贪婪成性的和田笃郎却不甘心失败。他背地里活动，想以千元的高价收买农民代表保存的协议书，以便赖账涨租。此招不成，继又表示预以每亩地付给30元开垦费，迫使农民退佃。但是广大失地农民谁也不理他这一招，继续与之进行抗租斗争。每年秋收后，农民多把粮食藏起来不缴，使和田笃郎经营的开垦会社因收不上租连年亏本。5年后开垦会的股票已一钱不值，不得不倒闭。和田笃郎的开垦会社倒闭之后，三十里堡事务所又把东甸子土地接收了过去。农民不管土地被谁接收，抗租斗争一直没有停息。秋收后西甸子农民家的草垛里、炕洞里，到处都藏有粮食，日本人翻也翻不着，要也要不去。这一斗争一直坚持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止。

# 复县督学记

周之风

## 一、复县政教情况

1930年3月我受省教育厅厅长吴家象指派，就任复县（今瓦房店市）督学。复县地接金州，是辽宁省当时比较重要的县。当时县政府、公安局、教育局、法院、省第十二监狱、盖县税捐局、盖复盐务缉和制验局都集中在瓦房店的新市街。

日本的南满铁道附属地，称为旧市街。铁路军、警，满铁学务课，南满洲教育会分会、瓦房店乡土资料教材编写会等机构设在此处。

县长景佐纲，是本溪县人。国立北京法政大学毕业。在故宫武英殿古物陈列所做过二年研究工作。1928年冬任复县县长。是一个比较热心教育的人。

教育局局长林荣裕，复县花椒岛人。奉天两级师范学校毕业，复县学阀，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汪兆璠是他的靠山。他在办学上，事无大小，全部

仰承汪的旨意。在用人方面也多选用一些政客与学阀推荐的人，因此局内的课长、课同、教育委员和几个较大的小学校长以及图书馆长，大都是有背景的。

## 二、复县学校状况

瓦房店是复县的行政中心，但学校并不多，仅有县立第九小学、县立第二十一小学（女校）、县立第二十三小学和县立第二图书馆，还有一所张学良设立的新民小学（校长是复县老教育家马福刚）。

这些学校里都有为日本人通风报信的人。如县立第二十三小学教员陶锡庆，新民小学教员张耀斌等，他们都领取满铁弘报课的津贴。

复县旧城（即复州城）学校比较多，有县立初级中学校，县立师范讲习所，县立女子师范讲习所，县立第一小学，县立第五小学，县立第十小学，私立普济小学，私立清真小学，县立女师附属小学等校，还有县立第一图书馆、县立印刷所等。

县立师范设在横山书院旧址，县立女师设在县儒学衙门旧址。两校校长张寅东是奉天体专毕业的老体育家，教务主任石万福也是体育家，各科教师也有体校出身的。以体育界人士办中等学校，这是前所未有的。

复县旧城学校的一些教师，思想是比较进步的，如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校长戴振铎，教员孙效章（解放后任旅大市图书馆副馆长）等都是具有爱国反日思想的人。

我到复县旧城视察，正值“五一”劳动节。”五一”是南京政府实行孙中山临时约法的公布日和孙中山总理奉安首祭日，旧城各校举行了“五一”游行活动。郭宗镐、戴振铎积极组织，游行前他们请求我批准。我没有请示景县长和林局长便以督学的身份应允了，回到瓦房店，景、林二人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是日本的驻在机关对此深为不满。

复县长兴岛也是一个学校集中的地区，在下堡、长岭子、地藏庵等村镇，都设有县立高初两级的完全小学。此外还有 20 余所区村立小学，并且女校比较多。

### 一、“九一八”事变后的状况

“九一八”事变时，景县长拒绝就任“维持会”会长（后来日本人便以李端代理），我和景都作好离开复县的准备，但互相都不知道离开的时间和办法。景有个习惯，每天早晨都要到南山下的树林去散步，可是忽然有一天，景早出一直未归。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提前在散步的地方准备好了一辆骡子车，借散步的时候乘车逃到百里外的李官村，又让该村校长倪艺五替他雇船逃到了营口，从营口又逃到锦州，参加了当时的辽宁省临时政府。

我当时携家小五口，计划自大连搭轮船赴天津，再到已约好了的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工作。但没有料到日本人指使康德记药房的人，借口向我索要药品欠款监视住了我，虽然付清欠款也不能脱身。

接着，日本人又威胁“维持会”会长李端和教育局长林荣裕说：“周督学

一贯排日，不准他去内地，需立即割职。”此后“督学”改为“视学”，由瓦房店日本公学堂正教员李英育（日本特务）接任。后来我逃到了哈尔滨，在东省博物馆、图书馆、教育厅工作了三年后又达到了北平。

# 解放前大连民族工商业见闻

徐敬之

日寇统治大连长达四十年，在此期间，大连的经济命脉完全操纵在日本统治集团手中，民族工商业受到日寇无孔不入的统制、排挤和压迫，我作为当时大连的工商业者，对当时各行业的情况，略有所知。兹就回忆所及，分别列述梗概。因时隔多年，难免挂漏甚至解谬，仅供参考。

## 一、油坊业

### 1. 初创时期

大连第一家油坊是顺福栈，创建于1905年。一天仅能生产几十片豆饼，供作当地的马料，生产的豆油为食用和点灯用。以后大连油坊逐渐增多。主要原因是，当时日本国内的豆饼需求量极大，农作物多以豆饼为肥料，对大连的豆饼是有货必购。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下称三井）便在大连采取先付款后收货（6个月以内）的办法，刺激了大连油坊业的发展。营口、安东（丹东）等地的油坊闻讯也前来建厂。油坊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大连粮业的发展，东北内地及山东都向大连贩运农产品。

1910年，油坊增加到35户，日产豆饼25000片左右，大户日产1000片，小户则三五百片不等。由于油坊业发展迅速，“三井”于是变收购办法为先付一半或三分之一现款，交货期也限制在3个月以内。大豆则完全改为现款交易。1914年油坊增加到46户，日产豆饼增到4万余片。粮业也增加到七八十家。在46户油坊中（后有2户倒闭），有7户是日商油坊，都是在1908年至1913年间开设的，除三秦、日清、铃木油坊外，其余4户都在1918年前，因管理不善而倒闭。

## 2. 繁荣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对豆制品的需求量大增，刺激了大连油坊业的发展。大连油坊设备较多，且交通方便，因此东北各地的大豆源源不断地运入大连加工。大连油坊业的出口权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给油坊业加快运输，不使产品积压等诸多方便条件。当时每生产 1000 片豆饼即可获利五六百元。

1915 年，油坊增至 57 户，生产设备得到扩充 日产豆饼最高达 25 万片，堪称油坊业的“黄金时期”。但因为日本殖民当局的勒捐加税，这时各油坊的赢利额都很隐秘，就连日本官署及华商公议会也得不到底数。

1915 年“全聚厚”经理林心裁发起成立了大连油坊业联合会，林任会长。次年，日本殖民当局指定“日清”油坊主古泽大作任会长，林任副会长。

1917 年，油坊联合会为自身利益，呈请日本殖民当局禁止再开设油坊。不久，日本关东厅长官山县伊三郎即颁布了禁令。1921 年，日本统治者宣布以朝鲜银行发行的金票来统一大连的币制，在遭到大连华商的抵制后，又规定使用金票者可得到开设油坊的许可证，这实际上等于废止了禁设油坊的命令。因此到 1923 年油坊又增至 82 户。

## 3. 衰败时期

1923 年至 1925 年，有 54 户油坊倒闭，豆饼日产量也下降到 14 万片。其原因，一是禁设油坊的命令废止后，油坊间竞争激烈，有的油坊开设仅半年就倒闭了；二是税率增加。“黄金时期”营业税为 0.1%，制造税为 0.3%，而到 1928 年，营业税增至 1.5%。制造税增至 0.5%，其它苛捐杂税也不断增加，几乎占纯利的一半；三是白井骗案的影响。白井洋行与一些日商在大连“取引所”（交易所）倒买倒卖，骗诈 500 万元后宣告倒闭，使大连油坊受到

很大损失；四是运费增加。1918年一车皮大豆（30吨）由长春运至大连运费360余元，而1929年增至900余元；五是，东北各地油坊业的发展。1929年东北主要油坊为472家，其中哈尔滨就有40户，他们靠近大豆产地。又受中东铁钱运费政策的保护，形成与大连抗衡之势；六是日本农业开始使用化肥，对豆饼的需求量大大减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油坊业迅速恢复发展，使大连油坊产品难以出口。

另外，此时日本垄断资本更加紧了对东北的掠夺。“九一八”事变后，日商三秦油坊（三井财阀系统）在东北铁路沿线开设了176处分号，同时兼营批发日本百货用品，三菱财阀系统开设500多处，就连小财阀瓜谷长造商店也开设了百余处。他们派驻人员收购农产品，致使大批华商粮行倒闭。大连油坊业所需的原料基本上被他们控制。

大连油坊业在衰败时期也曾有过几次回升，因为日本农田不能重复使用硫氨化肥。1930年日本国内对豆饼的需求量又开始增加，是年秋，南满铁路为鼓励大连油坊多收购大豆，暗中唆使大连油坊到长春以北地区收购大豆（长春以北铁路归苏联中东铁路局管辖），每运回一车回扣50元，超过100车回扣100元，超过200车回扣150元。这一规定实施后，大连油坊纷纷到长春以北地区收购大豆，每户都得到了3—10万元不等的回扣。及至苏联中东铁路发现这一情况后，通知哈尔滨油坊业和粮业，如从长春以北地区运回大豆，每车只收30元运费帐（长春至哈尔滨运费为160元）。以后双方竞争愈演愈烈，竟至免费运输。1931年春，双方达成协议竞争方止。

1935年秋收时。东北各地连降大雨，气温也降至（华氏）40度，大部分大豆被冰冻，成为“水豆”，大连油坊业有经验者认为可以加工出成品，但日本人认为“水豆”难以出售，因此以伪满政府名义宣布每收购一车大豆奖励100元，并降低“水豆”价格，使大连油坊业又获得了一次发财的机会。

#### 4. 灭亡时期



1938年秋。伪满政府规定农产品由“满洲粮谷株式会社”专营，降低农产品收购价。这一措施使大连油粮两业的资金和积累损失了60%以上。同时，关东州厅又规定对汇款进行限制，使粮业得到的款项也不能拿走。因此华商有的便开始走私运货。关东州厅抓到走私者就进行毒刑拷打。并没收货物及资金。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经济警察和宪兵队来电话。”

油坊业的资金虽然大部分被收去，但设备还在，成为“粮谷株式会社”的加工厂。这时的大连油坊业有华商27户，日商5户。1940年关东州厅强行将华商27户油坊合并成为大东、协合两个油坊，各油坊成为车间，他们的资金必须投入到大东和协会。大连华商油坊至此完全被日本统治者占有，不少油坊主失业回乡。光复后，华商油坊仅剩17个车间。

大连油坊业在创业初期，税率很低，20年代税率有所增加，但油坊业尚能负担。“九一八”事变后，油坊业增加了所得税和超利税，获利10,000元，纳所得税1,000元，名为基本所得税；获利11,000元，基本税1,100元，超利税150元；获利20,000元，税率得累进到50%，同时还有户别割税，平均每户6,000元。关东州厅还通过商会经常摊派各种股票。“七七”事变后。各种税捐摊派又不断增加，油粮两业每次捐款少则10万，多则50万。日本官厅还开展“国防献金”活动，强迫人们献出金银饰品等。还发行“国防公债”，“战时公债”，实行战时储金等，强迫人们将每月工资的20%用来购买公债。

油坊业是大连华商经济的支柱，油坊业的遭遇实际也反映了其它行业的遭遇。1939年关东州厅颁布了“七二五”物价冻结令，命令大连工商业户将所有商品不论好坏如数呈报，隐瞒者，查出后严加惩处。还命令停止出售商品。这是工商业者的“送命符”，一些工商业户因此遭到日本经济警察的残酷迫害，甚至丧命。1940年秋，关东州厅又颁布了“物资征用令”，规定日本官厅有权

随时征用各种物资，并只付款四分之一。同时又颁布了调整手工业的命令，将大连手工业分类组成各种组合，每一组合都由日本人领导，其产品归组合所有。不得私自出售。大连的民族工商业户，不论大小都丧失了自主经营权。

## 二、银 钱 业

日本侵占大连初期，大连市面流通的货币很多，有俄国的荒帖、中国的大小洋元及银元、日本的军用金票、日本正金银行的钞票、帝国银行和朝鲜银行的金票等。日本银行中除正金银行外，货币皆以金为本位，称金建；中国货币和正金银行钞票皆以银为本位，称银建。各种货币的比值时常变化。因此产生了银钱业，负责货币的兑换管理和华商存款、贷款及汇款。当时各种货币的流通范围是。农产品交易使用钞票、军用全票；购日货使用帝国银行金票；税收、运输使用帝国、朝鲜两行金票；农村使用大小洋元和铜元；小商小贩则各种货币皆用。荒帖在 1918 年绝迹，其它货币随着大连工商业的繁荣而扩大流通面。银钱业纯粹是中国人的组织，他们有自己的“钱业”公会。1918 年以前，银钱交易在华商公议会院内进行，每天午前午后交易两次。以后从华商公议会院内迁出，建立“钱业公所”。兑换以现款对现款，有信誉的也可以 10 天为兑交期。

日本方面多使用金票，但他们在购买农产品时也得使用抄票，因此常委托银钱业户代为兑换，银钱业户则可从中得些佣金。银钱业户在交易时不许日本人进场，以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

1918 年关东都督府命令钱业公所改为官办，更名为大连钱钞取引所。规定小洋元可自由交易，金票、钞票分现交和期交，现交不要手续费，期交每万元双方各交手续费 2.50 元，半月为一期，最长为三期。每交易万元双方还须各交保证费 100 元。日本人可以加入钱钞取引所，当时加入的有 20 多家日商和 80 多家华商。规定加入取引所交 5000 元保证金。取引所开业后每天成交额少则千万，多则上亿，成为中日投机商的大赌场。

1921年朝鲜银行建议华商在农产品交易中改用朝鲜金票，遭华商反对，朝鲜银行便呈请关东厅长官山县伊三郎予以批准。6月关东厅下令从10月起改用金票交易。朝鲜银行贿赂华商油坊2户、粮业1户、钱业1户及日商1户带头使用金票交易。华商中的油坊业和粮业特别反对使用金票，日本一些资本家也认为改用金票为时尚早。大连华商公议会副会长李子明带头向日本官厅请愿要求收回成命，被山县伊三郎驱逐出旅大，逃到营口。10月末实行金票交易之日，日本官厅派警察押场交易，当时除被收买的5户八场交易外，其他几百名中日商人皆没入场，交易被迫停止。之后，华商纷纷转到营口交易，日商也随之跟去。为此，大连一些团体在华商公议会会长郭精义的带领下，去东京向日本政府请愿。1922年伊集院彦吉继任关东厅长官后，宣布日本政府允许金银两建并存，自由交易。随后，华商公议会派代表将李子明从营口请回，这一风波始得和平解决。

1933年秋，日本政府下令取消在大连流通的钞票等其它货币。命令正金银行收回钞票，中国的大洋小洋一律禁止通用，只准使用朝鲜金票和伪满票（与金票并用）。取消银钱业营业执照，强迫人们兑换朝鲜金票和伪满票。当时官定的兑换比率是钞票1:1，小洋1:0.8，大洋1:10，这一兑换比率使大连银钱业损失了几百万元。银钱业一部分人将余下的资金调走，但日本官厅随即又颁布了“金融管制令”，不许资金外流。银钱业那些没能调走的资金，以后陆续投入房地产业，至此结束了大连银钱业。

### 三、保险业

大连保险业始于1914年。是年，日本帝国水火保险株式会社、千代田保险公司、大仓保险公司等日本十大保险公司委托大连的三井株式会社、三菱商事、福昌公司等为代理人，从事保险业务，赢利十家均分。其保险范围是，陆

地的各类货物及房产的火灾等。当时在大连从事保险业务的还有英国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太古洋行，保险范围与日本相同，每年收入也很高。保险公司开业后，大连华商大多对火灾进行了保险。那时，保险公司对华商因火灾而遭受的损大都能如数赔偿。

1925年，大连民族工商业的资产，比以前增加了数倍，保险的财产也随之增加了数倍。这时如华商因遭受火灾，损失过大时，保险公司往往不承认被保户的损失数，百般刁难，以减少赔款数额，他们的偿金从来超过受灾户损失总数的二分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保险公司和关东厅对华商更为狠毒，被保户若是不慎起火，官厅即将受灾户抓去二三人，毒刑拷打，逼迫他们承认是自己放火，这样保险公司就可以不用赔款了。这种情况使华商不愿再参加保险，但银行却以不保险就不够信用为名，威胁要断绝与华商的来往。华商不得已仍参加保险。英国保险公司同日本保险公司一样，互相勾结。欺压华商。

日本保险公司以后还开有人寿保险（专保青年）。伪满成立前是自愿保险，伪满成立后，保险公司偕同日本警察强制稍有点财产的中国人保险。每户至少保一人，每人二三百元不等，分20年，30年期，利息三厘，期满后全数退还。

1926年，上海联保水火保险公司在大连设立了分公司，这是第一家在大连开设的华商保险公司。关东厅起初不想批准设立，但大连是自由港，没有理由不批准，因此，就制造种种障碍来刁难联保公司。官厅借口不了解联保公司的资金，要求联保公司必须先交出50万元现金作押才能开业。联保公司为保护华商的财产安全答应了关东厅的要求。

联保公司开业后，积极联系业务，保险手续既简又快，很快就赢得了顾客，不少华商都参加了保险。一些在日本公司保险的华商，在期满后也都纷纷转入联保公司。华商通过港口运往华中、华南的货物，全部在联保公司保险。1927年关东厅通知联保公司，不许再做海运保险业务。不仅如此，关东厅

还在参加联保公司火灾保险的华商受灾后，抓去几人，指为放火者，严刑拷打，使得联保公司无法赔偿。华商不得已，只好在联保公司投保三分之一，在日本保险公司投保三分之二。1933年关东厅下令联保公司全部退保，不许继续营业，联保公司被迫关闭。但尚留二三人看守账房。直到1941年才全部撤走。

#### 四、大烟馆

日本占领旅大后，大连开始出现一些私卖鸦片的人，但为数不多。1911年他们向关东都督府是预营业许可证，得到批准后就公开挂牌营业，名为“阿片小卖所”，这是日本名词，中国人称之为“大烟馆”。

关东都督府当时将鸦片皆注明为宏济医院的药品，宏济医院是大连华商公议会宏济善堂的一所医院。宏济善堂专门收容年老体弱及无家可归的老人或儿童。宏济医院除为他们治病外，一般也免费给无钱看病的市民医治。关东都督府将鸦片注明为宏济医院的药品，并没有得到宏济医院的同意。但在关东都督府的压力之下，也不敢过问。当时大连海关受上海总海关监督，因此，关东都督府还不敢明目张胆地进口大烟。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关东都督府即开始公开从印度进口大量的鸦片，使大连的烟馆不断增加。1920年大连有烟馆80多家，每天吸大烟用的豆油需300多公斤，大烟的日销售量约400公斤。

1927年中国代表在世界禁毒委员会海牙会议上，指控日本在大连地区公开大量贩卖鸦片。日本代表则说中国人很早就吸食鸦片，他们接管后也禁销鸦片，但有少数人因年老体弱，不能戒除，为人道主义不得不照顾他们的生命。并说现在大连只有8家大烟馆，各家也只是一盏油灯，中国代表所述不实等等。会后决定派专使到大连调查。这个专使是英国人，他首先到日本东京，随后到连。来连之前，大连民政署做了精心布置，主要街道挂上了五光十色的纸条，上写“大烟是亡国灭种的毒品”，“吸大烟使人体弱多病，断子绝孙”

等，并通知各烟馆老板将烟馆招牌取下，只保留 8 家的招牌，每家只许留一盏烟灯。60 岁以下的人不许进来，违者取消许可证，其他吸烟的人都发给烟具和大烟回家去吸。专使到后被迎进星个浦宾馆，次日由日本官员陪同视察，见到那 8 家烟馆后就回去了。专使离连三天后，大连《秦东日报》记者王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国际拒毒调查特使》，还附有一幅漫画。画的是在阳光下，特使用毛巾围着眼睛，手持灯笼，正面写着“调查大烟”。这幅漫画刊出之后，关东厅大怒，将王兰先生驱逐出大连。

1931 年日本侵占东北后，强迫农民大量种植鸦片，黑龙江、热河种植最多。因此，大连烟馆货源充足，收入直线上升，不少烟馆还以良家少女招揽客人。“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大连搞的捐款、献金，公债、蓄金等摊派，大烟馆居首位，得到关东厅的重视。日本投降后，大烟馆才被全部查封。

## 五、银行业

大连银行业，中国方面有中国银行、金城银行、交通银行。日本方面有日本帝国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住友银行、三井银行、三菱银行、满洲兴业银行、东托会社。英国方面有汇丰银行。荷兰方面有麦加利银行。美国方面有花旗银行。德国方面有德华银行。俄国方面有道胜银行。上述银行有各自不同的营业范围。中国银行的前身是大清银行，日本侵占大连后，大连海关的税收仍归清政府所有，所得税款由中国银行保管。伪满成立后，接收了大连海关，税收也改由正金银行保管。中国银行的营业对象只有中国工商业者，日本工商业者不与之往来。金城银行、交通银行是 1920 年在大连开设的，也专为中国人服务。伪满成立后，两行大量吸收现款，开办定期储蓄。如存 3000 元，10 年后付 5000 元，20 年后付 10000 元。存 5000 元，10 年后付 10000 元，20 年后付 20000 元。1938 年日本加紧控制中国工商业，使之陷入破产境地。1940 年两行撤回上海总行。它开办的定期存款在解放后，由中国人民银行折合人民币付还给了储户。山东省的东莱银行（总行在青岛），1924 年也在大

连开设了分行，它是私人资本的小银行，营业范围很小，受其它银行的排挤。日本银行不许它加入银行团组织。伪满成立后撤回青岛。

日本帝国银行是日本的国家银行，为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家服务，它发行有金票（大连人称之为老头票）。1913年帝国银行在大连回收金票，代之以朝鲜银行发行的朝鲜金票。到1920年市面上已很少看到帝国银行的金票。正金银行是日资银行中资金较为雄厚的银行，日本政府占其资金的70%，1905年经清政府许可，在我国发行以银为本位的牛庄钞票。其资本金为1亿元，公积金1亿3千万元，职员积累金3千万元。正金银行经营范围广，也较灵活，既为日本人服务，也为中国人服务。但在贷款方面还是不同的，如贷款百元，日本人一天利息为1分8厘，中国人则为2分5厘。日本一股货物抵押贷款息率是1分2厘，押款数字是按时价9扣。中国人抵押货物是按6、7扣，息率是上层户1分5厘，中户1分7厘。朝鲜银行是日本人以朝鲜国名义开办的银行，它公布的资金是8000万元，公积金也是8000万元，总行在汉城，发行朝鲜金票，与日本帝国银行金票并用。营业范围较广，在贷款和抵押货物款方面与正金银行是一样的。1933年，关东厅命令以朝鲜金票和伪满票取代大连其它货币，这使得中国工商业损失1500万元。三井银行、三菱银行、住友银行在大连专为日本大资本家服务，与国际上各大银行有往来并办理国际汇兑，与大连华商及日本一般工商业者无往来。东托会社系日本官办，主要从事抵押在连中日人民的房产及土地业务，利率为年息8厘左右。

满洲兴业银行，前身是中日在大连合办的正隆银行和满洲银行，每家资金不过千万元左右。伪满成立后，两家合并为满洲兴业银行，是伪满的中央银行，总行设在新京（长春）。东北各大城镇皆有分行，资金为5000万元。它以一般中日工商业者为营业对象，贷款的办法与正金、朝鲜两行相同，但利率略高于其它银行。

英国汇丰银行，荷兰麦加利银行专为本国资本家服务，与日本银行关系密切，也同中国上层工商业者有业务往来，但贷款数额不大。美国花旗银行与汇丰、麦加利两行业务相同，但贷款数额比两行略多，不作货物抵押，利息一般在年息 6 厘以上。上述三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撤离。

德国德华银行专为德国资本家服务，与中国工商业没有往来，它在日本投降时关闭。

## 六、房产业

日本侵占大连后，大量收购当地居民土地，建筑了一批房屋，这些房屋多以木板为墙、瓦陇铁为盖，是些简易房。当地居民看到盖房有利可图，便也盖了一些木板房和席子棚，少数人还盖了砖瓦房。随着日本人的大批涌入，房屋需要量也大增。关东都督府命令正金银行，朝鲜银行为房产业提供低息贷款，建筑用地由关东都督府借用，每亩土地年租金约 10 元。至 1913 年，大连房产业已有很大的发展，建筑了很多房屋，每间房屋除去租地金和利息外尚可挣 40 余元。这时关东都督府将地租增至 50—100 元，银行将十足贷款改为六七折的房产抵押。1920 年房产抵押又改为四五折，地租提高到三四百元，繁华地段达五六百元。1925 年规定，简易房屋不能再作抵押。这时期的建筑多以钢筋水泥为原料，费用不断提高，因此房租也逐年上升。房产主除去银行利息，官厅租金和房屋维修费外，收入还是很高的。1927 年银行将房产抵押期限限制为一年，期满后付款可再押，如无力偿还银行将没收。1930 年以前大连房产业可说是一帆风顺的。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厅将房租税由 10% 提高至 20%，一些房主将房产卖掉，迁至华北、华中等地，有的乘机收买房产。也有一些人抱观望态度。关东厅规定房产买卖税为 6%（卖者不纳）。”七七”事变后，日本规定卖者必须将所得的 30% 用以购买公债。这时的房产业勉强维持，连日本人也有将房产卖掉把款汇回国内的。1940 年关东州厅规定房产业必须将收入的 70% 用来购买公债。这使得房产买卖基本停止。大连房产业由于大量资金被关东州厅以各



种名目收去，因此无力维修房屋，一些房屋倒塌，还有一些破漏不堪，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得到维修。

# 旅顺盐业开发简史

王 延 和

19 世纪中叶以来，辽东半岛开始出现零星的盐田，从事盐业生产的大部分是当地农民，规模都不大。在当时，盐只是作为日常食用，还没有扩展到工业领域内。

1905 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盐业株式会社总裁一宫，委派矢原重吉带领日本盐业资源调查团，来辽东半岛考察盐业。调查团内有佐野吉庆、富永正平、矢原丰久、木材繁太郎、菊川、羽佐间、中村等盐业专家。经过大约半年时间的考察，他们将报告及开发计划呈报东京。1909 年日本政府批准了他们的计划。一宫决定立即在旅顺双岛湾开辟盐场。任命矢原重吉为日本盐业株式会社关东州分社社长。

关东分让成立后，招收了 300 多名中国人为建筑工人，并指定王安国、杜崇方、巩启贤、张继山、张玉春、王海五、高玉祥、那继五、那继九等 9 人为工头，将盐场工程全部承包给了他们。双岛湾盐场施工达三年之久，双岛湾附近的山谷被全部开平，海湾内筑成了一条堤坝，形成了面积为 4000 亩左右的盐田。这项工程耗资达 30 万日元，全部由日本国家银行支付。

日本资方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使用了种种惨无人道的办法，大肆剥削、压迫中国工人，每天的劳动工时达 12 小时之久。再加上中国工头从中克扣剥削，工人每天所得工资仅仅不过 5 角多钱（日币）。而包工头，船头、大车头在三年之后则摇身一变，都成了大地主、大高利贷主。日本资方和中国工头狼狈为奸，他们把发给工人的工资折合工票（用现金做投机倒把生意，发行工票在工地流通，以代替货币）。开设一些杂货铺、烟馆，赌场、饭馆等等。

另外工头在日方的怂恿下，又私立刑法，任意惩罚工人，每月结算工资时，工人所得寥寥无几。

1913年，盐滩开始出盐。这时又招收了一批盐工，由日本人总监督，下设三级工头，当时大约有盐工200多名，年产盐3万多石（每石600市斤），价值9万日元（当时每石盐最低出售价为3日元）。每年除分发工资需要大约3万日元外，所得纯利为6万日元。不到五年时间，旅顺双岛湾盐场扩大了四五倍。从1916——1945年的近30年中，日本盐业株式会社关东州分社相继开设营城子、大房身、金州西海岸（毛营子）、七顶山、三道湾、石河驿、五岛、登沙河、皮子窝（千岛子），普兰店、龙王塘、羊头洼、盛家沟、柏岚子、太阳沟和大连黑石礁等盐场。并且在辽西，山东、天津等地开设了分场。仅辽东半岛盐田总面积就有15万亩（每50亩合盐田一付斗，总计合盐田3000付斗，每一付斗年产盐200石，合计每年盐产量60万石）。中国的盐工每年有常工3000多人，日本技术人员和盐工有120余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军事化学工业急剧发展，盐价也随之上涨。从1931年后，盐业平均年产值达375万日元（每石平均按最低额5元折算）。产盐种类，从初期单一的原盐，发展到有粉碎盐、板池盐、精盐等多种类型，并附设有水泥制盐池、卤水加工厂等。产品大部分为日本军事化学工业专用，并且还出售到国际市场（包括美、德、英、法、意等国家）。

从1913年到1945年，旅顺每年所产之盐，尚不能满足日本本国和国际市场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盐田已扩展到伪满洲国的复县、盖平、营口、锦州等地30年来，旅顺盐业在技术水平上也有了很大改进。初期是使用木制水车上水，一直到1930年才全部改用电力抽水机上水。产量也逐年增长。

日本的盐业株式会社虽然由私人经营，但实际上完全由日本政府操纵。在日本帝国主义没有侵入辽东半岛以前，中国人开发的盐业相当获利。在民间曾流传着各种歌谣，如：

“清水捞白银，一天一斗银。”

”姑娘要嫁盐户家，不愁吃来不愁穿。”

可见盐业对广大人民的吸引力。自从日本侵占东北后，中国人经营的盐业由于竞争不过日本人而一落千丈。当时的盐业受关东厅殖产科管理，日本人生产的盐，每石税金是 6 角，国人生产的盐，每石税金则高于日本人，而且卖价最高不得超过 1.50 元，并不能出口。因此，中国人经营的盐业大部分倒闭，被日本盐业株式会社从中廉价收买。

自从日本盐业株式会独占整个东北的盐业后，以大连为基地，原盐向日本本国和世界各地贩运。出口港有：旅顺港、大连港、三道湾港、五岛港、登沙河港、七顶山西海、双岛湾西海等（大连、旅顺两港四季畅通，其他港冬季结冰时停止外运）。所用的运输工具大都为三十一—五十吨的帆船，载运至大轮船上，然后外运。

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盐业中，榨取了成千上万的财富，而中国人民流的血汗却无法计算。贪得无厌的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盐业的发展过程中，犯下了史无前例的罪恶。

## 大连钱庄业述略

郭习朴

孙耀庭 口述 黄本仁整理

### 一、大连初期的银钱业

#### （一）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社会通用货币情况

清末以银元为本位币（银元每枚重库平七钱二分），铜元为辅币。民国成立后，除清廷发行之“龙洋”银元通用外，又发行了有孙中山头像的银元（小头洋）、袁世凯头像银元（大头洋）。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又发行有帆船图案的银元（流入东北较少）。以上各种银元，老百姓通称之为“大洋”。

小银元（银角、角子）、铜元（铜币）是银元的辅币。银角原系十进位，十角等于大洋一元，后因各地滥造，成色降低而贬值，需十一角、十二角方能兑换现大洋一元。因此银角称为小洋。广州铸造的二角小洋流行于东北，老百姓称它为“双毫”。其它各省之小洋亦通用。

1898年和1905年沙俄和日帝先后侵占大连后，“大洋”、“小洋”、铜元等照常流通。奉天张作霖政权发行的纸币“奉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发行的钞票亦允许流通。此后，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也逐渐流人大连。以上各种钞票都是以“银”为本位。

日本殖民当局发行的货币有帝国银行的钞票（又称“老头票”），横滨正金银行的“牛庄票”，朝鲜银行券（又称为“金票”）。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

后，又发行了“满洲中央银行券”，作为东北和大连的主要流通货币。以上货币，除正金银行是银本位外，其余皆为金本位，但都不兑现。

大连地区当时除上述中日两国货币流通外，随着大连自由港的开放和经济的发展，西方的美元、英镑、法郎、马克、卢布等亦先后流入。到1938年以后，原有的银元、银角、铜币已陆续为日本侵略者掠夺和运走。社会上只有朝鲜银行券、满洲中央银行券、日本帝国银行券流通。所有以角、分为单位的辅币，全用镍质硬币代替。

## （二）大连钱庄业的兴起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大连初期，市场上流通的各种货币种类繁多，比价不一，彼此交换和与外地贸易极为不便。因此，银钱兑换店应运而生。1905年在今天津街一带有三四家小商号在柜上摆上几个柳条筐箩或在店门前放上一张桌子，开始兼营货币兑换业务。如华商安慈民（承生）在他开设的肉店和粮店中就兼营货币兑换，因营业不断扩展，最后成为全市工商界中资金雄厚的八大家之一。又如同兴街之五元储蓄公司，它主要业务是销售宏济彩票局的彩票兼营货币兑换，后因大连外商逐渐增多，中外货币流通量扩大，加上内地商人携带大批现银来连，急需一个货币交换和通汇机构。五元储蓄公司认为有利可图，乃在原先业务基础上扩大范围，办理大连与各地的货币汇兑。它是大连金融行业汇兑业务的首创者。

1907年以后，随着大连城市经济的发展，华商钱庄开设者日渐增多。在热闹豪华之街头，不再有兼营货币交换和汇兑之商号，代之而起的是各种专营钱庄。它们的业务范围已不限于原来的货币兑换，而扩大为收取存款，放贷和外地还汇，并兼营粮食、杂货等交易业务。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大连钱庄业中较具规模者，有如下三十余家。

### 大连华商钱庄业一览表（1931年）

店号	经理	资金	开设年月
储蓄公司	刘仙洲	40万元（钞票）	1907年

福顺义银号	庞睦堂	20 万元 (金票)	1907 年
安惠栈	许亿年	10 万元 (钞票)	1912 年
欢聚福	安立贤	40 万元 (小洋)	1914 年
裕记钱庄	赖芳圃	10 万元 (大洋)	1917 年
正盛泰	高学志	20 万元 (钞票)	1919 年
正仁钱庄	曹正仁	1 万元 (金票)	1919 年
裕生福	王如福	5 千元 (金票)	1919 年
双盛昌	张萝隆	5 千元 (金票)	1921 年
东顺盛	初玉生	13 万元 (钞票)	1921 年
万和隆	薛宝亭	1.2 万元 (金票)	1921 年
义成信	张复远	20 万元 (钞票)	1922 年
益发合	王信斋	30 万元 (钞票)	1923 年
同盛和	宁品三	1 万元 (金票)	1923 年
裕昌祥	王子浦	5.5 万元 (银)	1924 年
福兴号	隋福林	1 万元 (金票)	1925 年
天兴福银号	邵鼎三	10 万元 (金票)	1925 年
广成泰	杨少礼	10 万元 (钞票)	1926 年
永丰裕	徐仁堂	13 万元 (银)	1927 年
店号	经理	资金	开设年月
恒聚栈	刘秀山	10 万元 (大洋)	1927 年
永昌福	安俊卿	4 万元 (小洋)	1927 年
益顺公	张怀之	10 万元 (钞票)	1928 年
公和利	邵茂斋	5 千元 (金票)	1928 年
义聚合	王德仁	6 千元 (金票)	1928 年

福成银号	孙玉泉	10万元（钞票）	1929年
通汇银号	邵继庭	10万元（银）	1930年
盛业银号	赵抡三	10万元（金票）	1930年
同块银号	董云峰	12万元（银）	1930年
义生东	牟惠洲	9.5万元（钞票）	1931年
和泰油坊永记	袁子敏	10万元（大洋）	1931年
义昌钱庄	从春山	8万元（钞票）	1931年
金兴钱庄	徐韶卿	5千元（金票）	1931年

摘自 1935 年大连商工会议所“工商案内”

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是大连钱庄业兴旺发展的时期。大连钱庄（又称银号）有独资、合伙开设两种，资金多则二三十万元，少则一二万元不等。对外营业信誉，并不完全依赖实有资金多少，而是看钱庄老板和各股东本身是否殷实。如果各股东声望高。各方存款可不招自来，这是钱庄业务兴旺的基础和保证，钱庄如果吸收存款不多，那它的放款业务也就无法开展。

大连钱庄业依其籍贯有帮派之分，主要有金州本地帮。山东帮、关里帮和南方帮。本地帮财东，其财产也 5 都在本地，信誉较好。放款期短，易于收回，很少发生不能收回放款的现象。山东帮中以胶东地区的福山、威海两派实力较强，掖县次之。他们的财产不都在大连，但同乡亲友互相了解信任、团结力强，其业务对象主要是山东籍的工商业者。关里帮是指冀东乐亭一派，资金雄厚，如益发合、义昌元等钱庄是其代表，其实力与本地帮不相上下，但因同乡较少、业务就不以存放款为主，而兼营买卖金银、粮食等，以外地客人为主要对象。南方帮以闽粤人为主，如东永茂、升记号、裕发祥、成记等，实力亦不小。

开设钱庄者必须有银行方面的支持，否则存放款数不能平衡时，就有资金周转不灵的危险。



钱庄向银行借款，一般都以不动产作抵押，然后办理往来透支手续。钱庄的存款主要靠吸收往来客商活动存款和居民个人存款。但客商存款时间不长，居民存款又少，所以钱庄对银行的依赖性特别大。

钱庄利用放款获取高额利润、钱庄放款和银行不一样，没有固定利率，也无长远计划，看人办事。有信誉者用电话联系就能办成。手续非常简便。大连钱庄的业务对象，主要是中国人经营的工商业。华商工商业受殖民者的歧视和排挤，他们到外商银行贷款不仅手续繁杂，而且也很难贷到，因此宁愿多付利息到钱庄贷款、而且华商一般中小工商业多依赖钱庄为其服务。钱庄放款期限越短越有利，有时一天一进一出获利更多更快 因之放款利率随着市场银根之紧松而变动。银行的利率为每千元0.21元，而钱庄则高出一倍以上，但一般大钱庄不在放款上过分提高利率，他们把资金移往钱钞交易所，在兼营现、期货买卖和搞金银、货币、粮食等投机倒把交易中获利。而小钱庄本身没有这个能力，只能以对工商业者放款为主要业务，它们的放款利率高达六角左右，老百姓称之为“放印子钱”的高利贷。借款人得按期偿还，逾期就得利上加利。

## 二、大连钱庄业与钱钞交易所

大连在解放前处于殖民地社会，钱庄业经营之业务与内地钱庄业有些差异。由于大连地区流通货币复杂，比价不一，差价多变，各种货币变动比值标准”随行就市”交易。为了交换信息方便，钱庄业中经营货币兑换买卖者都集中在同业团体组织——钱业公所内进行交易，营业额日趋兴旺。后来日本殖民当局为控制金融市场。从中牟取暴利，于1916年由官方出面成立了钱钞交易所，公开进行投机倒把，也可以说是设赌抽头的机构。市内各钱庄都凭许可执照在交易所进行交易，成为一项特殊业务。从表面上看，是钱庄业在进行投机买卖，受益受害由钱庄负责，而实质上获利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它不管交易双方赚赔，一律收取手续费，每万元收2.50元，这样买卖双方共缴5元，交易

所有时每天可收入 1 万元左右，最少时也可收到二三元。因此，钱钞交易所的清算机构“钱钞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行市就大大高于其它股票的行市。如钱钞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每张缴纳股金 50 元，而其变卖行市有时竟高达 250 元，每年分红可达股票面额的 20—25%。

钱庄业中实力较强者在钱钞交易所中兼营货币现货，期货买卖业务，其中以兑换小洋，朝鲜银行券、钞票为主。这三种货币在大连钱钞交易所每天都有行市，其中小洋、朝鲜券为社会流通之主币，交易额甚大，钞票成交不会，大洋钱更少，因为只有山东人回家乡才带大洋。每元取利一二分，在兑换银子方面，以烟台的小边元宝和安东（丹东）的大翅元宝为主，这是二十年代的事，此后这类元宝就逐渐不见了。有的元宝中，被掺假者灌入铅蛋，经营者一不小心就上当受骗。还有的从东北淘金者路过大连变卖金块，这项交易获利最大，但数量不多。此外还有经营外币兑换，如美元、英镑、法郎、卢布和香港纸币、墨西哥大洋以及“奉

票”等，获利也相当可观。1920 年左右，因国际市场上银价直线上涨，金价暴跌，朝鲜银行券现货、期货两种行情下降幅度很大，朝鲜券每元只能兑取小洋四角上下。钱庄业经营这项买卖者，只要看准行市，无不获利十倍。日本财阀在大连的商社如三菱、三井等看到钱庄业进行货币交易利润很高，便采取自己不出面，暗中选定并支持内行人物开办钱庄。因此二十年代前后，在华商兴办钱庄热的过程中，又先后出现了一批日商投资经营的钱庄，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三菱、山田、东裕、纯昌、山本、东华、永顺、德泰、利同，三井洋行、和顺泰、泰信、泰记、义顺福。日商钱庄多是聘用中国人顶名为它服务，或取用中国商号名称，因此日商钱庄与华商钱庄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业务竞争。

### 三、大连钱庄的汇兑业务

大连在二十年代以后，中国人兴办的钱庄数量已大大超过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之需要，加上日商钱庄的排挤，于是有一部分钱庄业务开始转向，搞大连与上海之间的汇兑，套金子买卖等业务，这种业务又名“汇水”。

大连钱庄业搞“汇水”，早在钱庄业兴起初期就有这种业务，不过范围小，仅为一批“闯关东”来连的山东、河北同乡办理汇款汇兑业务。他们除得到一笔汇费收入外，还可利用路途远近和时间的间隔，将这笔钱适当挪用，从中可另外谋取一笔收入。经营这项业务的钱庄多是外地人，他们经营这项业务很讲究信誉，汇往各地即便是偏僻乡村，也保证按期送到。因此托汇者越多，其周转金也就越是雄厚，钱庄放款日期也可由短到长，经济效益很可观。当时大连工商界有名的八大家如刘仙洲、郭学纯、安慈民等资本家都参加这项业务。

随着大连与国内各地贸易和国际间贸易的发展，商业间的汇兑业务亦开始兴办。大连与上海之间的汇水业务，其规模远远超过往其它各地的汇兑业务。在旧中国的上海港一地，经常是进口货超过出口货，外流的资金除日本不通过外汇调回本国外，其余英、美等西方国家完全依靠外汇。上海银行卖出这种外汇，需要相抵补进，但在上海不如在日本补进较为方便。因此由上海买进朝鲜券汇往日本买进外汇的业务非常兴旺。开始时是在上海兑交。后以钱庄兑换时有误期，加上上海与日本汇兑较之大连与日本汇兑困难太多。经过大连钱庄业与上海银行业多次协商，为使双方便利起见，改在大连汇兑。大连钱庄汇给上海朝鲜券，上海按汇丰银行的牌价兑付给大连钱庄以相当值的银子。此方式经营了将近二十年，看来双方是互相买卖，公平交易，但究其实质却是外国侵略者和中国资本家互相利用。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大连各钱庄作媒介，顺利地回调资金，以不兑现的纸币攫取我国内地银元硬币的一种手段。而大连钱庄只顾多增加业务和多增加收入，为外国侵略者进行经济掠夺所利用。

此外大连钱庄业在上海各银行钱庄多有透支折子三四十个，每个折子可透支纹银一二千两，合计总数是相当可观的。上海各银行、钱庄每年农历腊月十五日以后把放款收回，而存款自腊月二十五到来年元宵节期间概无利息。这时大连钱庄业有的大户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把款如数送上海存放，为以后发展和争夺汇兑业务创造条件。由于大连和上海金融关系日趋密切，双方还利用两地金价行市高低差落，从中牟利。

大连钱庄业又看到在朝鲜有为数众多的侨胞，每年往其原籍山东等地汇款甚多的条件，于是纷纷前在汉城和仁川等地设立分号，办理汇兑业务，除收取汇费外，还可从货币比价中获得利润。后来因为朝鲜是日本的独占殖民地，不允许中国商人插足经营汇兑业务，乃止。

大连钱庄中还有的叫做代理店钱庄。这些钱庄大部分是东北资本家为了经营大豆、高粱等粮食买卖方便创办的。他们实力很强，粮食成交额甚大。他们买粮以后，仅将铁路运输凭据（俗称“载纸”），送到银行即可押到现款。因为粮运载纸比任何不动产抵押都可靠。不仅银行方面欢迎，而且方便了这些代理店钱庄在钱钞交易所中“买空、卖空”，大搞投机交易。有的瞬间成为暴发户，有的则倾家荡产。因而这些代理店钱庄很少办理正常存放款和汇兑业务。

大连钱庄业中最低级经营者是所谓“捣把钱庄”，专搞投机交易，不务钱庄本业。二十年代中期，他们勾结东北军阀、官银号。铁路的日籍负责人，和奉天（沈阳）的一些钱庄串通一气，往大连私运银元、小洋，每天多则三十余箱，少则十余箱。由这些钱庄派专人去车站接收。日本殖民当局只准往里运，不准再运往别处，全被日本银行用金票套去运回本国，捣把钱庄因此信誉欠佳，银币日趋减少，经营时间不长，便都自生自灭。

#### 四、东北沦陷后的大连钱庄业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同年6月建立了伪满洲中央银行，总行设在长春。发行“满洲中央银行”券，资金3,000万元，以银为本位，简称为“国

币”。伪货币法第二条规定纯银重量二三、九一公分为单位，称为“圆”，股金全部由伪满政府出资。伪满“国币”与日本的“金元”等价。自伪满中央银行发行“国币”以后，以往在东北地区流通的朝鲜银行金券，1935年11月根据“日满两国政府声明”，采取了逐步收回的措施。日本为了进一步掠夺东北资源，在1936年12月建立了专为产业开发资金的专业性银行——伪“满洲兴业银行”。总行设在长春，股金定为3,000万元。其股金一半由伪满政府出资，一半由朝鲜银行出资。因此朝鲜银行在东北的分支机构，全部移交伪满洲兴业银行继承。原大连正隆银行和满洲银行并入满洲兴业银行。朝鲜银行券在东北停止流产后，在大连地区仍照常通用。横滨正金银行由原来的银本位改为金本位的钞票亦停止在市面流通。至此在大连市场上流通之主要货币有日本银行的金票，朝鲜银行券和伪满中央银行的“国币票”三种。

1934年前后，殖民当局对金融市场管理仍比较宽松。因此华商钱庄业在这个时期又新开设了一些钱庄，它们是：

店号	经理	资。全	开业时间
同仁钱庄	辛寿之	1万元（金票）	1932年
福兴厚	张子和	1万元（金票）	1932年
永源利	任捷三	8万元（钞票）	1932年
复昌盛	戚仁亭	7万元（钞票）	1932年
华昌	张福堂	7万元（钞票）	1932年
裕昌元	李杰勋	20万元（钞票）	1932年
聚成和	安鉴之	12万元（钞票）	1932年
同德俊	佟锡矣	11万元（钞票）	1932年
东永茂	刘逢元	9万元（钞票）	1932年

福源祥成记	邹子宽	3.5 万元（金票）	1933 年
协源昶	左在泉	10 万元（大洋）	1933 年
东茂泰鸿记	李启明	5.5 万元（银）	1933 年
协泰永	赵明康	6 千元（金票）	1933 年
广生义	程乐九	5 千元（金票）	1934 年
泰记钱庄	王景山	1 万元（金票）	1934 年
源成栈润记	牟润蒲	2.5 万元（钞票）	1934 年
新盛祥	李承先	15 万元（钞票）	1934 年
东昌祥	马洪声	14 万元（银）	1934 年
永丰恒	李兰四	10 万元（钞票）	1935 年

摘自 1935 年大连商工会议所“工商案内”

日本政府和其国内财阀系统从 1905 年起在连设立银行，属于政府方面的有：朝鲜银行大连支店、旅顺支店、大连西部出張所，横滨正金银行大连支店、台湾银行大连支店；属于财阀系统的银行有：三菱银行大连出張所、住友银行大连出張所。伪满洲国政府系统的银行有：满洲中央银行大连支店、满洲兴业银行大连支店、大连伊势町支店、大连小岗子支店、大连沙河口出張所、金州支店、旅顺支店；另外还有无尽会社大连二个，旅顺一个；金融组合大连二个，金州二个，旅顺三个。

西方国家设立的银行有：英国汇丰银行、美国花旗银行。中国人设立的银行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东莱银行、天和银行、福德银行。

1936 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东北进一步加紧实施经济掠夺政策和加强对金融市场的控制，悍然宣布实行“金本位”制的命令。大连殖民当局对大连通用之银本位货币，蓄意废除已久，早在二十年代初，关东州厅曾强行推行“金本位”，引发了“金建风潮”。后鉴于中国工商界的极力反抗，日寇为了缓解矛盾，不得已又改为“金银并用”。此时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废除中国人通用之银本位时机业已成熟，关东州厅强行废除大小洋、银

元、银角、铜元等流通，并将中国人手中存有的银质通货，以每一元小洋折合日本金票七角八分，限期三个月全部收兑。使中国工商界蒙受严重损失，大连钱庄业也由盛转衰。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因军费开支庞大，财政出现赤字，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在旅大地区的殖民统治更为残酷。首先是取消了影响很大的取引所（交易所），包括钞票、粮食、杂货各交易市场，对金融业的控制进一步加以垄断。由于粮食受到严格控制，促使大连当时营业最兴盛之代理店行业陷于瘫痪，一度活跃之棉布业亦受战争影响，棉纱来源缺少而趋于消沉。华商钱庄业的国外汇兑业务也完全停顿。部分钱庄因营业清淡，纷纷转业或收歇。

1941年7月25日，日本殖民当局又颁布了“物价停止令”（又名“七二五限令”），规定一切物价均须停于原位，不得上涨。全市人民所需物品，包括生活必需品，全部实行定量配给。给大连人民和工商业者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对于粮食、生活用品生产和其它一般中小工业实行强制合并，为关东军的“战事工业”制造军用物品和后勤用品。为防止华商资金外流，殖民当局又颁布了“汇递管理法”，规定工业贷款10万元以上，商业贷款5万元以上和透支在3万元以上者，事前要呈请关东州厅长官的批准，100万元以上之汇款，则须经日本驻满洲国大使的许可。对外汇兑亦必须得到关东州厅主管部门的许可（日本、朝鲜、伪满不包括在内）。违者罚款并处以徒刑。

1942年2月，日寇颁布实行《特殊财产措施法》，规定对交战国财产按敌产处理。因此英美各银行和华商银行（中国银行除外）均受到排挤与严格限制。大连金融业为日方独占，金融实力完全操纵于日本的国家银行手里。殖民当局对华商开设的钱庄银号的管理，同样采取严厉限制措施，强行规定“只准

减少，不得增加”，迫使各钱庄停业。残存之钱庄其存放款数必须按旬、按月制表报送关东州厅金融课审核。华商钱庄还得受令代售太平洋战争的临时债票（又称为“国债”）。遂使大连钱庄纷纷倒闭。到 1944 年大连华商钱庄仅剩八家。其存放及国内汇兑情况列表统计如下：



### 1944年大连华商钱庄概况

(单位：元)

钱庄名称	经理	资本额	存款数	放款数	借入数	现款及 存出金	汇 款 项 数	兑 数
正仁钱庄	曹正仁	2,0000	79,754	79,458	179,258	218,181	977,770	—
协昶钱庄	于永武	6,0000	69,327	114,525	147,544	751,548	714,400	—
裕生福钱庄	王如枋	3,0000	—	—	14,000	44,985	—	—
福兴厚钱庄	张子和	2,0000	—	5,195	—	11,335	—	—
义聚合钱庄	王德仁	15,0000	1,837,978	470,393	56,598	1,527,534	—	—
福兴号钱庄	陈福林	3,0000	—	4,722	—	25,098	—	—
裕昌恒钱庄	孙子正	15,0000	733,068	661,173	87,963	321,631	707,882	—
天兴福钱庄	邵慎亭	10,0000	3,039,358	1,337,501	—	1,812,853	—	—

### 1944年大连华商钱庄国内汇出款项统计

汇往地点	天津方面	芝罘方面	龙口方面	青岛方面	其它方面
汇出款项	324,670元	1,266,943元	291,640元	843,552元	966,423元

上二表摘自1944年10月满洲兴业银行“金融月报”

这八家钱庄，除亲日分子邵慎亭（尚俭）开设之天兴福钱庄因他兼任大连市商会副会长，又兼营油坊业等企业、资金殷实，存放款业务还能维持现状外，其余钱庄则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

### 五、解放初期的大连钱庄业

1945年8月23日，苏军进驻旅大地区。朝鲜券、伪满币和日本币，照常通用。不久，苏联驻军又发行了苏军军用票，票面金额分为一元、五元、十元、一百元四种，与敌伪币等值流通。

由于多种货币同时流通，各种货币流通范围和需求程度不同，各种币值之间产生了差异，由是出现了黑市价格。朝鲜币因南北朝鲜通用，再加上当时朝鲜物价低，朝鲜人回国和贸易商作为外汇手段需求量大，1946年春黑市价格以三元七角苏军币才能兑换一元朝鲜币。由于1946年8月东北国统区废止了苏军币的流通，东北解放区也将流通中的苏军币进行登记，停止了流通，因此去东北购粮商贩，以及逃往东北的顽固分子大量需要伪满币。1946年春伪满币黑市价格竟达

到二元六角兑换苏军币一元。日本金票原来流通量不多。大连解放后，基本上都窝在日侨手里准备回国用，市场上很少看到。这样大量的敌伪货币、朝鲜券和伪满币逐渐流向南北朝鲜和东北地区，旅大地区主要流通货币是苏军币。

苏军进驻旅大地区除随军发行苏军币外，因它接受了敌伪大批主要企业，如海港、造船、铁路、机车、石油、渔业、水道、煤气、电业、粮谷贸易等部门，共辖48个工厂，为掌管发行之苏军币及其企业的结算和信贷关系，苏军方面又成立了苏联远东银行。我方国营企业的新华、同利、大华等贸易公司以及各解放区在连的后勤机构也都与苏联远东银行建立了往来关系。苏联远东银行并接管了敌伪朝鲜银行大连支店，它已成为旅大地区的金融中心。

1945年12月1日，大连市民主政府为了清理敌伪金融机构，宣布将敌伪正金、伪满中央、日本帝国，台湾等银行归并改组成为朝鲜银行；三菱、三

和、安田、住友等银行归并改组成为大连兴业银行；其它各银行归并改组为大连中国银行。各银行经过二十六天的账目清理，又于 12 月 28 日将归并的朝鲜、兴业、中国等三银行重新改组，分别成立了大连中国工业、农业、商业三个地方性银行。

1946 年春，旅大地区受到国民党军的军事和经济封锁，工商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国民经济还没有得到恢复，因此大连市原有的几家钱庄都没有复业。

大连市民主政府为了加速恢复经济，加强了对金融事业的领导，于 1946 年 7 月 1 日将原工、农、商三行合并成立了大连银行。1947 年关东公署成立后，又将大连银行改为关东银行。经过金融业多次调整，有力地促进了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也加速了大连市国民经济恢复的进程。原私营钱庄业随着陆续复业，1947 年夏秋以后，原正仁，协昶、裕昌恒三家钱庄先后开始营业，并新开设了久孚钱庄和中孚银号二家。

随着大连市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1948 年又增设了东孚、永合、信孚、中大、工商钱庄、远达银号、明德银号和信托公司八家，原福兴厚钱庄也开始复业，至此大连私营钱庄业已发展到十四家。解放初期的大连钱庄业在经营上以存款利率高于银行利率的优惠条件招揽存款，存款额一度曾达到 8 亿苏军通用币。钱庄贷款虽为发展工商业、加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放款不分对象，不问用途，有借就贷，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部分商人的投机活动和扰乱了市场。

1948 年初，大连市的金融体制是苏联远东银行、公营大连关东银行和私营钱庄三种体系同时存在。1948 年 3 月 2 日关东公署为了加强对私营钱庄的管理，颁布了“钱庄银号业管理条例”。在条例中虽也规定了现金库存限额、存放款的比例，留用准备金等，但在执行过程中没有认真遵守条例规定。如现金库存限额平均超过比例和留用准备金也都分别超过规定。同年 11 月大连实行

第二次币制改革，钱庄银号的放款催收不回来，客户存款又付不出去，欠政府的币改兑换差额也缴纳不上，因此全市钱庄银号宣告破产而歇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连市金融业已完全由国家银行掌握。存在于我市达四十余年之久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钱庄退出了它的历史舞台。

（口述人生前系大连市政协离休干部）

## 解前日寇在大连贩卖走私鸦片内幕

殷 炜 杰

日本帝国主义继沙俄强占旅大之后，实行殖民统治，推行鸦片专卖政策，毒害中国人民。

1906年6月18日。日本浪人石本贯太郎用中国人潘忠国的名义，获得关东总督大岛义昌发给的贩卖鸦片特许证。1907年5月16日石本又得到输入、批发鸦片的特权。1914年12月8日宏济善堂戒烟部（1924年改为药局部）取代石本，成为特许人。1928年7月关东厅成立鸦片专卖局，直接经营鸦片买卖。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时止，长期毒害我国广大人民。

日本统治者把其在大连贩卖鸦片的行为说成是为了“救济”“关东州”鸦片中毒者（瘾者）。他们利用慈善团体宏济善堂戒烟部的美名，欺骗世人。戒

烟部每年鸦片销售金额为 1000 多万元，扣除各项支出。其余均以“特许料”的名目上缴关东厅，关东厅则以“地方杂收入”的科目入账。1917 年关东厅售鸦片的杂收人为 531.4 万元，当时大连人口约 90 万人，用于鸦片的消费最多不超过 150 万元。由此可见，实际戒烟部销售的大量鸦片都是以各种形式的走私流入我国其它地区的，其数量确实惊人。而且这还不包括本通过戒烟部走私的鸦片在内。

日本在大连贩卖和走私的鸦片主要有，①红皮子，因其外皮以红色防水纸包装而得名。每箱 160 包，每包 1 英磅。由戒烟部委托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大连支店从波斯输入。②边土，产自吉林边境地区，故称边土。边土不是日本人输入的，而是警察和稽查从走私者手中没收的。大连民政署将没收的边土作价卖给戒烟部，然后再由戒烟部转售各烟馆。③土耳其鸦片。产自土耳其，由三井输入。这种鸦片外观粗糙，犹如干燥的马粪，不太适于吸烟。但它所含的吗啡量大大地超过其它鸦片，因而适合制作吗啡。

红皮子和边土都是未经加工的生鸦片。在专卖局成立以前，各烟馆购得红皮子和边土后，须配制成烟膏才能吸用。专卖局成立后，在旅顺设立了烟膏加工厂，直接加工生鸦片。

日本统治大连前期，操纵大连鸦片业的是石本贯太郎，宏济善堂戒烟部成为特许人后，他仍在幕后操纵。1915 年 10 月 1 日，他任大连市长，直至 1921 年 3 月。这期间他还兼住大连教育贮金银行行长。石本豢养大批日本浪

人，其家成为走私鸦片的大本营。1921年3月，戒烟部仅一次就以低于市价30%的价格卖给石本代理人元崎400箱红皮子。元崎转手将这批货卖给与其有特殊关系的走私商，向我国其它地区走私。

日本内阁及政客也积极插手大连鸦片走私。1918年日本内阁拓殖局长宫古贺廉造，任命他的同学中野有光为大连民政署长。经中野推荐，1919年6月5日，关东厅任命小岛贞次郎为戒烟部理事，执掌贩卖鸦片大权。

1919年6月中旬，古贺派其亲信蒲原来连会见中野，密谋策划鸦片走私。6月下旬，中野、蒲原、小岛与中国人杜疏楷，朱春山在老虎滩一日本酒馆秘密开会。双方达成协议，决定，①以杜的名义领取贩卖鸦片执照。②戒烟部按鸦片原价拨给杜的商号鸦片。③鸦片必须由中方输往“关东州”以外地区出售。④收入分配为：红皮子三七开（中方三，日方七）；边土二八开（中方二，日方八）。

会后，杜疏楷在大连监部通（今长江路）开设了兴泰号。有恃无恐地大量向其它地区走私鸦片，大连民政署对此给予全力协助和掩护，甚至在走私品上贴上大连民政署的封条，免受检查。

1920年9月日本政友会政客梶井盛与小岛共谋，同中国商人魏长德签订协定。规定，以魏的名义，由梶井负责从戒烟部买出低于市价30%左右的鸦片。获利后梶井得50%，梶井代理人国技仁三郎得25%，魏长德得25%。

日本统治时期的大连，是一个巨大的鸦片窟。大大小小的走私商和单干户，采取各式各样的办法走私鸦片。中国人走私鸦片的除上述提到的以外，还有复表盛绸缎庄，德顺栈（经理张立堂），裕长栈（经理张子杰）等商号和客栈，警察、稽查、税官、船员、铁路和邮电行业的职员等，也大多进行走私。他们走私的方法大多是将鸦片藏于其它货物当中。日本人甚至利用外交邮包进行走私。因此，当时受毒害的中国人无法统计；而日本统治者则大发不义之财。

1920年，由于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赃不均，互相倾轧，中野、小岛等人侵吞鸦片收入的事被揭露。小岛、梶井、蒲原等7人被起诉受审。小岛等承认走私鸦片是根据古贺的指示进行的。这使得日本政府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推卸不了责任。由于此案涉及到日本要人，关东厅高等法院无法审理下去，只得很快草草结束了此案。

鸦片事件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我国政府早在1918年末就曾因日本向我国大连、青岛走私鸦片一事，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鸦片事件暴露后，我国政府又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1920年10月日本政府迫于各国的压力，不得不下令取缔贩卖鸦片，同时，日本外务大臣还向各国狡辩声明，说什么“……日本官厅决没有贩卖鸦片的事，只是对于鸦片瘾者令地方政府采取适当的措施……”云云，但日本政府表面上打出了禁止鸦片的幌子，实际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措施，一直没有停止走私和贩卖鸦片。到1928年7月干脆取消了宏济善堂药局部专卖鸦片的特权，公开设立官营鸦片专卖局。明目张胆地毒害中国人民。尽管当时国际联盟还曾派调查团到大连来调查真相。由于日本统治者事先作了周密布置，让将近二百家大烟馆临时“停业”，这样蒙蔽欺骗了调查团。但日寇统治大连期间直到大连解放为止，始终没有停止用鸦片毒害我国人民。这一罪行，在全部日本侵华史上，无法抹煞，而且将永远为大连人民所唾骂。

##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工具“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唐树富 黄本仁 整理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得力工具。它疯狂掠夺了我国东北矿



石、煤炭、木材、化工原料和粮食等大量资源，摧残扼杀了中国东北的民族工商业。

—

1905年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后，夺得了沙俄原来在南满（中国东北南部）拥有的宽城子（今长春）至大连的铁路（南满铁路）及其附属权益和旅大地区租借权。从此日寇便开始了以旅大地区为基地，变中国东北为它殖民地的野心计划。为扩大侵华战争作准备，日本对我东北财富进行了疯狂地掠夺。首先，日寇威逼清政府攫取了安秦铁路的“改良经营”权，吉长、新奉两铁路的贷款权和鸭绿江右岸的木材采伐权，以及开放商埠吉林等权益。接着就是把经营南满铁路和开发利用大连口岸作为它的主要手段。

1906年1月，日本政府设立了“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研究和起草所谓“经营满洲”（即变全东北为其殖民地的计划）的具体政策和方案。其中主要有“关于设立南满铁路股份公司的敕令草案”和“命令书草案”。同年6月7日敕令第142号公布了“关于南满铁路股份公司的问题”。7月12日组

成了“满铁设立委员会”。日本政府任命陆军参谋总长儿玉谦次郎为委员长（7月24日儿玉去世，7月30日由陆军大臣寺内正毅接替），委员会委员共80人。其中主要成员有：

内阁首相	西园寺公望
陆军大臣	寺内正毅
陆军省次官	石本新六
海军大臣	斋藤实
大藏大臣	阪谷芳郎
大藏省农官	若槻礼次郎
大藏省会计局长	荒井源太郎
外务大臣	林 董
外务省次官	珍田舍己
外务省政务局长	山座圆次郎
外务省参事	仓知铁吾
递信省次官	仲小路廉
递信省经理局长	和关守喜
农商省商工局长	森田茂吉
法制局参事	道家齐
日本银行	高桥是清
正金银行	原六郎

兴业银行	添田寿一
三菱银行	庄田平五郎
三井银行	早川千古郎
明治银行	武进守正
关西银行	中野武官
京都银行	田中源太郎
安田银行	安田善太郎
三井物产	益田孝
日本邮船	正藤平
大阪商船	中桥德五郎

“满铁设立委员会”除上述人员外，还有陆军元帅大山岩、陆军大将桂太郎、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政界元老伊藤博文等政府官僚、社会著名人士及财界、企业界代表。但实权由外务、大藏和递信省的实力派勾结军阀财阀操纵。8月1日，外务、大藏、递信三大臣发表了秘录14号“有关管理和成立会社事宜的命令书”。11月24日，后藤新平为总裁，11月26日，于东京成立了总公司。

日本政府鉴于大连口岸地理形势优越，1907年3月5日将总公司由东京迁至大连（社址在今中山区世纪街），4月1日正式营业。

“满铁”形式上是独立的股份公司，这在中国和国际上都有一定的欺骗性，实质上它完全由日本政府控制，是日本政府利用私人资本的对外扩张，是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相互结合的产物。正如日本法学家冈松参太郎在其所著《南满铁路股份公司之性质》，中所说，“满铁是假公司之名行机关之实，代替政府经营南满洲”。其实这种半官半民的殖民侵略机构，不仅疯狂掠夺殖民地的财富，而且还要推行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为此。它除了经营有利可图的经济事业外，还得经营一些暂时不能赢利甚至亏损的事业，以及日本政府指定的特殊事业（如设立庞大的调查机构，搜集各方面情报等），而且还得担负其“铁路附属地”行政开支，以及补助在东北的日本人私人资本等“国策性”支出。这些都超出了一般性企业经营的范围。因此它必须追求高额垄断利润。所以“满铁”从成立伊始就具有侵略、掠夺和追求利润的两重性，并始终坚持为其侵略服务的宗旨。

日寇在东北的主要侵略机构有关东都督府，驻奉天（沈阳）、吉林、哈尔滨的总领事馆和“满铁”。它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侵略活动，故有“三头政治”之说。日寇把旅大租借地命名为“关东州”。1919年关东都督府陆军部改称关东军司令部，负责统治旅大和统率在东北的全部日军，负责对“满铁”

业务的直接监督和保护铁路。驻各地的总领事，以奉天（沈阳）总领事为中心，负责东北地方交涉并指导“满

铁”的外事活动。因此“满铁”的总裁历来都是由以军方为后台的政界或财界重要人物担任。这也充分反映了“满铁”的特殊性质。“满铁”历任总裁为：

总裁姓名	到职日期
后藤新平	1906年11月
中村是公	1908年12月
野村龙太郎	1913年7月
中村雄次郎	1914年7月
国泽新兵卫	1917年8月
野村龙太郎	1919年5月
平川千吉郎	1921年6月
川村竹治	1922年10月
安广伴一郎	1924年6月
山东条太郎	1927年7月

仙石贡	1929年8月
内田康哉	1931年3月
林博太郎	1933年7月
松冈洋右	1935年2月
大村卓一	1939年3月
小日山直登	1943年7月
山崎元千	1945年5月

“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原是台湾总督府的民政长官，具有丰富的殖民经验。日俄停战期间。曾秘密到中国东北视察铁路，并兼任关东都督府顾问。他极力鼓吹在东北实行“文装武备”的殖民政策，即所谓“举王道之旗，行霸道之术”，打着“中日亲善”的旗号，实际干着侵略的勾当。后藤任总裁后，主持确定了以大连为基地发展“满铁”事业的方针。其主要内容是：1. 经营铁路和经营大连港同时并举；2. 开发矿产；3. 从日本移民50万从事农垦；4. 有几亿畜产，在满洲永久立足，俄国如再来可恃以对抗，待以时日，更可借此攻入敌国（指俄，中两国）。这个方针，直到“满铁”灭亡。始终没有变更。

“满铁”拥有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一切企业经营特权，包括修筑和经营铁路、港口、电讯、航运、开矿、伐林、自行决定运费、费用等，取得铁路沿线土地可以任意支配使用。免缴一切税费，甚至可不缴铁路材料进口税等特权。而且他们还禁止中国方面修筑平行铁路，在“铁路附属地”排斥中国主权，形成名符其实的“满铁王国”。“铁路附属地”是旅大租借地向东北广大腹地的

延伸，是殖民势力统治下的“国中之国”。其附属地沿线所占土地面积见下表：

“满铁”附属地面积表

站名	面积（平方公里）
营 口	5. 205
鞍 山	18. 441
四平街	6. 713
辽 阳	6. 828
公主岭	6. 897
长 春	6. 763
奉 天	12. 772
铁 岭	6. 350
开 源	6. 680
安 东	9. 589
抚 顺	61. 839

摘自《满洲开发40年》，1987年辽宁人民出版社

“满铁”，以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和大连港的交通运输业作为全部经营活动的基础和中心。它垄断东北农矿产品的出口运输（以大豆、煤炭为主），

控制东北的进出口贸易，铁路运输是满铁高额利润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些高额利润来自对中国广大工人、农民的剥削和勒索。它在抚顺、阜新等处开采的煤炭，不仅用于“满铁”自身的运输和发电，而已还垄断整个东北煤炭市场，作为向外输出的主要物资。它为了掠夺东北钢铁资源，还在鞍山建立了制钢所（昭和制钢所）。

“满铁”还打着“产业开发”的旗号，渗入东北农工商业各个部门。在农业方面设立了农事试验场；在工业矿业方面设立了中央试验交易所和地质调查所，在商业方面设立了贸易馆、交易所信托公司。它还采取投资、认股、贷款、补助等各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扶助日本资本家在东北经营各种事业，以至形成日本在东北的投资事业除了极少数是日本大财阀直接经营外，“大部分是满铁的旁系或准旁系，否则也是围绕满铁公司这一太阳星系旋转的卫星”。

①

“满铁”对于政治、文化各方面也积极插手，在“满铁”附属地建立独立的行政部门，脱离中国主权的控制。关东军派了六个大队的兵力驻守在铁路附属地（到“九一八”事变前夕，兵力猛增到2万余人），作为侵略中国东北的军事活动场所，建立了庞大的调查机构、专搞情报工作。在大连市和其它城市创设了《满洲日日新闻》报馆，办学校、铁路医院、图书馆、博物馆、资源馆，甚至拨款修建庙宇寺院。“满铁”魔爪伸入了各个领域，无所不包，无所不办。



## 二

“满铁”把大连作为“经营满洲”的总指挥部。首先的任务是把沙俄遗留下来只完成了一半工程的大连港修建完成，再是要以最快速度把从日本军方手中接收过来的窄轨铁路，改筑成与京秦铁路一致标准轨距的铁路，使南满铁路畅通无阻。并在大连与苏家屯之间铺设复线，完成“满铁”海

---

### 《关于满铁开发事业》，日本大连商工会议所编

陆联营计划。

大连港是港阔水深的不冻港，又是日本和中国东北以至欧洲的海陆联络的中转基地。日本政府决定把旅大地区作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根据地和周转中心。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口，免除进出口税，交“满铁”全权经营。“满铁”委任东京商科大学毕业、曾在日本门司等港口工作多年的相生由太郎为大连埠头事务所所长。相生由太郎接任后，把大连港作为同海参崴港、营口港的竞争对手，实行了以大连港为中枢的运输政策。制定了港口进出口货物特殊运费制的体系。在港口周围修建了大批货物仓库和场地，实行货物装卸、运输、仓储等配套作业。“满铁”投资成立了福昌公司，从中国内地骗来大批“苦力”（劳工）在码头从事繁重的装卸劳动。到1910年大连港就压倒了营口港，跃居东

北第一大港。南满铁路代替辽河水运，垄断了南满的煤炭、矿石和农特产品的出口运输，成了东北进出口运输的主要大动脉。在此基础上，“满铁”又购进了美国进口的新式机车车辆，并在大连沙河口兴工街附近修建了号称东洋第一流的、用德国机器装备起来的大连铁道工厂（今大连机车车辆工厂），开辟大连通往中国沿海各口岸和欧美各地的运输航线，并成立了拥有一定数量的远近航行船只的大连轮船公司，还与日本川崎造船厂合作，在大连港附近建设一座修造船分厂——大连船渠（今大连造船厂）。于是，形成了一条拥有强大运输能力的水陆联结的殖民地运输线。这样“满铁”完全操纵了南满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并将东北的丰富经济资源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联系起来，从中牟取了巨大利益。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已开始向我东北广大农村进行渗透。由营口港涌进了大批外国商品，东北的小生产者缓慢地接受了商品经济的因素。渴望开辟市场，吸收他们的产品。北满和南满的三江平原和松辽平原盛产大豆、高粱，占东北农作物的70%左右。“满铁”初期的货运主要是这些特产。大量的北满的大豆等经大连港转往日本国内和欧美各地，或加工成豆饼、豆油等出口。

东北大豆出口，最早时大部分是经海参崴输出，南满铁路为日寇榨取后，交北运为南运。到1917年由大连港出口的大豆，大大超过了海参崴港。这两大港口历年出口大豆数量见下表：

大连、海参崴出口大豆数量对照表

年度	大连港	海参绥港
1914年	354, 691 美吨	465, 011 美吨
1915年	140, 884	343, 152
1916年	205, 553	296, 794
1917年	286, 405	172, 885
1918年	567, 797	61, 895
1919年	484, 002	38, 761
1920年	541, 149	148, 772
1921年	494, 640	375, 993
1922年	778, 960	413, 322
1923年	718, 434	439, 098
1924年	824, 576	653, 390
1925年	924, 467	666, 593
1926年	773, 067	677, 312
1927年	1, 020, 650	907, 118
1928年	2, 366, 760	983, 870
1929年	1, 247, 039	576, 579

1930年	1, 563, 111	724, 586
1931年	1, 940, 253	991, 586
1932年	1, 924, 795	430, 213
1933年	1, 502, 746	198, 694
1934年	2, 048, 104	
1935年	1, 575, 896	60, 647
1936年	1, 475, 267	182, 797
1937年	1, 413, 764	461, 950
1938年	1, 480, 694	650, 261
1939年	1, 388, 385	611, 200

1914年~1925年

1933年~1939年 } 见《满洲重要物产统计年鉴》

1926年~1932年 见《满洲经济统计年报》

1933年以前单位为美吨。以后则为吨。

由于大豆及其制成品的出口量猛增。既肥了“满铁”，也促进了大连及南满铁路沿线城市的发展。大连不少的民族资本家就是依靠办油坊业、铁工业等起家的。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一般都附庸于“满铁”而生存，如大豆原料的输入，产品的输出和仓储都要依靠于“满铁”，生产用的燃料也全被“满铁”控制。民族资本家如果独立经营。超过了殖民者所允许的限度。“满铁”就协同殖民当局施加各种限制措施，

最终使之失败。大连民族资本家、爱国人士周文贵创办的顺兴铁工厂，到1913年已发展成拥有近千名职工的大型通用机械厂，资金积累数百万元，因而遭到“满铁”的打击被迫倒闭。所以大连民族资本的实力是微不足道的。40年代初，大连民族铁工业的资本总和为129万余日元，只等于“满铁”所属的大连机械企业资本的6.4%。当时大连民族工业投资额只占全市工业投资总额的4%，而日商却占96%。其中“满铁”投资占了相当大的部分。”满铁”对于需要大量投资的重要部门，如铁路、机车制造、港口、海运、煤矿等都实行直接经营。对于其它需要较多投资的重要部门，如电力、煤气，林业、化工等则主要采取设立子公司的方式实行间接经营。对于一般行业，则以认购股份、发放贷款，给予补贴等方式扶助日本私人资本经营，这就形成了金字塔型的囊括各种产业部门的庞大的”满铁康采恩”。”满铁”以大连为基地经营的各种企业见下表：

### 1. “满铁”直接经营的企业

企业名称	地 址	创设年月
大连轮船公司	大 连	1915 年 1 月
大连国际运输公司	大 连	1926 年 8 月

大连铁道工广	大 连	1910 年 2 月
大连福昌公司	大 连	1926 年 10 月
大连都市交通公司	大 连	1929 年 5 月
日满仓库大连分公司	大 连	1936 年 11 月
日满商事大连分公司	大 连	1936 年 11 月

## 2. “满铁”以“产业开发”

### 名义间接经营的企业

企业名称	地 址	创设年月
大连船渠铁工厂	大 连	1937 年 7 月
日本精腊公司	大 连	1929 年 2 月
大连窑业公司	大 连	1915 年 4 月
满洲化学公司	大 连	1933 年 5 月
大连工业公司	大 连	1932 年 7 月
南满煤气公司	大 连	1939 年 7 月
抚顺水泥公司	抚 顺	1933 年 8 月
蓄产工业公司	奉 天	1936 年 11 月
昭和制钢公司	鞍 山	1929 年 7 月
满洲制碱公司	大 连	1936 年 11 月

摘自“满铁”调查课统计资料汇编 1940 年 3 月版

“满铁”还控制了大连和南满铁路沿线的金融机构。交易所、信托公司以至大商店、大饭店、大旅馆。到1913年，“满铁”不仅支付了总数达3500余万日元公司债的利息，还支付了1200余万日元的红利。“满铁”初创时除发行公司债以外，实收股金仅200余万日元。至此，其红利已超过本金好几倍，可见“满铁”获利之大是超过资本主义企业正常经营规律，这是完全依靠殖民势力野蛮榨取而得到的。但日本军国主义犹未满足，1915年，又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要求延长旅大租借期限至1997年，“满铁”主线延期至2002年，安奉线延期至2007年归还中国。二十年代后，又在旅大地区搞了一个所谓“废除银建制，改行金建制”的法令，直接威胁到中国民族资本的生存，因而爆发了殖民地民族工商界第一次向日寇举行请愿的行动，得到了东北和全国人民的声援。自此以后，旅大和东北人民与日寇经济上的纷争一直没有间断，而日寇以“满铁”为中心向东北的经济侵略也越来越疯狂。南满铁路沿线附属地也逐年扩大，由1907年的149.7平方公里增加到1917年的1,509平方公里，1927年前后又增加了一倍还多。日寇的特务机关和各种侵略团体日渐增加。日本冒险家、淘金者、浪人和投机商也以附属地作为他们的安乐窝，在“满铁”的庇护下，分享殖民侵略的利益，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对中国人民职尽了坏事。

1929年张学良政权易帜后，东北的民族资本在英美势力支持下，开始以经营北宁路为中心形成独立的运输体系，陆续建成沈海线（沈阳——朝阳镇）、吉海线（吉林——朝阳镇）、打通线（打虎山——通辽）、齐昂线（齐齐哈尔——昂昂溪）。又在锦州以南修建葫芦岛港及锦爱（锦川——爱辉）铁路等线与日寇统治下的大连港相对抗。从而打破了南满线独霸东北运输的局面。”“满铁”经此打击，运输收入大幅度下降。于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大造中国铁路包围南满路威胁了“日本生命线”的舆论，扬言“满铁”是“日本明治天皇的遗产，是日本国民血肉之结晶品”，“满铁”是由于同胞的流血牺牲和耗费20亿国帑而不易赢得的结晶，“保卫‘满铁’就是保卫帝国”。为关东军发动侵略全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制造口实。

### 三

“九一八”事变，“满铁”为关东军提供运输手段，提供技术力量、通讯设备，提供“附属地”房舍为兵营基地，组织自卫队协同关东军作战等。

日寇关东军侵占东北全境和伪满洲国的建立，为“满铁”掠夺我东北财富和资源扫清了障碍。原来北宁路对它的威胁已不复存在。它在关东军和伪满政权支持下，将其所属企业活动范围扩展到伪满全境。随着日本军部势力的抬头，1935年日本政府实行了驻“满”机构改革，新设“对满事务局”，由陆军



大臣兼任总裁。在东北则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伪满洲国大使。也就是说，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直接由日本大使馆、关东军来控制。“满铁”也直接受关东军的支配。“满铁”由“经营满洲”改为支持配合军部备战，以国防和产业发展、交通事业为中心任务。由于“满铁”的业务范围扩大，便在沈阳设立铁路总局，统一经营伪满洲国的铁路、港湾、水运和公路运输，对东北全境的交通事业实行垄断。它侵占了原来分属于9个中国铁路分局的18条铁路线，总长2,939公里，以及葫芦岛港和营口的河北码头，又接办原中东铁路的干支线1,732公里，连同新建铁路在内，“满铁”所辖“国有”铁路总长为6,857.3公里，为“满铁”原有铁路里程的6倍还多。并在各地设立了5个铁路分局，2个事务所，及铁道学院和铁道研究所。在哈尔滨设立林业所、造船所（江船），在皇姑屯。长春、松甫、齐齐哈尔等地新建铁道工厂以及北满经济调查所。

“满铁”为了推行“产业开发”的掠夺政策，进一步垄断全东北的经济命脉，大力发展所谓关系公司。投资总额由11,000万日元猛增到24,000万日元。在伪满洲国具有统制特权的19个特殊公司和10个准特殊公司中，“满

铁”关系公司分别占有其中的 13 个和 8 个。它们分布在各种重要工业部门和金融交通运输领域。在此期间新设立的关系公司见下表；

公司名称	业 务 内 容
满洲炭矿公司	简称“满炭”、垄断全东北燃料供应
满洲采金公司	垄断吉林、黑龙江两省和东蒙的金矿开采
满洲铅矿公司	垄断锦西杨仗子铅锌矿开采
满洲金属制品公司	利用东北的矾土页岩，年产 400 万吨铝矿
日满镁工业公司	垄断东北的菱镁矿、冶炼金属镁
满洲电业公司	简称“满电”，垄断全满电气事业
满洲曾达公司	年产苏达 3.5 万吨
满洲盐业公司	为日本化学工业提供海盐原料
鲜满拓殖公司	满铁出资 300 万日元强买北满 100 多万公顷农田， 为从日本移民 100 万户用。
满洲林业公司	掠夺东北绰尔，东部岔林河、海敏公司，布洛尼亚 等五大林区资源，共占 160 余万公顷的面积，年产 木材 100 万方。

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满铁”势力深入华北、华中，在上海、天津设立事务所，在北平（北京）、郑州、青岛、济南、太原、张家口、绥远、多伦等地设立分所和驻在员。先后接管了日军侵占华北各地约4,000余公里的铁路。派出员工2万余名，各种车辆5,000余台，又拨款1,880万日元，设立兴中公司接管日军在华北之‘军管工厂’，如龙烟铁矿、并陘煤矿和电气。化工企业共50余个。并打着“开发满华贸易”的口号，大肆掠夺华北之棉花和长芦海盐等重要战略资源，控制了山西大同煤矿和山东矿业公司。

“满铁”创办的日满商事公司，是它扶助日本商人垄断全东北商贸的机构。它对中国民族工商业由原来作为附庸加以利用，逐步改变到进行排挤，扼杀和吞并，对主要产品予以垄断。

东北是祖国的大粮仓，大豆高粱等农副产品闻名全球。还有丰富的矿藏资源。当地的工商业最初是以生产消费资料为主的，如油坊、烧锅、磨房等农产品加工工业。油坊工业以生产豆饼、豆油为主。它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扩大工厂规模，生产逐渐有所发展，继而对日本和欧美的出口急剧增长。经营油坊业者大都是杂货商和粮商出身，他们以不等价交换副产品，或放高利贷等不正当

手段控制了农村和农民而逐渐致富。他们到处开设粮栈，向农民收购大豆粮食。早在 1850 年，东北就有粮商经营大豆粮食的买卖，包括粮食贮藏保管、运输和向农民贷放资金。有的还开设车店，负责马车货运，交易者的食宿交际应酬等业务。进行农产品加工业务，是他们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粮栈还有外部的组织“联号”，是由一个资本家向几个粮栈投资，或几个资本家联合经营几个粮栈而形成。它能互相通融资金和商品或交换贸易信息，粮钱还与当地油坊、钱庄勾结，或与当地产业资本家相结合，是以大豆粮食为对象，联系广大农民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商品流通。原来东北较大的民族资本家以经营粮钱者为多。从下表就可以看出原东北民族资本家开设用快的一股情况：

东北各地较大的粮栈情况表

城市	粮栈名称	资本	开设年月	在外地粮钱
金州	广义盛	小洋 2 万元	1907 年	4
普兰店	广增号	日元 5 万元	1911 年	9
松树	福顺泰	日元 1.5 万元	1911 年	8
熊岳城	洪兴号	日元 2 万元	1821 年	7
盖平	中兴谦	日元 12 万元	1912 年	3
大石桥	福兴和	日元 1 万元	1913 年	6
千山	广益达	日元 2 万元	1916 年	5

辽阳	永盛泉	日元 10 万元	1826 年	25
苏家屯	同仁茂	日元 2 万元	1916 年	4
奉天	三合栈	小洋 100 万元	1913 年	4
新城子	福成栈	奉票 500 万元	1918 年	16
铁岭	泰记	日元 8 万元	1922 年	16
开原	世合公	日元 37 万元	1919 年	17
昌图	富通昌	不 详	不 详	20
四平	复盛昌	车票 8 万元	1922 年	14
双庙子	同兴号	日元 35 万元	不 详	15
郭家店	合成玉	日元 3.6 万元	1920 年	10
公主岭	泰和盛	小洋 20 万元	1910 年	27
长春	永衡通	宫帖 500 万元	1914 年	55

140

营 口	宏昌厚	日元 4 万元	1908 年	42
抚 顺	三合公行	奉票 3 万元	1918 年	7
本溪湖	万盛生	日元 3 万元	1912 年	6
单河口	天佑公司	日元 5 万元	1916 年	9
安 东	恒盛泰	白银 20 万两	1914 年	7

摘自《满洲开发 40 年》，1987 年辽宁人民出版社

东北的中国民族资本以粮栈为中心，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原有封建经济起了解体作用。它扩大了工农业的分工，扩大了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的联系。但因当时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处于劣势，加上中国资本没有建立起产业资本和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势力，而以大连为基地的三井、三菱等日本财阀，在“满铁”的支持下，在东北铁路沿线广泛收购大豆和粮食，中国民族资本家因资本微薄，无力与之竞争，只能处于附庸地位。“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因有英、美财团和奉系政权的存在，民族资本的各处粮栈，尚能有所发展。但自伪满洲国成立后，因遭到日本军方和以“满铁”为首的日本财团的排挤，如“满铁”以“成发东”粮栈名义垄断东北特产大豆的收购，实行购、储、运四套，三菱、三井等财团相继在东北各产粮区设立粮谷收购站，原有民族资本开设的粮栈纷纷倒闭。1939 年 9 月 11 日伪满洲国成立“特产专管公社”，大豆完全归其统制，不得自由交易，民族资本家在城市开设的油坊，其原料来源和产品去向完全由“特产专管公社”控制。油坊业失去了自由竞争，所获利润大为减少，因而民族油坊业继民族粮栈业之后日趋衰落。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一步实行残酷的统治措施，颁布了《汇递管理法》，不许民族工商业者抽资迁厂，只能为其侵略战争服务。而且，“满铁”所属各企业，为了完成“军工”任务，更加加重了中国工人的劳动强度。当时“满铁”全部职工 40 万人，其中中华籍职工占了 26 万多。1943 年

以后，日寇在侵略战争中屡遭惨败，为应付其庞大的军费开支以作垂死挣扎，其经济掠夺也就更为剧烈，统治手段愈益残酷。如大连民族工商业中最大行业的油坊业、铁工业等，都被日寇强令合并，为其加工军需品。对华商企业所需原料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则实行统制、限制以及定时定量配给。并在华商各行各业和中国居民中强行推销“国债”。整个民族工商业处于奄奄一息之境地。“满铁”实行战时体制，强迫所属企业为支援侵略战争服务。1944年初，“满铁”的任务主要是保证关东军的军需运输，保证东北的煤炭和粮食运往日本。因此抓紧了奉山线（沈阳——山海关）、安奉线（丹东——沈阳）的复线工程，以加速与朝鲜的铁道的联营能力，补救日寇海上运输能力的削弱。

日寇在军事上惨败后，经济上暴露出来的各种矛盾和困难也日益加剧。关东军要求“满铁”加大运输量和加速掠夺各种物资。而中国人民在日寇横征暴敛，敲骨吸髓下，早已民穷财尽。民族工商业日趋衰微，广大农民被抓劳工，田地荒芜，粮食减产。”满铁”控制的各煤矿也因大批工人被征调产量大幅度下降。日寇灭亡前夕，整个东北粮食紧张，能源奇缺。由于燃料紧张，街面所有大小车辆全部改用木炭作燃料，因此街上黑烟冲天。“满铁”长途汽车公司也被迫改为短途。所有煤炭也都集中在东北和朝鲜的铁道线上，保证关东军的军事调遣。日本殖民主义的残酷剥削和掠夺，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满铁”列车，也常遭到东北人民有组织的袭击。此时关东军又面临苏联红军的打击对“满铁”的保护无暇顾及，因此，除了严令“满铁”加强运输和搜刮物资外，实际已无能为力。

1945年9月7日，日寇妄图依托长白山天险作最后挣扎，特把其关东军司令部移驻通化。为指挥军运方便，命令“满铁”总部随军行动迁至长白山下，并要求运输生产实行“总动员”，以应时局急变。但不到一个星期，日寇被迫宣布投降。“满铁”这个日寇侵华的掠夺工具，也随着侵略战争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灭亡。

（大连市工商联文史办供稿）



## 《打响辛亥革命在东北的第一枪》

补正 马群

拙作《打响辛亥革命在东北的第一枪——记辛亥革命关外军与顾人宜》，载于《大连文史资料》第三辑，转载于《双纵横》1988年第三期（题改为《辛亥东北第一枪》）。该文发表后，笔者有幸又搜集到一些档案史料，觉得原文有些地方应加以补充和勘误正谬。

### 一、顾人宜的原名及其更名的缘由

顾人宜原名顾人仪，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清德宗景皇帝载湉死亡，嗣皇帝溥仪于十一月初九日登基。上宪有明示，“凡姓名应行改避之处”须“呈请办理”，以“敬谨遵避”。如系一般百姓，名字中有与皇帝名字相同之字，自己径直改去不用即可，而当时身为复州聚社社长之顾氏，既充官差，且前所获功牌、奖札（见本文“二”），均用“顾人仪”名，“遵避”之字，须由发给之机构更改方可。是故，顾氏当即具文禀请复州知州代呈督、抚，祈将原名“仪”改作“宜”，“以昭敬谨”。复州知州于十二月十七日具文呈东三省总督及奉天巡抚，并将功牌、奖札各一份“一并缴呈更正”。督宪即咨请陆军部“案照更正”。“陆军部咨复称：“……自应准其更正，除将该员保案（按：当系指前获之功牌与保外委之奖札，见本文“二”）名字更正外，相应咨行东三省总督查照可也。”据此，督、抚下行札饬谓“除饬

巡防营务处知照外，合行札仰该州即便转行该弁遵照，此札。”于是，顾人仪为”敬谨遵避“皇帝名讳，便正式更名为顾人宜了。

## 二、对顾氏任职经历记叙舛误之更正

原文在记叙顾人宜任地方团练之团总（或谓“团首”）一事中，涉及了清廷赐顾氏以“外委”衔的问题。文中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之役，各地奉旨办团练，经地方绅耆推举，顾人宜，高丕儒等身膺其职”，这一部分记叙并无差错，惟原文紧接着称说，“顾人宜经地方官保举，清廷赐以蓝翎五品顶戴候补外委衔”，在这一点上有两个问题，一是时间不对，二是保举人有误。

事实是，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之役后，顾氏膺任地方团练之团总职务。次年（即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奉天防军协同辽西陆军第三镇于辽西“剿匪”，顾人宜奉调率众参加是役，获“六名（？）功牌”一份。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顾人宜任复州聚社社长。在赵尔巽任盛京将军期间（赵任斯职在光绪三十一、三十二两年；公元为1905年、1906年）对在辽西“剿匪出力千、把各弁”，曾咨请陆军部给奖。光绪三十四年春，经部核办，发给顾人宜“补用外委”奖札一份，即拙作原文中引《顾人宜呈状》，称蓝翎五品顶戴候补外委，亦即顾氏墓碑碑文所云“蒙清廷赐为都司，由之募勇缮器”，“克靖地面”事。墓碑碑文不符事实之处在于“募勇缮器”并非是在“清廷赐为都司”的光绪三十四年，而是在这此前八年的光绪二十六年。拙作错误则恰好相反，即不应把清廷赐顾氏外委衔说成是在他充任团首的光绪二十六年，事实是在此后八年的光绪三十四年；保举他的人不是地方官，而是盛京将军赵尔巽。

## 三、赵尔巽命庄、复地方官绅 与顾人宜进行的第二次谈判

拙作原文叙述了赵尔巽为争取时间消灭奉天省城和凤凰城等地的革命武装力量，对兵众力强的顾军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命庄、复官绅与顾人宜谈判，希望能将顾军改编为巡防队以归己用等等。

原文较详细地介绍了第一次谈判的情形和未达成协议之后两方面的活动情况，而对第二次谈判，只称说“又经谈判，顾人宜终于接受了赵尔巽赔偿起义所耗之军费一万两，将民军改编为保护地面的巡防队”，关于谈判的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员等情况语未稍涉。这里，根据所得到的档案史料，补充如下。

第二次谈判是从第一次谈判约十天之后的12月15日开始的，地点仍在大娘娘庙。从委员陈亮功、复州知州刘彦卿、水门子巡检刘文翔，复州勤学总董宫玉章、复州警务长牟维新、复州议事会议员王志潜于12月18日为庄、复商绅与顾人宜会谈后给赵尔巽的禀文中看，此次谈判，“既无难解决的问题”，顾氏民军方面，“亦无无理之要求”。至于参加谈判的人员则要比第一次谈判多得多。除上述复州的六名人员外，尚有复州咨议局议员焉泮春等十六人。庄河恒续（警务长）等八人。

谈判的结果，民军被编为巡防队。这固然是坏事，但从某一方面看，也可以说是好事，革命武装以巡防队的名义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不但保存了革命实力，也为革命军北伐提供了条件。

说明：本文第一、二部分，主要根据有关顾人宜的档案补正。档案存辽宁省档案馆。第三部分则依据《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补充。

（作者为新金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